

行政科学论坛

RESEARCH OF ADMINISTRATION SCIENCE

- ◎ 建设“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高素质专业化机构编制干部队伍研究
- ◎ 推动机关党建与机构编制业务深度融合研究
- ◎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数字经济驱动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 ◎ 共生式发展：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理路

2025 08

总第128期

修武县：修兵练武处 七贤隐居地

修武县历史悠久，周朝之前称“宁邑”，商末（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兴兵伐纣，大军途经宁邑时遇暴雨三日而不能行，就地驻扎修兵练武，故改宁邑为“修武”。修武自得名至今，已有3000余年历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始设修武县，属三川郡管辖。2006年，修武县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授予“千年古县”称号。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修武县文化事业发展步伐加快，文化活动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活跃。

◎本期摄影/文明 文字整理/石羽



胜果寺塔



万善寺前的牌坊



武王伐纣时安葬阵亡将士的商家



百家岩寺塔



圆融寺全景



海蟾宫大殿



修武运河

主管单位: 河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新乡学院
主 编: 陈磊山
执行主编: 董 颖
副 主 编: 罗 文
出版发行: 《行政科学论坛》编辑部
出版地址: 新乡市金穗大道东段 191 号
印刷单位: 新乡市东昌印务有限公司
邮 编: 453003
电 话: 0373-3683192 0371-65566167
电 子 信 箱: xzkxlt2016@163.com
出 版 日 期: 2025 年 8 月 25 日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frac{\text{ISSN } 2095-7017}{\text{CN } 41-1428/\text{D}}$
发 行 范 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 内 总 发 行: 新乡报刊发行局
国 内 邮 发 代 号: 36-137
户 名: 《行政科学论坛》编辑部
开 户 行: 中国银行新乡国贸支行
账 号: 259824996598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107004000023
定 价: 15.00 元

行政科学论坛

河南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与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会刊

(月刊)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黄文平 王文超 马新华
杨宏志 胡战坤 孔令晨
陈兴民 丁庭选 尹新明
主 任: 吕 娜 孙功奇 王孝俊
副主任: 王付林 陈磊山 赵文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煌 王付林 王孝俊
王荣阁 叶春风 吕 娜
任丰金 刘 钊 刘春阳
刘俊生 孙功奇 杨光斌
杨 钧 宋 伟 张 旭
张明军 张银堂 陈振明
陈磊山 郁建兴 金太军
赵文阁 赵伟杰 胡汉伟
胡彦宏 夏继先 高 炜
郭建州 董克用 董 颖
韩 辉 黑云龙 谢建文
鲍晋选

目录 Contents

2025 年 / 第 12 卷 / 第 8 期 / 总第 128 期 / 2025 年 8 月 25 日出版

◇ 党的建设

建设“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高素质专业化机构编制干部队伍研究 / 信阳市委编办课题组 / 4

推动机关党建与机构编制业务深度融合研究 / 商丘市委编办课题组 / 10

◇ 编制管理

濮阳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中长期供需趋势研究 / 濮阳市委编办课题组 / 15

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统筹调配编制资源研究 / 安阳市委编办课题组 / 21

机构编制执行情况与使用效益评估的探索与思考 / 平顶山市委编办课题组 / 25

◇ 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数字经济驱动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 唐 琼 龚晨程 / 29

共生式发展: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理路 / 周青洋 汪来杰 / 35

从封捕到共生: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现代化治理与生态文化传播 / 曾梓威 / 40

◇ 理论视点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 李润源 / 45

◇ 高校治理

河南省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与对策建议 / 何 水 高向波 / 50

智媒时代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困境突围与发展路径探析 / 李 娟 赵欣然 / 5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创新路径研究 / 李鹏鸽 / 60

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新模式探究

——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为例 / 杨帅鹏 尹真杰 / 64

纸数智融: AI 赋能大学英语教材设计研发与应用路径初探 / 韦 玮 / 67

◇ 历史上的河南县治

修武县:修兵练武处 七贤隐居地 /

河南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课题组 /73

◇ 征文园地

理想绽放 点亮五彩斑斓的光 / 麻伟娜 /77

“镜头”里的她和他 / 谷志昊 /79

封二、封三 / 历史上的河南县治

封底摄影 / 文明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扩展期刊

河南省一级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知网(CNKI)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库——数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网,《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本期执行编辑 夏继先

期刊基本参数: CN 41-1428/D * 2014 * m * A4 * 77 * zh * P * ¥15.00 * 7 500 * 17 * 2025-08 * n

建设“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 高素质专业化机构编制干部队伍研究

信阳市委编办课题组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机构编制干部是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设的“主力军”，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先锋队”。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编委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的高素质专业化机构编制干部队伍。”近年来，信阳市委编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机构编制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借鉴河南省委编办“四学四提升”有益经验，探索开展“四强化四提升”^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对加强机构编制队伍建设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机构编制干部队伍的背景动因

建设“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高素质专业化机构编制干部队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指导机构编制队伍建设的奋斗目标，是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推动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人性论

人作为团队的基本要素，是干部队伍建设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任何人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实践着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和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把他们彼此联系起来”，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人只有在自然性、社会性、德性、理性等各个方面解决不断发展的需要，摆脱人性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片面性和畸形性，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从而获得全面完整的人性，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黑暗迷茫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并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围绕干部队伍建设目标提出“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与如今“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的要求一脉相承，也成为机构编制干部队伍建设的早期指导思想。进入新时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现实历史条件和发展状况决定着当今时代人性的局限性，“美好生活需要”仍然是人民群众的向往。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成功揭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内驱动力来源，为我们关注机构编制干部“需要”、调动机构编制干部“自觉的能动性”，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的特点

机构编制工作是围绕机构改革、体制机制和职责调整，以及各类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领导职数调配而开展的工作总和，它具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政治性。“党管机构编制”是机构编制工作的核心原则，机构编制干部要时刻把握机构编制工作的鲜明政治属性，坚决落实党中央对机构编制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二是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是机构编制工作的价值取向，很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都与其背后的体制机制息息相关，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机构科学设置、职能优化配置、编制精准使用。三是纪律性。编制就是法律，机构编制一经确定必须严格执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34条对违反机构编制纪律的处分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坚持机构编制刚性约束”的基本原则。四是专业性。机构编制工作内涵丰富、政策性强，以《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为统领的各项政策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基于机构编制管理实践的各类论文专著等，共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专业概念、逻辑范畴和话语体系。五是综合性。“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与机构编制工作有关，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编制资源配置等，直接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党政机关运行的效率”，进而深刻影响着经济基础乃至全部社会生活。这就要求机构编制干部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既要掌握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也要了解科学、技术、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情况”。六是实践性。机构编制资源配置状况直接影响一个地区、一个

部门、一个单位的人员规模、财政拨款、领导职数、管理成本、人均工作量等现实利益。任何机构编制事项，本质上都涉及利益格局调整，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上述特点给机构编制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相应要求，政治性要求“政治强”，人民性、纪律性要求“作风优”，专业性、实践性要求“业务精”和专业化，综合性等要求“高素质”，这些要求精准回答了机构编制干部“干什么、缺什么”，以及应该“学什么、补什么”的问题。

（三）当前机构编制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近年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改革愈发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和制度体系变革，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要求聚焦教育、科技、社保、卫生等领域突出问题，以创新举措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把体制机制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河南省委第十一届七次全会指出，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引领助推全省“十大战略”“十大建设”的落实，努力破解影响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难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提供坚实制度保障。2024年8月，信阳市委六届六次全会提出，要围绕破解制约老区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充分发挥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及时推出一批务实有效、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为老区振兴崛起提供更完善的制度保障、更强劲的动力源泉。因此，面对当前改革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不能就机构编制论机构编制，必须将机构编制工作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不断夯实机构编制系统“主力军”“施工队”的组织根基，“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指挥棒’指向哪里，改革重点就放到哪里，机构编制资源就投向哪里、保障到哪里”。

二、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机构编制干部队伍的实践探索

围绕“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高素质专业化的目标要求，信阳市委编办紧扣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特点和任务，探索实施“四强化四提升”，并逐步尝试从人性角度激发干部“自觉的能动性”，推动干部队伍政治素养、业务能力、综合素质、纪律作风全面提升。

（一）强化理论学习，提升政治素养

政治素养作为干部的立身之本，是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的前提。信阳市委编办聚焦一些干部“理论学习不深入”“政治敏锐性不足”等问题，以“政治强”为目标，狠抓理想信念教育和形势政策学习，推动干部成为思想上的“明白人”、政治上的“清醒人”、实践上的“带头人”。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理想信念教育为重点开展集体学习研讨6次、讲授理论党课3次，组织室务会“第一议题”学习16次、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12次、“周四大学堂”41期。充分发挥老区信阳红色教育资源优势，组织党员干部前往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王大湾会址等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在赓续大别山精神中接受红色洗礼。在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和市县党政机构改革中，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自我革命，带头精简办机关二级机构和编制，在“打铁自身硬”的基础上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干扰，没有对任何单位搞任何形式变通，真正将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探索中发现，常规说教容易落人为学而学、照本宣科的俗套，实地参观能够以身临其境讲故事等形式表现出强大吸引力，以至于茶余饭后仍有干部谈论和感慨先烈们的英勇事迹。

（二）强化专业训练，提升业务能力

业务能力作为干部的核心素养，是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的关键。信阳市委编办聚焦解决干部

“业务能力不强”等难题，以“业务精”、专业化为目标，加强培训交流，深化调研实训，推动更多干部成为机构编制工作的“政策通”“活字典”“一口清”。借鉴河南省委编办开展机构编制系统干部集中培训的成熟经验，举办“机构编制主题论坛”，论坛分为“学习”“授课”“研讨”三个环节：汇编机构编制政策法规和典型案例，组织集体学习；立足本职岗位，围绕政策和业务实操等主题，机关干部轮流上台授课；结合全省每期“组工讲坛”和机构编制系统干部集中培训课程，开展交流研讨。围绕市县党政机构改革、事业单位运行评估、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工作，深入开展调研，扎实组织2024年度机构编制重点课题研究工作，形成调研成果24项，择优向上推荐5项。针对市县党政机构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以及重点民生领域机构编制事项，组织专项研究论证，形成《信阳市机构改革方案》《信阳市执法队伍人员安置方案》等改革口径、框架方案，推动干部在参加或旁听论证过程中成长成才，打造机构编制人才“智囊团”“思想库”。探索中发现，部分调研局限于完成工作任务，干部旁听论证效果因人而异，而“机构编制主题论坛”由于能自选主题，吸引了不少干部自愿报名，引发强烈反响，并由此掀起了“比学赶超建新功”的热潮。

（三）强化多维历练，提升综合素质

作为对机构编制干部的更高要求，提升综合素质是提高机构编制工作质量的良方。信阳市委编办聚焦干部队伍普遍存在的“知识结构单一”“只专不博、学而不通”等问题，以高素质为目标，鼓励干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努力打造“见多识广”“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干部队伍。针对机构编制工作综合性的特点，开展“捐书·荐书·读书”活动，干部捐赠书籍87本，推荐采购图书226本，组织读书报告会6次，以书启智，以学增益，以“博”促“专”，促进机构编制干部队伍在广泛涉猎、交流互鉴中全面发展。

创造条件争取外派挂职锻炼等实践机会，推动干部跳出机构编制“小圈子”，在各领域实践“大熔炉”中反复摔打、淬炼成钢。近年来，先后有11名干部参加选派驻村、挂职锻炼、工作专班、审计巡察等工作，他们通过亲身实践，掌握了解了不同层级、不同单位的业务特点、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为进一步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结合“支部联支部”“我为群众办实事”，开展“除雪保畅通”“文艺走基层”“健康进万家”等志愿服务活动32次，为结对帮扶村（社区）协调解决项目资金，在发现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提升服务本领。探索中发现，部分干部安于现状，参加外派实践锻炼和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不高。而读书活动广受欢迎，不少干部联系机构编制工作自发开展交流，“书香编办”氛围愈发浓厚。

（四）强化刚性约束，提升纪律作风

纪律作风作为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是强化机构编制刚性约束的保障。信阳市委编办聚焦部分干部“自我要求不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以“作风优”为目标，层层压实责任，深化教育整治，推动建设勤勉务实、担当作为的清廉干部队伍。制定《市委编办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单》《市委编办2024年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要点》，明确“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压实各科室、中心责任，细化各个岗位、每名干部应当承担的共性责任和个性责任，确保责任明晰、任务到岗、不漏一人。结合党纪学习教育，采取读书班、警示教育会、支部研讨等多种形式研学《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其中领导班子成员解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9期、机关集体学习13次、党纪学习教育“支部大家谈”4次、观看警示教育片2次，专题研学《中央编办关于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严肃机构编制纪律有关问题的口径》3次，举办“廉政课堂”5期，开展廉“节”提醒7次，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结合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违规吃喝专项整治，排查治理机构编制领域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11项，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杜绝“靠编吃编”“违规吃喝”等违纪违规现象。探索中发现，党风廉政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成色不足，质量标准还有待提高。大部分干部表示，观看警示教育片、落马干部忏悔录，特别是本地发生的身边人、身边事，更令其感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三、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机构编制干部队伍几点思考

经过一系列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课题组认为，机构编制干部队伍建设中主要存在着两种需要：一种是事业的客观需要，也就是“需要什么样的机构编制干部”，这种需要由机构编制工作的特点和任务决定；另一种是干部的主观需要，也就是“机构编制干部需要什么”，这种需要由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决定。“需要什么样的机构编制干部”“机构编制干部需要什么”作为机构编制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问题，构成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机构编制干部的过程也正是致力于解决这一矛盾，架起干部主观需要“通往”事业客观需要的“桥梁”，从而实现主客观相一致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可见“机构编制干部需要什么”才是真正触及灵魂的东西，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信阳市委编办“四强化四提升”牢牢把握机构编制工作的特点任务，在解答“需要什么样的机构编制干部”过程中，逐步发现、关注并解决“机构编制干部需要什么”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实践中也发现不少“照本宣科”式的学习、会议等常规教育管理手段，因忽视人性需要，收效并不明显，而“机构编制主题论坛”“捐书·荐书·读书”以及外出实地教学等具体措施，正是

由于抓住了“机构编制干部需要什么”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反响超乎预期。因此，只有从人性的底层逻辑出发，关注、引导和满足机构编制干部内在需要，充分释放机构编制干部“自觉的能动性”，打破干部队伍建设依靠“外部推动”的传统路径依赖，才能推动机构编制干部朝着事业需要的“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高素质专业化方向发展。

（一）围绕生存需要，优化物质保障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机构编制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设，提供一系列制度类公共服务和产品，相应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保障。物质保障既是人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也是解除其后顾之忧、使其安心本职工作的首要前提。要从实际财力状况出发，用好现行工资福利政策，及时足额发放工资津贴补贴和各类奖金、缴纳“五险一金”，最大限度保障干部合法收入。加强公车、采购、食堂等机关后勤管理，既要落实厉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又要按政策规定保障干部必要的公务支出和餐饮需要。关心无房年轻干部，帮助其申请解决公租房、廉租房或人才公寓等保障性住房难题，确保住有所居。

（二）围绕发展需要，优化制度支撑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从深层次决定了职务职级晋升是干部重要的职业期待，充足的发展空间对干部的激励作用最为显著直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干部渴望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工作环境，希望自己的才能不埋没、成绩被认可、付出有回报。因此，必须尊重和满足干部正当合理的发展需要，通过分岗明责、精细管理、精准考核，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根据机构编制部门职能，设置综合文字、改革管理、窗口服务、机关党建、信息宣传等各类岗位，细化相应职责和 workflows，构建公平公

正的机构编制考评指标体系。设置共性指标，着重考评干部讲政治、听招呼、守规矩以及参与机关中心工作和自身建设情况；坚持结果导向，突出岗位特点，设置个性指标，比如窗口服务岗重点考核办件量和群众满意度，信息宣传岗重点考核信息刊发级别和数量。在精准考核基础上强化结果运用，优先提拔“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高素质专业化干部，让“干多干少”有区别、“干好干坏”不一样，激发干部“自觉的能动性”。同时，要注意约束和疏导人性局限性滋生的不良需要，坚决抵制“工作打太极、提拔打招呼”等歪风邪气，善于利用“从众心理”“面子文化”等人性特点服务事业发展，实现“化腐朽为神奇”。

（三）围绕求知需要，优化育人模式

求知是人的本性，“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然而，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干部的求知需要也必然是片面的、参差不齐的，要“结合干部的差异化需求和学历特点，分类制定培训大纲”，探索尊重干部主体地位、符合机构编制特点的育人模式，正向引导、调动和满足干部不同维度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注重把握专业性和实践性，整合骨干资源，通过双向选择合理分配导师，在工作实践中发挥传帮带作用；每年举办答辩会考核验收学满出师的徒弟，向业务岗位持续输送专业型干部。注重体现综合性，根据实际工作和干部“点单”，邀请经济社会发展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党校教师授课，拓展培训内容，培育复合型干部。注重增强趣味性，把教学课堂搬到展馆展厅、工厂车间、田间地头，通过实地参观、高科技模拟、兴趣沙龙等干部喜闻乐见的方式提升整体培训效果。注重回归实践性，鼓励干部在自愿基础上加入“AB岗计划”，A岗与B岗之间在位时职责明晰、信息互通，缺位时相互补位、无缝衔接，为干部学习新业务创造平台，减少职业倦怠；推动机构编制干部多“走出去”历练，在服

务中心大局和基层一线的实践中“壮筋骨”、长才干。

（四）围绕交往需要，优化队伍来源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现如今，八小时工作时间占据着干部全部生活的三分之一，工作交往是干部交往的重要内容。机构编制干部希望在工作交往中实现自身发展，就需要选择适合机构编制工作、本质上更加全面的人作为工作交往对象。因此，必须紧扣机构编制工作特点把好队伍“入口关”，在公务员招录、遴选以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做优干部增量，细化招考职位要求，切实从源头上选优交往对象。突出政治性，进入党的机关、政治机关，在政治面貌方面原则上要求应是中共党员，同时加强对考生及其重要社会关系的政治审查，做到宁缺毋滥。突出专业性，优先考虑公共管理类与机构编制工作相关相近的学科。突出综合性，围绕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学科门类，重点引进具有“双学位”、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突出实践性，机构编制工作需要当前党政事业组织架构、运转模式以及机关实务有一定了解，宜更多采取遴选方式选拔具备基层工作经历，尤其是具备组织人事工作经历或者综合文字工作经历的优秀干部进入机构编制队伍。

（五）围绕精神需要，优化人文环境

精神需要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更高层次追求，“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结合精神文明建设，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开展书画摄影展、趣味运动会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劳逸结合、张弛有度，营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机关氛围。强化人文关怀，鼓励干部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定期组织健康体检，关心干部家庭生活，在生日、结婚、生育等重要时刻送去组织的祝福；对于困难党员特别是遭遇重大疾

病、重大变故的干部，及时登门拜访、慰问帮扶、谈话疏导，以实实在在的组织温暖让干部安身、安心、安业。围绕身边人、身边事，挖掘在各类改革中涌现的机构编制先进典型，采取通报表扬、授予荣誉称号、向上级党委推荐等方式旗帜鲜明奖励表彰，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报刊等媒体大张旗鼓宣传报道，让争做榜样蔚然成风。增强职业认同感、荣誉感、自我价值感，通过点滴渗透和日常熏陶，引导干部认识到为党管好机构编制资源这一重要政治资源、执政资源责任重大，体会到有幸亲身见证、参与创造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使命光荣，领悟到“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总之，以人性为视角研究机构编制干部队伍建设创新性实用性在于，把建设路径从传统的“依靠组织外因推动”转移到“激发干部内因能动”上来。同时，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它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回答“需要什么样的机构编制干部”“机构编制干部需要什么”这对基本问题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只有结合时代发展不断阐释解读事业的需要、干部的需要，才能推动机构编制干部队伍真正朝着“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高素质专业化方向持续发展。

注释

① “四强化四提升”：强化理论学习，提升政治素养；强化专业训练，提升业务能力；强化多维历练，提升综合素质；强化刚性约束，提升纪律作风。

（课题组成员：张鑫、陈旭东、雷丰源、岳洪胜、胡谨博）

责任编辑 石艳艳

推动机关党建与机构编制业务 深度融合研究

商丘市委编办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推动机关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的“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重要精神的有效途径，也是处理好党建与业务的关系，解决“两张皮”问题的探索实践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商丘市委编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职责使命，突出党的机关、政治机关鲜明本色，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探索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以党的建设高质量确保机构编制管理高质量。

一、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背景及意义

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同向聚合、相互促进，既是历史宝贵经验，也是事业发展需要，更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存在着重业务轻党建、党建推动业务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为了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最大的发展优势，实现党建和业务互融互促，必须从政治机关属性的高度围绕中心抓党建，增强两者深度融合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一）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互融互促，是提升政治觉悟的必要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尽管职责分工不同，但都不是单纯的业务机关，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机关的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机关党建的关键点和重点，为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提供了明确指导，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机关党建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突出、作用重大，直接关系到中央各项决策的贯彻落实以及各项工作的推动。因此，应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支持“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机关党的建设作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互融互促，是提升党建质量的关键任务

机关党建在党的建设中承担着领导、指导和监督等职责，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推动改革的重要功能。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机关党建必须不断自我革新，与时俱进，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活力，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只有将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全面体现党建对业务工作的支持作用。应通过党建工作，将党的政治、理论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解决业务问题的有效工具，激发党员干部在岗位上发挥主导作用，提升机关治理能力。

（三）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互融互促，是提升行政效能的关键步骤

机关党建具有引领和推动业务工作，确保业务工作在正确的方向上稳步前进的强大功能。扎实推进党建工作能够为业务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和保障，有效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整体战略。通过党建工作，能够激发党员干部的内在动力，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克服困难，确保改革发展任务顺利完成。业务工作是衡量党建成效的重要依据，行政效能的提升也是党建工作有效性的体现。业务工作如果脱离党建的指导，就会失去方向，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只有党建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才能确保行政效能显著提升。

（四）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互融互促，是提升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

机关党员干部肩负着繁重任务和重大责任，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激发他们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热情，从而培养出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升队伍素质和工作业绩。党建工作贯穿业务工作全程，党组织的支持和保障有力促进了业务工作的顺利完成。通过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可以将党建责任融入业务工作的各个方面，提升工作效率。应通过党建理论和实践的引导，有效提升干部队伍的综合素养，推动业务与队伍建设的高质量协同发展。

二、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互融互促的探索和实践

近年来，商丘市委编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扎实开展以“强学习、重调研，提意见建议、创先进经验”为主题的专题活动，统筹推进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深入推进从严治党、从严治办，以党的建设高质量切实保障机构编制发展的高质量，机关党建与机构编

制业务互融互促、同频共振，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高举党建旗帜，强化政治建办

一是着力加强自身建设。市委编办作为党委部门、政治机关，始终把强化政治能力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打造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的高素质机构编制干部队伍。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的学习，提高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能力，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确保在各项工作中鲜明体现党的意志、党的立场和党的纪律，切实从政治上判断分析问题，对标归口管理查找差距、短板，深化比学赶超，确保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命。在党建引领下，全办上下凝心聚力、团结拼搏、务实奋斗、担当奉献，呈现出外部条件向好、内部士气向上、工作作风务实的良好局面。

二是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坚持将开展主题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跟上级部署，真正做到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形成强大的思想合力。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导教育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实干笃行。统筹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回顾历史，坚定信念，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知识竞赛中勇夺桂冠。大力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使党员干部在学思践悟中不断提升政治理论素养，强化理论武装。组织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通过历次主题教育，全办党员在真学真信中筑牢思想根基，在真懂真用中践行初心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三是全力争创“五星”支部。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向，提升有标杆必树、有先进必争的思想意识，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水平。扎实开展“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对照市级“星级支部”评定

标准，整改规范、稳步实施、全面提升，市委编办机关第一党支部、第二党支部先后被评为“五星”支部。

（二）发挥三大作用，勇当改革先锋

高质量完成各项机构改革任务是机构编制部门承担的首要政治任务。商丘市委编办以党的建设为引领，立足机构编制主责主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锐意改革、勇夺一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互融互促，将党组织和党员“当先锋、促发展、保稳定”作用发挥到关键处。

2023年以来，商丘市委编办将党建工作与各项机构改革任务紧密结合，牵头抓总做好“2+3”改革（2即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后半篇文章”，3即开展党政机构改革、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落地落实。通过回头看、深调研、抓整改、树典型，全面巩固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健全完善支持乡镇发展的配套保障措施，积极开展全市165个乡镇副科级机构创建工作，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做好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后半篇文章”，制定“五查五看”工作方案，深入市直部门和各县（市、区）实地调研，全面摸清涉改事业单位职能运行、机构挂牌、人员转隶、领导配备、资产划转等情况，推进机构、职能、人员深度融合，确保改革成效不打折扣。同时，积极稳妥推进落实党政机构改革、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三大改革任务，紧密结合商丘实际，明确了6个方面重点调研内容，深入开展摸底调研，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征求到的意见建议，逐一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梳理涉改部门职能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领导职数等现状，按照时间表和路线图，有组织、有步骤、有纪律地推进落实各项改革任务。

（三）践行宗旨使命，深化为民服务

牢牢把握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职责使命，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优化党的执政资源、政治资源配置。

一是大兴调查研究。纵深推进“强学习、重调研，提意见建议、创先进经验”专题活动，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调研，切实拓宽视野、找准差距、摸清底数，为机构编制工作的科学决策部署提供有力支撑。办领导班子先后4次带队赴山东、江苏、浙江等地调研考察，围绕“新形势下机关党建工作全面提升路径研究”“构建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全过程管理体系”等课题，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取长补短；落实“1+1+1+N”联系机制，主动对标对接省内外先进地市党委编办，取“他山之石”，攻“改革之坚”；围绕乡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多个改革任务，分组分批对全市165个乡镇开展了多轮实地调研。同时，注重调研成果转化和实践运用，调查后及时研究、总结提炼，积极将调研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 and 解决难题的措施。召开3次调研成果交流会和典型案例剖析会，总结交流调研成果，形成多篇高质量调研报告，部分调研报告在《改革内参》《行政科学论坛》《调查研究》等期刊上刊发。

二是抓实重点工作。对照省委编办、市委编办年度工作要求，有序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积极推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改革，整合疾病预防控制、疫情应急处置、公共卫生监督等职责和机构，依托市卫生健康委，以挂牌设置的形式组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织密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防护网”提供了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全面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抢抓豫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研究制定了豫商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定”规定，助力豫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高质量开局。巩固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联合有关部门梳理汇总县（市）权限需求，赋予县（市）第二批86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2023年以来，针对省赋予县（市）的339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各县（市）

共受理办理13万余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三是保障民生领域。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加大民生领域调研力度，精准查找群众反映强烈问题背后的机构编制问题，将各项改革精简收回的编制向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基层一线和民生领域倾斜。先后为乡镇增加编制4000余名，将为基层减负增能的要求落到实处，有效充实了基层工作力量，真正把编制资源用在了“刀刃”上。全力为公开招聘和招才引智做好保障，积极配合组织人社部门开辟“绿色通道”，高效率完成市直80余个事业单位招聘和引才用编申请的审核工作。保障全省统一考试录用（遴选）公务员使用空编100余名，接收省选调生、军转干部、退役士兵等60余人，为人才引进提供了坚强的编制保障。

三、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在实际工作中，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是党建与业务融合不够的主要障碍。一方面，部分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业务工作是直接体现工作成效的“硬指标”，而党建工作则相对抽象，容易被当成额外的负担，忽视了对业务工作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干部对党建与业务关系的认识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理解二者内在的互补性和协同性，导致在工作中无法将两者有效结合。一是部分党员干部缺乏对党建工作的系统学习和深刻理解。他们往往把党建工作简单地等同于参加学习、组织活动和思想教育，没有认识到党建工作在推动业务工作、提升工作效能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导致对党建工作的整体重视不足。二是部分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他们认为业务工作直接关系到单位的绩效和考核，而党建工作则是“软任务”，可以放在业务工作之后考虑。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脱节，无法形成合力。三是

部分机关单位对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理解不深。对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结合形式上，没有深入挖掘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无法从全局高度来推动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二）创新载体不够丰富

常见的机关党建活动如专题党课、学习研讨等形式，在传递党的理论和政策方面有其必要性，但若仅限于此，往往无法激发党员干部的参与热情，也无法与业务工作产生实质性的互动。缺乏创新载体，意味着党建活动难以深入到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也难以形成对业务工作的有力支持。在实际工作中，党建活动创新载体不足的表现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党建活动缺乏新颖性和吸引力。传统的党课和学习研讨虽然重要，但形式单一，容易让党员干部产生厌倦情绪，影响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党建活动与业务工作结合不够紧密。一些机关单位的党建活动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层面，没有结合具体的业务工作设计和实施，导致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出现“两张皮”的现象。三是缺乏有效的机制和平台来促进党建与业务的互动和融合。部分机关单位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党建工作机制和平台，缺乏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具体措施和手段，导致党建工作难以在业务工作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三）统筹谋划缺乏深度

在谋划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时，往往将两者分开考虑，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出现脱节。此外，对于如何深度整合党建资源与业务资源，如何构建长效机制以推动深度融合，很多部门缺乏深入研究和实践。这种现象使得党建与业务的融合往往流于表面，难以形成持续、稳定、深入的互动效应。一是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一些机关单位在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的过程中，没有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进行统筹谋划，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的规划设计，导致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之间的结合不够紧密，融合效果不佳。二是

是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操作细则。部分机关单位虽然能认识到党建与业务融合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详细的方案和操作细则，导致工作推进难度较大，成效不明显。三是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部分机关单位在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的过程中，没有建立起科学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未能有效激发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影响了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效果。

四、推动机关党建与机构编制业务深度融合的对策和建议

（一）提升思想认识，增强融合意识

提升思想认识是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必要前提。一要提高对党建工作重要性的思想认识。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增强对机关党建重要性的认识，深刻认识机关党建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机关党组织在机关工作中发挥着协助和监督的重要作用，肩负着把握方向、服务中心、建设队伍、引领群众的重要职责，必须切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二要树立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融合意识。树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观念，使之成为统领机关目标任务工作的度量标准，并贯穿于机关党建工作各方面和各环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使机关党建有机融入和服务于地方改革发展大局。三要加强机关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党建工作不到位，究其深层次原因，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是既不“用脑”又不“用心”的问题。要加强机关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强化政令畅通，树立党政工作目标任务“一盘棋”的理念，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不能各行其是、一盘散沙。党组(党委)班子成员应该坚持把党的理论及时转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新思路、新策略，做以学

促做的带头人。

（二）丰富活动载体，增强融合实效

创新党建活动载体是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机关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创新党建活动载体，增强党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要创新活动形式，增强活动吸引力。根据党员干部的实际需求，设计和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建活动，如党建知识竞赛、红色剧本杀、情景党课等，增强党员干部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二要结合实际业务，增强活动实效。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等，将党建活动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推动党建工作融入业务工作全过程，增强党建活动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三要搭建交流平台，促进互动融合。搭建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交流平台，通过组织座谈交流等形式，促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互动和融合，增强融合效果。

（三）加强统筹谋划，构建长效机制

加强统筹谋划是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关键举措。要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构建长效机制，推动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融合。统筹谋划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确保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二要细化实施方案，确保落地见效。根据实际情况，细化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三要建立考核机制，强化激励引导。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以业务成效检验党建成果，形成党建与业务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课题组成员：张晓东、冯庭辉、周杨、宋珍珍）

责任编辑 朱亚娟

濮阳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中长期供需趋势研究

濮阳市委编办课题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教职工编制作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要随着学龄人口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为此，必须对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做出预判，加强教职工编制供给的顶层设计和长远谋划。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濮阳市年人口出生数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中小学在校生的数量和分布，进而对教职工编制资源的需求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机构编制部门应根据中小学在校生数量和分布变化的趋势、规律，科学预测中长期教职工编制供需关系，为编制资源的动态调整和合理配置提供充分依据，充分发挥教职工编制效益，不断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变化、新需求。为此，濮阳市委编办深入市直相关单位和所辖县(区)相关中小学校、教学点调研座谈，与统计、公安、卫健等部门沟通交流，收集分析近十年统计年报、户籍管理的出生人口数与教育统计提要各学段在校生数等数据之间的关系，预测2024年至2029年全市中小学在校生数量和分布的变化趋势，测算教职工编制需求情况，提出濮阳市今后5年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资源配置的意见建议。

一、近年来濮阳市学龄人口变化趋势

(一) 全市出生人口变化情况

本文所涉及的出生人口数据主要是依据市

统计部门发布的统计公报和户籍管理部门提供的户籍数据。

1.统计公报出生人口数据。根据市统计部门统计公报2014年至2023年每个自然年(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的人口数据，全市出生人口数到2016年突然增到峰值后开始逐年下降，到2023年全市出生人口与2016年相比几近减半(见图1)。



图1 2014年至2023年濮阳市统计出生人口变化情况

2.户籍出生人口数据(截至2024年4月)。根据户籍管理部门提供的参照学年(上年的9月1日至本年的8月31日)统计的2014年到2023年出生人口数据，这10年该数据整体呈下降趋势，但2016年、2017年略有回升(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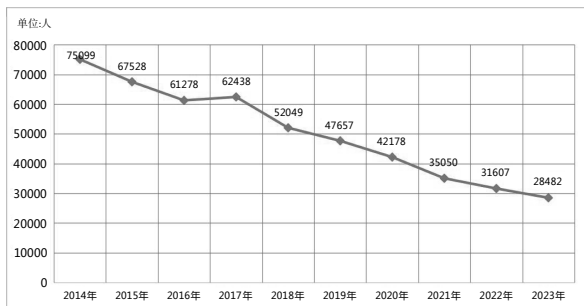


图2 濮阳市2014年至2023年户籍出生人口变化情况

3.根据户籍出生人口数推算小学新入学一年级人数。为更准确测算当年出生人数与6年后小学一年级新生数(按照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需年

满6周岁的年龄要求)的对应关系,课题组根据市教育局统计的2020年至2023年(暂无2024年数据)小学一年级学生数(7.3万、6.98万、6.14万、6.13万)和与之对应的2014年至2017年的户籍统计的出生人口数(7.5万、6.76万、6.13万,6.24万)可以看出,上述4年小学一年级学生数和与之相对应6年前户籍出生人口数基本契合。鉴于此,在测算2024年至2029年全市小学一年级新生数时,采用2018年至2023年户籍出生人口数据。

(二) 2024年至2029年全市小学一年级新生人数变化情况

根据测算,小学一年级新生人数为:2024年5.2万,2025年4.8万,2026年4.2万,2027年3.5万,2028年3.2万,2029年2.8万。根据《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规定,民办学校学生占比5%,公办学校学生占比95%,可测算2024年至2029年全市公办小学一年级学生数,结合2020年至2023年数据可看出整体变化趋势(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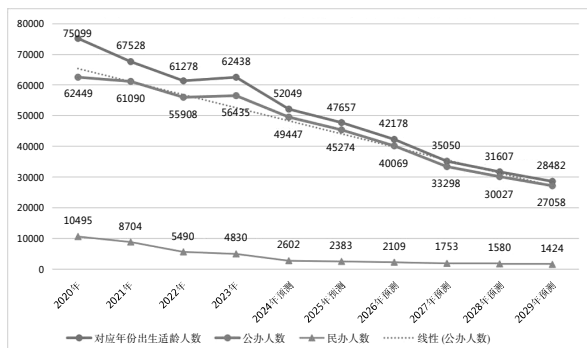


图3 2020年至2029年小学一年级入学人数变化趋势

(三) 2024年至2029年全市中小学在校生人数测算

1.义务教育阶段测算。根据教育部门统计数据,2020年至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占比分别为18.3%、15.7%、13.9%、12.3%,占比均高于5%。

按照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占比不超过5%的要求,结合民办学校学生超5%有可能回流的情形,以下每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校生数均按照两种情况测算:一是新入学小学一

年级民办学校学生数占比按5%计算,其他年级增一级后仍按原有存量计算。二是新入学学生和原有学生数均按民办学校学生数占比5%计算(民办学校学生存量中超出5%的部分回流到公办学校)。

(1) 小学阶段。每年都有新一年级学生入学,原六年级学生毕业。每年小学在校生总量=本年新入学一年级学生数+上年在校生总量-上年六年级学生数。

①仅一年级新入学学生按民办学校学生占比5%计算。2024年公办小学在校生总量=2024年一年级新入学学生数×95%+2023年公办小学在校生总量-2023年公办小学六年级在校生学生数。据此测算出2024年至2029年全市每年公办小学在校生数分别为35万、33万、31万、28万、23万,结合2020年至2023年小学学生实际情况,可看出2020年至2029年公办小学小学在校生数变化趋势,民办学校在校生数同理逐年推移(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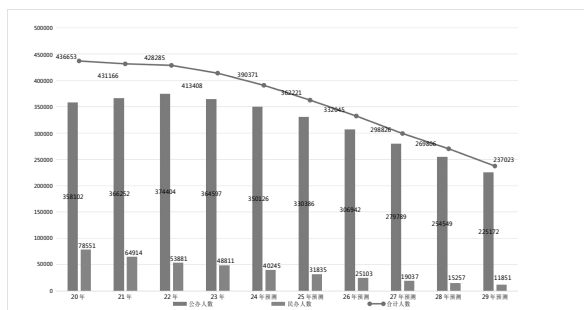


图4 2020年至2029年小学在校生数变化及预测情况

②若考虑义务教育阶段现有民办学校学生总量占比压缩到5%,则2024年至2029年全市每年公办小学在校生数别为37万、34万、32万、28万、26万、23万,结合2020年至2023年小学学生实际情况,可看出2020年至2029年公办和民办小学在校生数变化趋势(见图5)。

(2) 初中阶段。每年都有新一年级学生入学,原三年级学生毕业。每年初中在校生总量=本年新入学一年级学生数+上年在校生总量-上年三年级学生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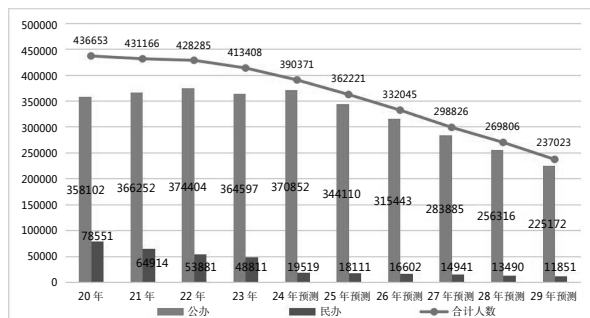


图5 2024年至2029年小学在校生数变化及预测情况
民办小学在校生数占比均压缩到5%

①2024年公办初中在校生总量=2024年一年级新入学学生数(即2023年小学阶段六年级学生数)×95%+2023年公办初中在校生总量-2023年公办初中三年级在校生学生总量。从据此测算出的2024年至2035年全市每年公办初中在校生数,可以看出初中在校生数在2025年达到峰值,之后逐年下降(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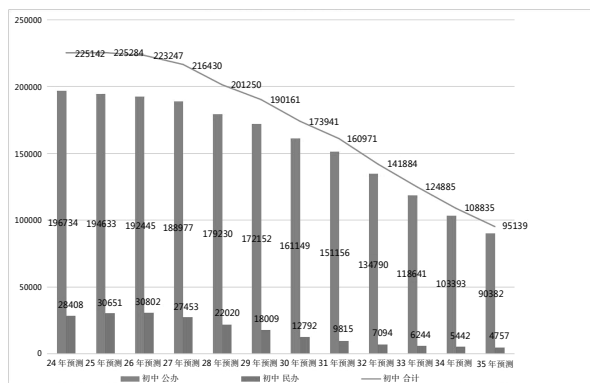


图6 2024年至2035年初中在校生数变化及预测情况

②若考虑义务教育阶段现有民办学校学生数压缩到5%以下,则2024年至2035年全市每年公办和民办初中在校生数的变化趋势如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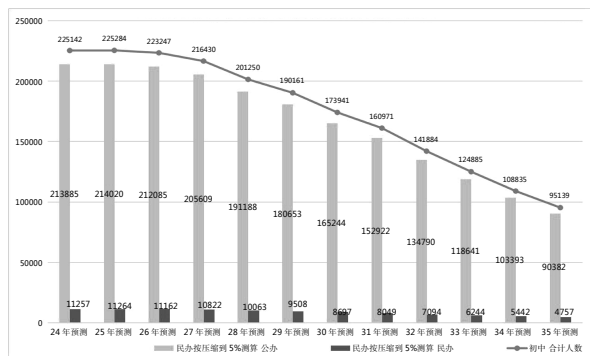


图7 2024年至2035年初中在校生数变化及预测情况

2.高中阶段。高一新生需在初中毕业生中通过中考进行选拔,还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生分流到

中职学校,因此初中毕业人数和高中入学人数不对等。近3年(2020年至2022年)初中毕业人数分别为6.2万、7.2万、6.6万,对应的高中一年级入学人数分别为3.1万、3.3万、3.8万。初中毕业人数与高中一年级入学人数的比平均约为2:1。其中公办高中新生人数与民办高中新生人数差距不断缩小,如2021年公办高中新生1.8万人、民办高中新生1.3万人,2022年公办高中新生1.8万人、民办高中新生1.5万人,2023年公办高中新生2万人、民办高中新生1.8万人。考虑到市教育主管部门掌握的民办高中学生占比略低于公办高中学生的原则,2024年之后的公办、民办高中新生人数暂按2023年的11:10的比例测算。暂不考虑高中新建、扩招等无法预料的因素,根据2024年至2038年初中毕业生数进行测算,普通高中在校生数呈先上涨、后企稳、再下降的趋势,高中在校生数到2028年达到顶峰,之后逐步下降,到2038年在在校生数不到2024年的一半(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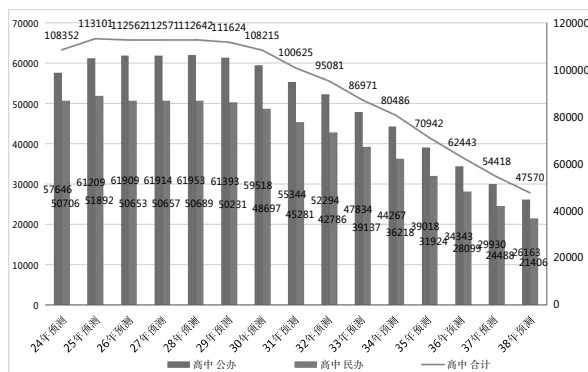


图8 2024年至2038年高中在校生数变化及预测情况

3.特殊教育。考虑到特殊教育学校的规模,以及近几年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增幅,总体较为平稳,未来5年暂采用2023年在校生数。特校学生数量较小,不会对教职工编制预测产生大的影响。

二、中小学教职工编制需求分析

在测算的2024年至2029年全市中小学各学段及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和省确定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核编标准,对2024

年至2029年所需教职工编制总量进行核算、预测和分析。

(一) 测算原则及标准

根据中央统一规定的中小学教职工核编标准直接计算得出基本编制，考虑到女教师生育、教学点差异以及高考课改等因素在基本编制的基础上加上3%的附加编制计算。

(二)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需求理论值预测

1.按只有新入学小学一年级民办小学学生数占比5%(公办小学学生数占比95%)测算。其他年级民办、公办小学学生数维持存量，逐年往后推移。经测算，编制需求和变化有关情况如下。

(1) 总体编制需求和变化情况。结合2021年至2023年实际所需教职工编制数据，与省核定的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量相比，濮阳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量从2021年就开始冗余，2022年编制冗余量减少，2023年编制稍有不足，2024至2029年编制冗余量稳步增加：2024年冗余编制70余名，2025年冗余编制1000余名，2026年冗余编制2000余名，2027年冗余编制4000余名，2028年冗余编制6000余名，2029年冗余编制8000余名。

(2) 各学段编制需求变化情况。从全市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来看，2021年至2029年，教职工编制需求量小学从2023年开始逐年下降，初中自2026年开始逐年下降，高中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编制需求的增加数量远低于小学、初中编制冗余数量)，到2028年达到峰值(需编制5105名)，2029年开始下降。

2.按义务教育阶段所有民办学校在校生数占比均压缩到5%测算，超出5%的部分回流到公办学校。

根据教育统计数据，2020年至2023年，连续4年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数和占比分别为：2020年11.7万，占18.3%；2021年10.17万，占15.7%；2022年9万，占13.9%；2023年7.9万，占12.3%。以上占比均高于5%。假定从2024年开

始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数占比超出5%的部分全部回流到公办学校，公办学校在校生数变大。在此基础上对2024年至2029年中小学编制需求量测算如下：2024年4.1万余名，2025年4万余名，2026年3.8万余名，2027年3.6万余名，2028年3.4万余名，2029年3.1万余名。与省核定市编制总量相比，市教职工编制需求量先缺后余，其中：2024年缺2000余名，2025年缺1000余名，2026年冗余400余名，2027年冗余2000余名，2028年冗余5000余名，2029年冗余7000余名。

3.中小学教职工编制需求分析。从以上测算情况看，无论是按只把新入学小学一年级民办学校学生数占比5%(公办学校学生数占95%)测算，还是按民办学校所有在校生数占比压减到5%测算，省核定的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都能满足当前和今后全市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只是如果把民办学校在校生学生数占比全部压缩到5%，濮阳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量仅在2024年和2025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口，但到2026年就开始出现冗余。

根据有关政策，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数占比超过5%的部分可以通过分流到公办学校，或地方政府购买学位的方式解决。考虑到财政现状、民办学校生存以及学生自身需求等因素，各县一般都是通过购买学位的方式解决超出5%的部分这一问题的。因此，课题组采用仅新入学小学一年级学生按民办学校学生数占比5%，其他年级和学段民办公办学校学生数存量不变、逐年推移测算出的数据。

三、建立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中长期保障机制的建议

(一) 市城区和各县教职工编制总量近五年暂不做调整

根据测算结果，2024年至2029年濮阳市教职工编制总体呈冗余状态。具体到市城区和各县：市城区(含华龙区、经开区、示范区、工业园区)

从2024年开始出现编制冗余，之后冗余量逐步增大；所辖五县中，清丰县从2024年开始出现编制冗余，濮阳县、南乐县、范县、台前县等四县在2026年之前不同程度缺编，但到2027年基本上都开始出现编制冗余。

部分缺编县的缺编问题不具有可持续性，不建议通过区域间调编的方式解决。确实需要编制的，可从本县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中收回的编制中调剂一部分予以解决，待教职工退休空出编制后，再调回这部分编制。在各县(区)教职工编制大量冗余之后，市委编办可考虑将各县(区)冗余教职工编制统一收回，统一管理，方便下一步全市统筹使用。

(二) 建立中小学教职工编制需求预测机制

市、县(区)机构编制部门要会同本级教育部门建立以出生人口、学龄人口为基本数据库的动态预测机制，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城镇化进程、流动人口变化等因素预测学龄人口规模和结构分布的变化，并将测算精准到校，同时结合对现有各县(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资源存量、配置以及人员结构、人员退休等情况的分析，科学预测本辖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需求变化，为编制资源的宏观调控和精准配置提供较为精准的数据支撑，有效提高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资源使用效能，同时为下步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量进入富余期后的有序消化奠定基础。在为具体学校重新核编或者批准该校用编进人时，要根据近几年该校学生数量的变化趋势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不能仅依据当前学生数量或根据当前编制数量核定编制，批准用编进人。

(三) 激活现有教职工编制和教师存量，严控新进人员数量

一是做好教职工编制和教师总量控制。今后几年，因学生数量的不断减少，教职工编制和教师数量都会逐步出现冗余。从教职工编制方面看，从2024年开始全市教职工编制开始冗余[大部分县(区)从2027年开始冗余]，其中小学和初

中编制冗余问题首先出现。从实有人员方面看，假设从2024年开始不再新进人员，同时考虑到延迟退休等因素，全市教职工在2024~2027年呈缺额状态，2027年后开始出现冗余。

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从2024年开始全市不再招聘新的老师，3年后仍然会出现教师冗余。当前在教师总量缺少1200余名的情况下，市县乡三级学校运行正常，其中的主要原因除了存在临时聘用教师外，还有大班额因素(大班额的存在无形中降低了师生比，比如小学一个班57名学生可以核3名编制，一个班38名学生可以核2名编制，但这两个班实际需要的老师数量是一样的。大班额节省教师)。所以，从理论上讲，近3年可以不再招聘新的老师，部分学校暂时维持当前的大班额，已经聘用临时老师的学校可以根据学生减少情况逐步减少临时老师的存量，以确保在不增加新在编老师的前提下维持当前的教学任务。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教学需要，实行“退三进二”或“退二进一”等多出少进的方式来解决教师刚需。

二是要打破各学校之间教师调配的壁垒。近几年，虽然学生总量在减少，但各学校学生减少程度和速度不一样，同年教师退休数量也不一样。这会造成同一时期不同学校编制和教师余缺不一，这就需要教育部门根据各学校在校生变动情况对教职工编制和教师资源进行统筹调整。县(区)应继续深化“县管校聘”制度，推动教师的身份由“学校人”向“系统人”转变，根据需要更加灵活地在各个学校之间调配，有效化解区域性、结构性编制供给问题。在实行相同学段学校之间教师调配的同时，也要探索中小学教师跨学段调配。结合各县(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需求峰谷交替情况，探索推动跨学段教师动态调配，推动区域内师资力量均衡配置，缓解编制需求压力。在初中在校生数高峰阶段，选拔相应资格的小学教师到初中任教，在校生数高峰滚动到高中后，选拔相应资格的小学、初中教师到高中任

教，弥补学段阶段性教师缺口。

三是实行“合点并校”，激活教师存量。虽然县(区)编制总量充裕，但由于有农村小学教学点的大量存在，实际教职工和学生人数之比远远高于核编标准，致使农村学校编制大量浪费与县城区学校编制不足的现象同时存在。比如，2024年4月濮阳县实行“合点并校”工作之前，该县100人以下的农村学校有193所，占全县农村学校的60%，平均班额9.4人，却占用教师1000余人，师生比1:5.4，若按照核编标准计算，只需要不足300名编制，编制和教师资源严重浪费。若实行“合点并校”，多出的编制和教师可用于其他缺编学校。目前，濮阳县、范县等已经开始实行“合点并校”，濮阳县预计撤销150余个教学点，这将会大大盘活编制存量。

(四) 研究完善教职工编制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冗余教职工编制的作用

一是提高中小学师生比，加大教师数量和质量保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小学教师配备标准偏低。2020年OECD(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小学、初中师生比平均值分别为1:14和1:13，均高于我国现行标准。世界范围内中小学教师配备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教师配备也越来越充足。例如1996年，OECD国家小学、初中师生比平均值分别为1:18.3和1:15，到2020年发展为1:14和1:13。另外，从班额的角度来衡

量，我国中小学班额明显较大，现行的标准班额为小学45人、初中50人，该标准尚未全面实现。根据OECD 2022年发布的数据，我国小学和中学的平均班额分别是38人和46人，而OECD国家小学和中学班额的均值分别为20人和23人。建议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适当调高中小学师生比，进一步提高教师数量和质量保障，助推中小学高质量教育均衡发展。

二是探索将幼儿园纳入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保障范畴。根据濮阳市教育事业统计公报统计，无论是幼儿园数量还是在园幼儿数量，民办园都占三分之二以上份额。近几年，因出生人口下降，民办幼儿园入园幼儿开始大量减少，减少到一定程度后，民办园会因运营成本过高而关闭。2021年至2023年民办幼儿园关停100余所。民办幼儿园关闭后，在园幼儿需要妥善安置。鉴于下一步中小學生大量减少，教职工编制大量冗余，很多中小学校可能出现闲置，可根据实际需要，将闲置的中小学校改建为幼儿园，同时将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使用范围扩展到幼儿园，这样既可以使闲置的校舍和冗余的教职工编制得到充分利用，又能在推动幼儿教育社会公平方面迈出全新的一步。

(课题组成员：刘彦华、樊阳峰、张晋伟、王俊霞)

责任编辑 石艳艳

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 统筹调配编制资源研究

安阳市委编办课题组

机构编制是重要政治资源、执政资源。近年来，安阳市委编办始终坚持鲜明的基层导向，强化资源统筹，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加大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统筹调配，提升编制使用效益，有力服务保障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市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一、背景和意义

（一）统筹调配编制资源的背景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是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机构改革是党和国家在以往历次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的持续深化，旨在通过调整完善体制机制和机构职责，更好地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新任务。编制的统筹优化工作在机构改革与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系统工程中极为重要。在历次机构改革中，优化调整编制都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编委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科学规范从严管理。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机构编制工作不仅要算数字账、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长远账，把有限的机构编

制资源精准投放到关系民生福祉、强基固本的薄弱环节。”《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也明确要求建立编制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按照机构编制管理权限，加强编制的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建立地区间、部门间、层级间编制动态调整机制。无论是改革要求，还是法律规定，都对编制管理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合理配置编制资源，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统筹调配编制资源的意义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探索统筹优化编制资源管理的新办法、新路径，是顺应新变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是增强机构编制服务保障作用的需要，也是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市的需要。通过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统筹调配编制资源，打破地区、部门、层级壁垒，可以优化编制配置结构，将各类沉睡编制“调”活，有利于解决现存的编制供需矛盾，激活闲置的编制资源，提升编制使用效益，对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大意义。系统

完备的机构设置、运行顺畅的职能配置、科学合理的编制核定，对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机构编制管理规范化、法治化、科学化建设应当伴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而延伸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尤为需要坚实的机构编制力量支撑。

二、实践和探索

（一）“减上补下”推动编制资源向乡镇（街道）下沉

安阳市持续深化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派驻机构属地化管理，采取“减上补下”“减县补乡”等方式，逐步向基层下沉编制。全市乡镇平均编制数提升到45名以上，全市街道平均编制数增长至70余名。同时，按照省委、市委有关要求，打破行政和事业一般岗位限制，实行编制分类管理、人员统筹使用，乡镇（街道）在人员分配使用方面更加灵活，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力量得到加强。严格落实乡镇干部工资倾斜有关政策，确保乡镇机关工作人员收入高于县（市、区）直机关同职级人员20%以上，落实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向乡镇倾斜政策，形成“年轻干部争下基层”的鲜明导向。

（二）动态调整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2023年9月，为加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统筹配置力度，着力解决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在区域层面的结构性矛盾，依据全市中小学在校生情况，会同教育部门对全市中小学教职工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做到了“底数明、数字准、编制清”，并对市本级和县（市、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进行了重新核定，确保全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配备达到国家基本编制标准。2021年至今，安阳市下辖县（市）的教职工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市辖区的教职工数总体呈增加趋势。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二胎”“三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安阳市委编办主动分析市直和各县（区）生源变化趋势，充分考虑小规模学校、课程改革、高考改革、特

岗教师入编等因素，着眼于破解教育领域编制资源紧张、利用率不高等突出问题，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先后动态调整编制700余名。

（三）统筹使用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中精简的编制

加大重点领域编制资源的倾斜力度。自2022年以来，为市应急管理局、市住建局增加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各县（市、区）同步调整了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加强了行政机关监管力量和事业单位保障力量。通过“减上补下”的形式，将市本级150名事业编制下沉到县（市、区），专门用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有效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编制资源不足的问题。为完善基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机制，通过“减上补下”的形式，向4个市辖区定向下沉160名事业编制，专门用于加强城市管理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力量。

（四）创新人才引进机制

在市本级事业编制总量内调剂人才专项编制1000名，其中一部分专门用于保障满编事业单位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打破人才引进用编瓶颈，另外一部分专门用于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以“政企双聘、政聘企用”方式引进人才，为“人才强市”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发挥人才引进“绿色通道”作用，根据《关于创新事业单位引才机制开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安阳市引进人才使用编制管理办法》等，为市文物局、中国文字博物馆、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等单位申请使用人才编制开通“绿色通道”，提升人才引进便利程度，为事业单位引进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为进一步增强开发区对人才的吸引力，探索“编制在市里、工作在县（市、区）”模式，为开发区核定人才专项编制20余名。

（五）整合医疗卫生资源

积极配合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印发《市级公立医院和公办学校内设机构操作规范（试行）》，明确在

人员控制总量内，公立医院、公办学校根据工作需要，按照精简、效能原则可自主设置和调整内设机构。各县(市)对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内的公立医院实施备案制管理，在同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内，同层级、同经费渠道的事业编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进入人才编制“周转池”，相互调剂使用，但不得超出同级核定编制内空编总额；将同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内同层级公立医院之间在编在岗人员发生人事关系变动的权限下放至县卫健委，报机构编制部门备案。

三、存在的问题

(一) 不同类型编制的管理权限不同

行政编制的审批权限在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明确，我国实行行政编制垂直管控体系，国务院掌握法定审批权，中央编办负责中央部门与地方各级编制总量核定。地方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可以根据职责调整，在总额内对本级部门之间的行政编制进行调整，但涉及不同层级的编制流转，需由省级机构编制部门报中央机构编制部门审批，且严格控制将下级行政编制跨层级调整到上级使用。

事业编制实行分级管理。事业编制使用范围严格限定于公益服务单位。中央编制主管部门对省级行政区划内的编制规模与类型配比实施宏观调控。上级编制部门对下级单位实行总量与结构的周期性评估机制。另外不同经费来源的事业编制的审批权限也有差异，财政供养编制扩容需编委决策，自收自支编制调整由编办终审，两类编制转化实行严格控制。

(二) 编制规模的政策约束

在机构编制管理权限体系基础上，同步建立人员配置总量约束机制。中央确定编制总配额后，各行政管理条线需按照“逐级分解、分类下达”原则，完成本系统及辖区内的编制资源分配。《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机构编制管理严格控制机构编制的通

知》明确规定，我国行政编制总量决策权专属中央层级，实行全国统一管理。各级地方严禁突破中央核定的编制总量红线，禁止以任何形式变相增设党政机关编制。省级编办负责制定本地事业单位编制管理规程，上级编办通过动态监测系统实现跨层级编制结构调控。

(三) 编制资源配置矛盾突出

配置矛盾普遍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行政和事业编制配置不平衡。行政编制的紧张态势普遍存在于各级机构，而事业单位编制凭借其较大的地方管理自主权和总体规模优势，具备更大的弹性空间。从编制构成来看，行政机关内部呈现编制结构性短缺，其中政法专项编制相对宽裕，而事业单位系统内部则存在明显的编制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二是不同层级的编制总量不均衡。层级越低编制总量越紧，县乡两级问题最为严峻，其编制总量难以满足新时代发展需要，加之政策限制，不同层级之间编制结构性矛盾突出。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纵向编制调剂通道尚未打通，导致乡镇层面的冗余编制资源无法有效支援县级行政需求。三是不同地区编制总量不平衡。经济高增长区域普遍面临编制短缺压力，难以匹配快速扩张的公共管理需求。同一行政区域内部也存在编制分配不均现象。四是部门之间编制不平衡。一方面部分单位存在编制资源浪费现象，核定编制多，实际工作人员少，导致编制资源闲置，利用率不高，没有实现最大效益；另一方面基层行政编制分配较少，县(市、区)编办普遍反映县级行政编制紧缺，如内黄县有7个局委分别仅有8名行政编制，龙安区多数机构的行政编制数等于领导职数，内设机构没有编制可用。

四、思考和建议

(一) 从编制分类的角度思考编制资源统筹调配

一是区分编制类型统筹调配。某些特定机构使用的行政编制单列管理，一般由中央统一核

定,逐级下达,专项使用。对于人员编制性质相同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统,可放宽政法专项编制的跨系统、跨层级调配,将空余人员编制调配到编制更加紧张的公安和法院。同时,可建立专项编制转换机制,逐步将政法机关后勤支持岗位现行的政法专编调整为标准行政编制配置。鉴于司法部门职责已经明显区别于公检法,可将司法机关编制纳入一般行政机关管理范围,退出政法专项序列。还可再进一步,采用行政编制统一管理机制,取消内部细分类别设置,不再单列专项编制,通过行政编制统筹使用,最大限度提升行政编制的综合使用效能。事业编制本身没有进行分类管理,其在所有编制总量中占比较高,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也不再区分公益一类和二类事业编制。可不再区分全额、差额、经费自理事业编制,考虑到事业单位公益属性,对事业单位可逐步淡化身份管理,允许事业编制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统筹调配。

二是打破编制类型统筹调配。借鉴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深化机构编制管理创新,推广“大编制”的理念,实现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统筹。目前这一办法主要运用于乡镇(街道)这一层级,通过编制分类管理、人员统筹使用,打破行政和事业岗位限制,人员分配使用更加方便灵活。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统一使用,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能极大拓展各级政府编制统筹的空间和余地。建立编制资源的全域统筹机制,虽然编制数量没有增加,但是通过系统化整合与动态化配置,可深度激活现有编制资源的潜在效能,实现存量资源的价值重构,化解编制供需矛盾。

(二) 从跨地区的角度思考编制资源统筹调配

跨地区统筹调配编制旨在满足不同地区对编制的需求,解决编制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从编制配置现状看,各地编制资源分布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不仅存在于省级层面,省内各地市、地市各县区也同样存在。总的趋势是,编制需求与人口

和经济发展状况正向相关,即人口多且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对编制资源需求更大,人口少、经济发展缓慢的区域编制资源存有余量。跨地区统筹编制资源可以参照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立的思路,即在总量管控前提下,实行编制所有权与使用权结构性分离,建立使用权流通制度。省级统筹需设计包含空编规模、人口净流量等参数的资源配置算法,将编制由盈余地区调剂至相对紧缺地区,提升编制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 从跨部门的角度思考编制资源统筹调配

跨部门统筹调配编制旨在建立编制横向流动的动态平衡体系,解决编制配置不平衡的问题。机构编制资源“一核定终身”“部门所有”观念根深蒂固,编制调整阻力大,“编随事走”难以落实。因此,对于破除部门本位主义这一难题,需要高度重视。编制配置的前提条件是职权法定,建议强化机构编制法定化,根据职能配置的动态变化跨部门调配编制,打通部门间的阻隔,增强编制的流动性,确保机构职能与人员结构的动态平衡。同时,长期来看,部门编制配置应该随着职能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周期性根据职能增减及履职情况,合理调整各部门编制数量。

(四) 从跨层级的角度思考编制资源统筹调配

跨层级统筹调配编制旨在建立编制纵向流动的动态平衡体系,解决编制总量少的问题。建议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变化,放宽编制流动限制,允许对编制进行跨层级调整。比如,在“放管服”改革中,各级政府向下转移行政审批事项,同时也是一种职能调整,应当同步调整编制配置,确保权责一致。再如,随着城镇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凸显,市辖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增加,编制资源趋于紧张,需要探索市辖区和县级政府编制的调配机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并配套相应的监督机制。

(课题组成员:张艳民、宋艳军、牛京甲)

责任编辑 朱亚娟

机构编制执行情况与使用效益评估的探索与思考

平顶山市委编办课题组

作为机构编制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开创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新局面的创新之举，加强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对评估的标准和方法、评估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评估工作需要在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加强。

一、机构编制执行情况与使用效益评估的意义

机构编制是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执政资源，其管理工作是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巩固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战略高度统筹推进此项工作。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纲领性论述，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机构编制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做好新一届中央编委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对“做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织实施工作”进行系统部署，为新征程做好机构编制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第486号令公布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首次提出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定期开展机构与编制执行情况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机构编制动态调整的参考依据”的要求。2019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机

构编制工作条例》进一步规定，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办)需运用科学方法，对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及使用效能进行客观评估。2022年4月，中央编办印发《关于深化地方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试点工作。开展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对规范部门的履职行为、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和科学合理配置编制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 机构编制评估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驱动政府职能转型具有战略意义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结构性改革，致力于破解政府职能配置中存在的职能错位、运行失序与权责缺位问题，以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需求，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些成效与改革的要求仍存在明显差距。开展机构编制评估工作，可系统解构部门机构设置、职能履行及人员配置的实践样态，为政府机构优化与职能重构提供实证性参照依据，有效催化政府治理效能升级并牵引职能转变进程。

(二) 机构编制评估对提升编制资源配置的决策理性与强化管理制度刚性具有显著价值

现行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职能部门基于本位诉求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发起申请，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对申请进行研究并提出批复意见，完成批复以后缺乏有效的跟踪反馈机制的问题。扎实开展机构编制评估工作能够对部门

的机构编制事项落实情况进行考核,通过评估改革落实情况,对照改革目标,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更好地促进改革目标的实现。合理的评估可以帮助编制部门改进原有管理模式,通过建立切合实际、科学有效的评估工作体系,深入分析研判各部门机构编制资源使用效率,找准摸透堵点难点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实现监督管理与优化资源配置同步推进,有效提升机构编制科学管理水平。

(三) 机构编制评估推动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创新式发展

开展部门机构编制评估工作,能够促使“编制就是法律”的观念深入人心,有效监督部门履职情况,营造各部门积极学习遵守机构编制政策法规的氛围,促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引导更多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监督,从而强化机构编制外部监督力量,建立多元参与的机构编制评估机制。

(四) 机构编制评估是推动机构编制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2013年,中央提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目标,实行编制总量控制。近年来,改革进程不断加快,涉及面向基层、民生等公共服务的职责不断增加。一方面要按照规定严控机构编制总量,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亟需机构编制保障,因此缺编问题从结构性、行业性层面来看比较突出。这就要求编制部门建立实地评估机制,系统观测与解析各部门在组织结构、权责配置、职能履行及人力资源配给等维度的实践样态,精准识别机构编制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与效能衰减现象,据此探索存量资源的优化策略,同时为深化机构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二、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的探索

推行机构编制执行效能与资源配置效益评估,可有效规范部门履职行为并驱动行政效能提

升。实施部门编制资源的常态化动态调适机制,将催化建立政府权责运行的制度化激励约束架构。自2008年中央编办开展机构编制评估试点工作以来,江苏、重庆、厦门和青岛4家省、市编办在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2022年6月,河南省委编办选取了3个省直单位和濮阳、驻马店2个省辖市开展评估试点。

河南省委编办根据《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机构编制管理评估办法(试行)》《关于全面开展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河南省机构编制工作实际,研究制定了《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省直部门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指标体系》。方案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突出科学严谨,建立评估体系

一是全面确定评估内容。坚持“真评实估、评真估实、评出成效”的结果导向,评估指标体系的设立采取“5±N”方式。“5”是指履职尽责情况和使用效益、“三定”规定执行情况、机构配置效益、编制和领导职数使用效益、机构编制管理规范,“N”是指个性指标,确保全方位、多角度“应评尽评”。二是科学设计评估指标。以中央编办评估办法确定的指标为依据,分级分类细化评估指标设置。其中,党委(群团)部门设置一级指标5项、二级指标18项、三级指标31项,政府部门设置一级指标5项、二级指标18项、三级指标33项,事业单位设置一级指标5项、二级指标15项、三级指标27项。做到共性指标与个性指标相结合,切实评准,抓实相关问题。三是合理量化评分标准。对于机构编制执行和使用情况5大类指标,逐项明确评分标准,按照落实完成情况实行“扣分制”量化计分,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力争做到评估结果可量化、评估过程可操作。

(二) 突出协同高效,严明评估程序

一是部门自查自评。要求被评估部门对照评

估指标,根据本部门“三定”规定执行、职责履行、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编制使用效益、日常工作开展等情况认真开展自评工作进行量化打分,形成自查自评报告。二是编办实地评估。针对前期部门自查自评的问题,选取部门分批次开展实地评估工作,并结合评估指标,综合运用问卷调查、个别座谈、查阅资料等方式量化分析其机构编制执行和使用效益情况。三是反馈意见。机构编制部门在综合分析被评估部门实际运行情况的基础上,起草评估报告,并向被评估部门反馈评估意见,被评估部门如对评估意见有异议,可提出修改建议并附相关佐证资料。

(三) 突出全局保障,强化结果应用

一是督促问题整改。对评估中发现的机构设置不合理、编制使用效益不高、内部机制运行不畅及编制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经充分研究论证,及时反馈整改措施及建议,明确整改时间表,实行挂号督办、限期整改,切实将评估结果用到“刀刃”上。二是统筹编制配置。坚持将评估结果作为机构编制申请事项审核审批的重要参考依据,建立评估发现问题清单机制,问题清单未清零销号的,可视情暂缓办理机构编制申请事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工作闭环,从严把握部门机构编制事项,确保评估工作长久生命力和权威性。

三、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存在的问题

当前,机构编制评估工作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其理论构建与制度体系均存在显著不足,有效实施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仍面临诸多挑战,有待持续推进。

(一) 评估工作受重视程度不足

其一,相关部门对《机构编制管理评估办法(试行)》的认知不足,未能充分理解评估工作的重要性,导致其参与评估的内生动力匮乏。其二,部分被评估部门在自评过程中往往囿于本位利益,优先关注自身诉求,难以摆脱“编制不

足”与“体制不顺”的思维定式,对自身存在的机构编制管理问题缺乏主动整改意愿,甚至采取虚报瞒报、误导机构编制部门等不当行为,存在违反机构编制政策法规的现象。其三,对评估工作的认知存在片面性。部门普遍期望评估能解决其实际需求,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常遭遇多方阻力与压力,致使评估结果与其预期形成较大落差,进而导致评估主体与客体双方均对评估工作产生信心不足的问题。

(二) 评估体系尚不健全

党委、政府、群团等各类机关单位职能各异,其机构设置与运行机制亦存在显著差异,评估指标体系本应充分体现这些差异性,然而,对于专业性较强的职能部门,可资借鉴的成熟评估经验相对有限。现有评估指标与实际管理需求的契合度不高,在真实、全面反映机构编制管理信息方面存在缺陷。具体表现为:首先,评估指标体系科学性、合理性有待提升。客观定量分析方法在评估中的应用明显不足,指标构成以定性描述为主,定量指标相对匮乏,导致指标数据的维护与验证难度增大。同时,评估主体在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认知偏差,亦对评估有效性构成显著不利影响。其次,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面临困难。评估工作本身具有复杂性,各项指标间关联性强,需综合考量影响机构编制管理的多重因素。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科学分类与量化,准确区分各指标的重要性层级,并据此设定合理权重,是评估实践中亟待破解的难点。

(三) 评估结果应用刚性约束乏力

机构编制评估采用系统性评价手段,其核心目的在于准确判断部门机构编制执行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评估结果的应用缺乏刚性保障措施,与编制动态调整之间的联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评估结论难以直接转化为机构编制调整事项或具体管理举措。同时,针对机构编制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足。依据现行政策法规,对机构编制执行中的违规行

为通常仅能采取通报批评、责令限期纠正等处置方式,缺乏直接、有力的处罚措施及相应的约束效力。上述问题严重削弱了机构编制评估的权威性,不利于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亦使其应有的功能价值难以实现。因此,亟需在实践中逐步健全评估结果应用制度,切实提升机构编制评估的实效性。应着力将评估工作纳入部门核心工作议程,不断强化其权威地位。

四、完善机构编制评估的对策和建议

(一) 强化业务培训,建立以解决问题促评估的工作机制

可从相关部门单位抽调一批具体从事干部人事、机构编制工作的干部参与评估。定期对参评人员进行培训,着力将评估人员培养为专业素养深厚、实操能力突出、工作成效显著的行家里手,实现评估队伍配置完备且精干高效的目标,切实强化评估力量。机构编制部门需深化对评估发现问题的调查研究,精准把握工作着力点,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引导编委其他成员单位形成工作合力,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确保参与评估的部门单位切实获益,有效提升其参评积极性,全面推动机构编制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 充分借鉴吸收转化,科学制定评估指标体系

一是广泛调研,“研”“鉴”结合。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三定”规定制定和实施办法》《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办法》文件精神,积极学习借鉴其他省市关于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效益评估方面的先进经验,对评估范围、监管内容、工作机制等进行细化完善,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指标体系。二是反复论证,“践”“变”结合。机构编制评估指标可划分为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两大类。主观指标涵盖对被评估

部门运行效能的定性判断、受访者(如部门内部人员或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状况、管理效能或服务体验的主观认知与感知。客观指标则聚焦于可量化、可核查的刚性标准,具体包括:被评估部门编制规模、领导职数与机构编制规范性文件合规性、承诺时限内事项的按时办结率、行政审批事项的政策执行到位度等。最终综合平衡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形成评估结果。

(三) 强化结果运用,实现评估管理深度融合

评估结果的合理运用是保障评估工作有效性的先决条件,亦是提升各部门机构编制纪律观念的关键政策工具。唯有将评估结果切实转化为管理决策与改进行动,方能充分实现机构编制评估工作的核心价值与战略意义。一是结合机构编制事项调整,推进评估评价工作。建立机构编制部门内部协作机制,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评估对象提出的机构职能、编制调整意见,及时向领导汇报、向有关科室反馈,按照规定程序研究办理,打造机构编制管理“评估—调整—评估”闭环。二是促进机构编制评估与履职尽责监督工作的衔接。加强机构编制评估工作与履职尽责监督的衔接和互通,将履职尽责监督过程中发现较多的问题列入监管台账,列入年度履职考核扣分因素的部门,督促有关部门及时整改,不断增强执行能力和机构编制使用效益。三是推进机构编制评估工作与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的有效衔接。坚持机构编制评估与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同步进行,针对重大改革不彻底、“三定”规定不落实、机构编制管理不规范等情况,强化机构编制跟踪问效、机构编制核查等与评估工作的多维联动,及时下达整改意见。对违反机构编制工作纪律的人员,按照《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等有关政策规定,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课题组成员:陈晓、孙娅娟、苏晓、杨文)

责任编辑 华 夏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数字经济驱动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唐琼, 龚晨程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长沙 410006)

摘要: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数字化在引领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 紧密贴合了“十四五”规划中关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 即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升级、动能焕新, 重构乡村生产; 数字经济重塑乡村生活, 实现繁荣盛景、生活蝶变; 数字经济革新乡村治理, 推动治理升级。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建议通过政策引领与基建强化奠定数字经济助农之基, 通过数智教育赋能乡村人才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通过治理创新与技术融合升级数字经济赋农的效能。

关键词: 数字经济; 乡村振兴; 数字技术;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3;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17(2025)08-0029-06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一) 引言

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进程中, 农村地区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关键在于全面、深入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该战略自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后, 在党的二十大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明确了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的决心, 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速建设农业强国, 扎实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通过构建高质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实现优质、规模化发展, 使之成为应对复杂国内外形势、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引擎。近年来, 中央一号文件屡次强调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价值, 如2022年提出“数商兴农”工程, 2023年强调深化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2024年更是着重指出数字化引导作用在全面赋能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面对“十四五”规划中构建国内

收稿日期: 2025-01-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大课题“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湖南城乡融合发展研究”(XSP25ZDA009); 2024年度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研咨一体化创新工程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重点课题“新质生产力驱动湖南城乡融合发展研究”(2024KZGB10)

作者简介: 唐琼(1983—), 女, 湖南邵东人,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后, 湖湘青年英才, 湘江青年社科人才,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龚晨程(2001—), 女, 湖南邵东人,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土地资源管理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布局，我国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借助数字化转型全面重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

当前全球正处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洪流中，各国对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共识日益增强。在农村地区，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已广泛融入农业生产、乡村治理等多个层面，随着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迅速提升，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有力驱动乡村地区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强大动力。

（二）乡村振兴发展的概念界定及表现形式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针对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实施的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当紧密围绕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起充满活力的乡村产业体系，以期达到产业兴旺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需从产业基础、城乡格局、人口规模、居住环境、土地制度、就业结构、收入状况等诸多层面全方位地审视乡村振兴的进展。

乡村振兴旨在通过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以及高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在严格遵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导向下，稳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其核心理念在于“战略”，关键落脚点在于“振兴”，直接指向是“乡村”。它不仅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纲领，更是我国在自身发展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创造性继承与发扬。通过切实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我国有望有效破解“三农”难题，有力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三）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及表现形式

近年来，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数字经济迅速崛起形成新经济形态，并逐步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为根基，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优化资源

配置。其核心特质涵盖数据驱动、平台支撑、跨界融合与创新引领。张立院长在《数字经济》杂志创刊词中深刻指出，数字经济正引领全球经济进入体系重构、动力变革、范式迁移的新纪元^[2]。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数字经济对于国家发展大局至关重要。面对乡村振兴的重大任务，数字经济正深刻改变着农村发展的轨迹。

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何玉长、刘泉林等学者揭示了数字经济的价值本质在于劳动，特别是数字化劳动的价值创造^[3]。陈一明则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它通过促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4]。同时，李健的研究显示，借助数字化手段能提高乡村治理的透明度，提升公众参与，有助于构建更为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5]。李季刚、马俊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发展数字经济能改善乡村治理结构，提高治理效率，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更是为缓解乡村资金短缺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6]。

然而，张蕴萍、栾菁等学者也发出了提醒，他们认为尽管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带来诸多机遇，但在实际融合中仍面临信息基础设施薄弱、数字化水平不高、人才匮乏等挑战，这些都限制了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7]。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联系密切且复杂。虽然已有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各方面融合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对各地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两者深度融合策略的探索还不够深入。要实现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两者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潜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多重挑战，如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农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等^[6]。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破局之道在于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

村信息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同时加快标准体系建设，为数字乡村的坚实发展奠定基础。

二、国内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典型的经验借鉴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向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了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建设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11.23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9.7%。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也取得了显著提升，增长至69.2%，比2023年提高了2.7个百分点。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数字化服务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提升了民众的生活质量。例如，网约车和互联网医疗用户数量分别显著增长，在线旅行预订用户也大幅增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2025信息通信业（ICT）十大趋势》中指出，数实融合将持续释放需求潜能，预计到203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突破80万亿元。同期，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有望在“十五五”期间由过去四年的22.5%提升至23.2%，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能。本文以广东、浙江、湖南三个典型地区为例，探讨数字经济如何助力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为全国各地发展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一）数字经济重构乡村生产：产业升级，动能焕新

数字经济能够引领农业革新，赋能乡村振兴战略。传统农业受限于自然条件，面临产出不稳定和效率低下的困境。而今，互联网科技的深度融合正驱动中国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迅速转型，它不仅重塑了农村产业结构，亦显著增强了农业综合竞争力，为乡村注入澎湃活力，成为推

动其繁荣发展的关键力量。第一，作为新增长极，数字经济通过信息化与智能化手段革新农业，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物联网、大数据等尖端技术的应用，让精准农业管理和智能作业成为可能，农作物因此产量更高、质量更好。第二，数字经济深刻优化并升级了农业产业链结构，强化了产供销一体化，加速了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农村电商与线上营销的蓬勃发展，不但拓宽了农产品流通渠道，让优质农产品跨越地域限制而直达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而且降低了销售门槛，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为农村经济带来革新动力。第三，数字经济激发农业科技与产业升级新动能，智能农机装备与先进种植技术的结合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与环保水平，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第四，数字经济促进农业与文化、旅游等行业跨界融合，催生创意农业、乡村旅游等诸多新兴业态，为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铺设了宽广道路，增添了强劲动力。总之，数字经济正全方位重塑中国农业版图，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无限可能^[7]。

广东作为国家经济与制造业的领跑者，其农业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尤其在热带水果及水产品领域占据龙头地位。广东农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自2020年起，借力《广东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行动计划》等政策导向，广东不仅建立了数字农业发展联盟与试验区，还推动了“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云端转型，利用云计算技术使农产品链路全面数字化，开创了“互联网+农业”的新模式。依托“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东铺展了一条宽广的乡村振兴之路，数字乡村试点项目的设立，更是智慧农业发展模式的生动实践。源自徐闻菠萝成功实践的“12221”市场体系作为创新典范，已发展成为破解农业产销难题、促进政企高效协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广东模式。阳西县荔枝数字化生态果园则展示了数字技术在

精准农业管理、食品安全追溯及电商直播营销等方面的应用，实现了产业链的价值最大化，成为产业升级的示范案例。从徐闻菠萝到高州荔枝，数字化转型的红利惠及广泛，充分展现了广东实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前瞻布局与显著成效。

（二）数字经济重塑乡村生活：繁荣盛景，生活蝶变

数字经济在赋能农民生活品质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其影响深远且多维。第一，它通过智能化和绿色化技术革新农业。诸如“蔬菜工厂”“棚联网”“数字渔业”等创新模式，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减少资源浪费以及提升农产品的质与量，为农民创造了更高价值的产出。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不仅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还为农村经济体系注入新鲜活力，通过激励农民参与电商、直播等新兴行业，实现收入多元化，显著提升了生活水平。第二，电子商务与直播带货等数字手段的兴起，让优质农产品跨越地理界限，进入更广阔的市场。农民直接对接消费者，实时调整策略，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同时，物流快递的便捷化让农村消费更加现代化，缩小了城乡消费差异。浙江省通过制定“十四五”数字乡村建设规划，加强网络基础设施，构建“三农”协同平台，有效缩小了数字鸿沟，在此领域展现出了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第三，数字经济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5G、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而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空间。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拓宽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空间，还促进了新业态的培育和新需求的产生。

浙江省在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和变革乡村生活方式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创新策略与实践。一是依据《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十四五”规划》的部署，至2025年建立健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与“三农”协同应用平台，以此加速乡村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逐步弥合城乡“数字鸿

沟”。二是特别强调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在实践探索中，浙江省通过启用体育短视频账号、推出体育旅游小程序等，开创性地发展乡村体育新业态，如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乡村IP赛事，推广“体育+文旅+农业”的复合模式，不仅直接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产业升级，还有效促进了体育健身与乡村旅游的跨界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数字经济革新乡村治理：现代脉动，治理升级

数字经济正重塑乡村治理，推动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加速治理升级并确保党务、村务、财务透明，为农村稳定与治理效能提升奠定基础。此转型为多维工程，涵盖技术、制度与社会协同诸多方面，影响深远。第一，数字技术成为乡村治理的催化剂。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不仅引发了治理理念转变，也为治理者带来了挑战与机遇。资源因技术得以高效整合，形成以数字平台为载体、强调社群互动的新型治理模式。数字工具通过降低规则成本，提升执行效率，增强治理灵活性。第二，数字化治理是乡村现代化的关键桥梁。它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构建集数字、信息、智能于一体的治理生态，强调治理的敏捷与协作，可以拓宽治理结构与功能优化路径，促进机制与空间的双重创新。第三，数字经济能够展现双轮驱动效果：一方面，数字化有助于提高治理透明度与公信力，增进民众信任；另一方面，数字化通过数据共享平台、精准供需对接及农业产业链延伸，能够激发市场潜力，促进产业升级。物联网、AI技术的应用促使治理智能化，线上政务服务的普及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服务质效，稳固了现代化成果。总之，数字经济不仅是乡村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也是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它可以正面作用于效率提升、公平促进及参与度增强，从而描绘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图景。

在湖南省，数字化转型以“互联网+”为标志而在乡村地区蔚然成风，手机变身为“新农

具”。岳阳市平江县木金乡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典范，成功入围湖南省特色试点项目，展现出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与服务中的强大潜能。2022年10月，后岩村携手岳阳联通平江分公司，共同创建通信合作社，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乡村治理之中，促进形成了共治共享的崭新治理模式。到2023年，木金乡已实现90%以上的行政村5G及千兆光纤覆盖，所有20户以上的自然村组均通达4G和光纤，宽带普及率超过90%，乡村的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

作为“数字乡村”平台的先行者，后岩村与岳阳联通紧密合作，建设了“数字乡村”平台，该平台利用基础网络和宽带优势，构建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实现了“本村人用本村宽带”理念，这一平台不仅催化了乡村治理、建设和发展的现代化跃进，还借助信息化利器通过改善民众福祉，加固集体经济基石，提升了治理水平。

在生态保护红线层面，木金乡巧用AI技术监控危险水域，显著增强了防溺水防护网。同时，针对后岩村砂石资源丰富与森林覆盖率高的特点，以及伴随而来的非法采砂和森林防火问题，新增的54个监控点融入“天网工程”，有力提升了关键区域的监管效能，有效抑制了违法行为，降低了火灾风险。

在村务管理与服务层面，“雨坛一家人”智慧平台集众多服务于一体，从日常便利信息到就业机会，极大地方便了村民。加之“雪亮工程”、防返贫监测系统等一系列智能平台的建立，构建了一个廉洁公正的乡村治理生态，确保村民能够高效参与和监督村务，真正形成了民心安稳、乡村和美的新局面。

三、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通过对国内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分析研究可以看到，近年来数字经济已经进入农村并取得一定成效，为巩固这一成效，需在以

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一）通过政策引领与基建强化奠定数字经济助农之基

政策导航与规划是先导，这要求政府清晰描绘数字乡村战略蓝图，出台优惠政策与设立专项基金以激励技术创新、应用普及，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政策后盾。在此基础上，倡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政府、企业、学术界、社会组织 and 农民等携手，通过公私合作(PPP)、产业协同与公益众筹等形式，构建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合力推动数字乡村的全面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十分重要，要搞好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提供强大支撑。

在具体实施中，第一，要确保宽带网络和移动互联网成为农村数字化的基石，广泛覆盖农村地区，依据人口分布与需求调研来精准布局基础设施，实现移动信号无死角覆盖。设立乡村网络服务站点，提供持续维护与升级服务，确保数字服务的长期稳定。政府应对难以通过市场自发数字化的乡村提供持续政策支持，吸引社会力量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信息网络建设，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第二，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基础良好的省份需巩固既有成果，前瞻布局下一代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地区则需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明确发展规划，精准施策，利用自身优势消除数字经济发展障碍，优化乡村数字生态。第三，在资金投入方面，地方政府应增加财政支持与新基建投资，设立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数字化建设。为此，各地需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框架，灵活调整金融政策，推动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助力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乡村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

（二）通过数智教育赋能乡村人才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党的二十大强调，教育、科技与人才是支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与战略核心。农民在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中是关键主体，其数字化能力的培养与内生动力的激发对于数字经济在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乡村振兴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应以“人”为核心，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号召，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为了在乡村变革中实现从依赖外部“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转换，必须构建以内生动力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体系。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数字+教育”策略，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技能与应用能力，改变人才短缺与数字素养不足的现状。具体策略如下。第一，首要任务是教育体系的现代化革新，注重优质网络教育资源与乡村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素养、职业技能及数字素养，为构建智能化乡村奠定坚实的人才根基。地方政府应当主动出击，设计符合本地特色的数字人才培养规划，依托职业教育体系、专业技能培训及校企合作项目，培育既精通农业又掌握管理技术、熟悉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孕育具有乡土情感的数字时代乡村领袖。第二，建立健全人才引进与激励体系，结合政策优惠的吸引力与市场需求的牵引力，吸纳具有高超技艺和创新思维的外部人才下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这些人才的加入不仅能够填补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技能空白，还能凭借其前沿理念推动乡村数字化向更深层次拓展。第三，重视并挖掘本土潜力，特别是聚焦青年这一关键群体。利用乡村青年对数字技术的天然亲近感，通过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激发他们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热忱与创新潜能。第四，强化乡村学校的数字教育职能，将其打造成为数字教育的中枢。通过引入高水平的师资力量、更新计算机课程内容与采用现代教学手段，确保教育内容与方法紧跟科技进步的步伐并贴合乡村实际，保障乡村学生在数字时代与城市学生并驾齐驱，逐步缩小城乡间的数字鸿沟^[8]。

（三）通过治理创新与技术融合来升级数字经济赋农的效能

乡村数字化治理是乡村振兴的稳固基石，战略蓝图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描绘了光辉前景。将“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入农村腹地，依据《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的蓝图，强化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智能化村务管理，加速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及服务的深度融合，拓宽消费市场，以内部循环经济为引擎激活乡村经济，增强电子商务的推动力，促使产业结构迭代升级；同时，深化惠及民生的信息服务，普及数字公共服务，力促“一网通办”在乡村的广泛实施，实现党务、政务、村务、财务管理等领域全覆盖。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在乡村治理创新维度上，借力信息化平台提升治理效率，实现政务透明化、在线服务与民情的即时互动，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规划决策、环境监控与治安管理水平。第二，在技术创新与应用策略上，积极倡导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全链条的融合应用，以提高效率与产品品质着力培育农村电商、远程医疗服务、在线教育等新兴业态，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就业增长。推进农村政务服务数字化，提升公共事务处理效率。第三，优化市场机制，促进数据流通与商品交易。加速农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构建大数据中心与产业链条，推广农业中的云计算技术应用。建立数字农业服务平台，整合数据资源，提升农业综合效能。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农民收入水平。通过这些多维度的策略，全方位推动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与经济繁荣。

四、结语

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的核心驱动力，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通过促进农业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和质量，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的治

（下转第66页）

共生式发展：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理路

周青洋,汪来杰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以共生理论为研究切入点深入剖析乡村治理实践,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现实要求。共生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将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内自治组织、村民与社会组织界定为能量流通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中的软环境与硬环境通过产业、文化、人才等共生界面影响系统构建,推动共生模式从“非对称互惠—间歇共生”向“对称性互惠—一体化共生”的理想模式转向。然而,当前乡村治理面临共生单元互动过程梗阻、共生环境交互逆向诱导、共生模式偏利与非对称等诸多困境,需在实践中针对共生困境探索共生式发展路径,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系统构建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推动乡村治理的效能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乡村治理共同体;共生理论;民主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017(2025)08-0035-05

一、问题提出

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来,国家积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下移,“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治理制度转向的实践新进路。作为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度的“神经末梢”,乡村场域需构建起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打造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多元共振的发展新引擎,切实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生效,打通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共同体被看作是助

推乡村全面振兴与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机制^[1]。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应根据不同视角治理实践作出具体界定。在数字技术视角下,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共同解决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治理问题的治理集合体^[2]。此外,从治理主体职能结构、社会资本要素等方面也可以反映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如各主体在治理中的角色定位^[3]、通过培育公共精神和共同体意识等构建共同体的内涵要素等^[4]。不同的内涵界定往往都是从不同侧面为主体的不同表述。宏观视角下乡村治理主体间存在着契合与冲突并存、矛盾与制约互现的双重隐含关系^[5],而将焦点放置于具体主体层面,农村精英往往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普

收稿日期:2024-12-16

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责任制下驻村干部履责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23BSH018)

作者简介:周青洋(2002—),男,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治理;汪来杰(1965—),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治理。

通村民则在一定程度上跟随精英的引导，二者形成了“引领与跟随的模式”^[6]。而政府与农民也具有一定的合作利益与基础，政府拥有政策制定、资源调配等权力和优势，农民则是农村政策的最终承担者^[7]，主体间也存在着治理中的合作关系。

可是，如果仅仅将研究视角置于乡村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或“合作”，可以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自上而下治理模式滞后与自下而上治理模式梗阻的复合式困境吗？“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不再局限于基于互动关系的“项目式合作”，而是一个要素互通、多方互联的共生系统，本文将共生理论引入乡村治理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分析框架：乡村治理主体的共生系统

（一）共生理论概述

“共生”(Symbiosis)一词起源于希腊语，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Debarry)于1879年提出。不同于传统生物学说将生物间关系归结于竞争和捕食，德贝里认为生物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关系，并将这一关系与竞争和捕食进行了深刻区分。柯勒瑞(Ceaulley)与刘维斯(Leweils)在德贝里的研究基础上对共生的形成逻辑与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共生、寄生、腐生基础上提出了互惠共生这一生物间交互关系新维度。20世纪末，国内学者袁纯清将共生理论与经济研究相结合并发展为系统理论，其研究结合实际将核心要素归纳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与共生模式，并对质参量兼容关系、共生界面、共生系统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与阐述^[8]。其中，共生单元是指系统中形成共生关系的能量生产与交换单位，共生环境是除共生单元外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共生模式即各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的影响下相互结合或作用的方式与形式，这些方式与形式可分为行为方式和组织程度两个维度。本文将基于这一理论内涵与系统框架构建乡村治理主体

的共生系统。

（二）乡村治理主体共生系统构建

1.共生单元界定与作用明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政府主导下的“集权式”管理、基层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共同管理(“乡村共治”)与多元主体共治(“乡村共治”)三个阶段^[9]，逐步形成了基层党委、乡镇政府、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民、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其中，基层党委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政治引领、组织领导、服务群众等关键作用，乡镇政府在治理中发挥政策执行与落实、公共服务与保障、社会治理与维稳等重要作用，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下文简称村“两委”)在治理中通过协商共治发挥民生保障、产业振兴、服务供给、文化建设等作用，村民与村内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治理践行者、纠纷调解者、文化传承者等重要角色。基层党委、乡镇政府、村“两委”、村民与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通过质参量关系的兼容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主体共生系统的共生单元。

2.共生单元质参量兼容关系分析

质参量兼容关系是各共生单元间的内在联系的表达形式。基层党委对乡镇政府、村“两委”、村民与社会组织发挥领导与引领作用，乡镇政府则通过推动政策落实与改善、资金整合与投入、工作监督与协调等手段保障基层党委的理念落实，村“两委”通过协商与共治实现基层党委的工作落实，村民与社会组织通过在治理实践中发现治理漏洞并通过意见反馈参与到基层的治理改善过程当中。乡镇政府通过加强制度规范、自治能力培训等手段引导村“两委”做好乡村治理各项工作，通过政策引导、监督管理、矛盾调解等手段组织和管理村民与社会组织，村民与社会组织则通过意见反馈促进乡镇政府破解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治理难题。村民与社会组织在干部选举、日常事务决策、专项事务决策等方面对村“两委”进行授权，经过授权后，村“两委”便

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维护民主权利、规划经济发展等服务于村民与社会组织，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贯彻落实。

3. 共生环境与共生模式

当前存在软环境与硬环境两种对乡村治理具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10]。软环境包括价值认同、社会意识与乡规民约等在乡村场域中引导治理实践转向的隐性因素，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才队伍、乡村资源等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的显性因素。其中，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与共生环境之间的传导介质。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构建产业、文化、人才、生态与组织五个界面可有效分析多元环境交互影响下的共生能量传导过程^[11]。共生模式的划分可从两个维度着手，从行为维度上可分为寄生、偏利和互惠互生等模式，从组织维度上则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模式。随着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由“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转变^[12]，村“两委”、村民、社会组织等乡村治理新型主体与基层党委、乡镇政府等传统治理主体形成互惠互生的内生关系，但是治理能力、治理信息等共生能量在新旧治理主体间的流动仍呈现出非对称现象。而在组织层面，乡村治理各主体间能量流动呈现出周期特征。由此观之，乡村治理主体在行为上的非对称互惠与在组织上的间歇性共生使其当前处于“非对称互惠—间歇共生”这一共生模式中。这一模式并不符合新形势下的治理要求。基于此，从行为与组织两个维度考量，对称性互惠能使各治理主体间共生能量同等性双向互通，一体化共生能使各主体连续性因果兼容，这两个维度上的协同共生构成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理想共生模式——“对称性互惠—一体化共生”。

三、共生难题：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

乡村治理主体共生系统中的共生能量以治理权力、治理能力、治理信息为主要构成要素。当

前共生系统的单元、环境及模式中都存在着与共生系统进化方向相抵触的影响因素，它们相互交织，造成共同体构建中的共生难题。

（一）共生单元互动过程梗阻

1. “自下而上”治理式微

乡村自治是基层治理的传统治理形态^[13]。村民行使自身自治权多体现为“自下而上”的权力流动方向，村民通过民主协商参与到乡村治理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当中。当前，由于村内自治主体参与意愿不高、现有制度与体制对“自下而上”治理方式保障不足，以及信息不对称和技术手段匮乏等，自治权往往悬浮于乡村场域而集中在乡镇政府这一单元，这就造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能量流动的双重梗阻。

2. 枢纽单元作用低效

乡镇政府作为乡村治理主体共生系统的重要枢纽单元，在组织界面与基层党委、村“两委”、村民与社会组织分别形成保障、引导与引领等内在共生关系。然而，在政策执行方面，乡镇政府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未能因地制宜等问题，致使政策难以在乡村中落地生根；在信息传递与协调方面，信息传递方式的单一化与模糊化，造成乡镇政府与其他共生单元间的互动滞塞。

（二）共生环境交互逆向诱导

1. 多元价值相互排斥

当前乡村地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乡村资源丰富的地区出现了“人口回流”的现象。区别于传统的村内居民坚持在乡规民约、血缘宗亲等传统观念引导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自城市进入乡村的职业农民或社会组织坚持的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念，具有不同背景的治理主体所坚持的多元价值在治理过程中相互排斥，加大了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阻力。

2. 社会意识的碎片化

乡村社会意识的碎片化是指乡村场域内整体的社会意识被分散为众多相互独立的意识片段和观念，它使村内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

化趋势，难以形成统一的治理目标与行为取向。由此乡村治理共同体在构建中出现集体行动难以协调、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传统治理权威弱化等分散化难题。各共生单元间共生能量分散化流通，使各共生单元难以生成同向共生的合力，严重制约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三）共生模式偏利与非对称

1. 主体行为趋于偏利

当前乡村治理主体共生模式主要以“非对称互惠—间歇共生”模式为主，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单元受益而另一部分单元既不收益也不受害的偏利现象仍存在于共生系统当中。例如乡镇政府为吸引企业入驻往往给予诸多政策优惠，企业借此降低运营成本、扩大企业规模，但在实践中往往因为乡镇政府监管机制不完善与企业逐利的本质特征，导致企业并不履行乡村社会责任，这就造成了企业单方面获利，各共生单元间出现能量单方面流动而难以互通的偏利现象。

2. 组织维度的点共生

点共生指的是共生单元之间在某一特定时刻或某一短暂阶段，基于某一特定“点”的接触而形成的共生关系。这里的“点”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事件、项目、资源等，共生单元围绕这一关键节点产生交互。支撑乡村治理的各类资源多以“项目制”形式涌入乡村场域，由专项组织动员、组织和管理，自上而下推动某项任务的部署与安排^[14]，这种项目式安排使部分治理主体以“项目”为契机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当中，从而展现出明显的点共生特征。

四、共生式发展：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现实构建需推动共生模式向“对称性互惠—一体化共生”转向。针对当前构建过程中的共生难题，本文提出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切实推动各治理主体形成共生发展的内在机制。

（一）畅通共生单元的能量生成与传导

1. 推动治理势能双向互通

在乡村治理语境下，“势”可理解为乡村发展所依托的资源、政策、组织等形成的推动力量，“能”则是这些力量做功、发挥效能的潜力。在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中，要把握自上而下的治理势能与自下而上的反馈势能，促进两种治理势能双向互通。在自上而下的治理势能中，以基层党委、乡镇政府为主的传统治理主体通过政策赋能、技术下乡等手段强化乡村场域内的发展根基；在自上而下的反馈势能中，民众实际需求通过民意汇聚、资源推广转化为乡村实际建设的势能，让治理方向精准对接民生痛点。

2. 畅通枢纽单元上下联动

乡镇政府枢纽性作用的受限，使各共生单元间的能量流通出现断层现象，上下联动渠道梗阻。在构建实践中，乡镇政府要切实发挥对上联动与对下联动作用并积极完善上下联动机制，对上联动要发挥政策承接与落实、信息收集与反馈、项目下沉与实施等功能作用，对下要发挥治理指挥与协调、资源整合与分配、监督管理与激励等实效，并通过建立沟通平台、完善协同机制、强化人才交流等推动上下联动机制系统化建设。

（二）刺激共生环境的多元正向性引导

1. 政策引导价值认同

一方面，乡镇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融入乡村治理各主体的日常工作与协同共治当中，借此引导系统内各共生单元价值观趋同，增强各单元间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减少价值冲突对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阻力；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应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政策支持，在传播现代文化的同时，挖掘乡村场域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促使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在乡村场域的深度融合。

2. 整合村内社会意识

村内社会意识的聚合是凝聚乡村治理各主体力量的重要环节。应建立定期性的协商机制，以

基层党委为引领,以乡镇政府为组织者,引导村“两委”、村民与社会组织围绕具体事项进行协商讨论,在充分鼓励意见表达的基础上寻求利益共同点,促进治理目标的统一;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引导各治理主体树立符合共同体要求的社会准则与取向,以社会意识的整体化建构为共生系统的建立提供强大合力。

(三) 实现共生模式的一体化对称互惠

1. 引导主体行为对称性互惠取向

缺乏合理的激励机制是造成乡村治理各主体在互动中偏利与非对称的重要原因。要建立起科学化、系统化、合理化的激励与监管机制,以两种机制的调节合力激发村民与社会组织的参与热情,落实其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同时,利用现代手段开展教育与培训活动,增强各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与合作意识,以外嵌式激励、监管与内生式共生意识的结合,根除行为维度上的偏利现象,引导非对称互惠现象向对称性互惠的现实转向。

2. 构建治理主体一体化组织机制

乡村治理一体化组织架构是乡村治理主体共生的基础条件,打造一体化组织机制的关键是明

确权责与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明确基层党委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乡镇政府要发挥政策执行和资源调配的枢纽作用,村“两委”负责具体落实村庄事务管理和服务供给,村民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民主决策、监督和公共服务等,形成连续共生的组织模式,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五、结语

基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在隐义——“共生”,本文将共生理论引入这一构建过程当中,明确了乡村治理主体共生系统的构成要素,剖析了现存共生难题,提出了共生式发展路径。然而,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与进化是阶段性、动态化的过程,治理主体间的共生关系需根据治理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展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探究各共生单元间更为复杂的共生机制,同时,应结合不同乡村地区的实际特点,细化共生式发展路径,增强研究成果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为乡村治理实践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推动乡村治理不断向现代化迈进。

参考文献

- [1] 程银,李建军.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之回顾与展望[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8-24.
- [2] 李亮,徐晓林,明承瀚.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内容表征、角色边界与模式构建[J].湖南社会科学,2024(6):73-82.
- [3] 张继良,邵凡.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的调整与优化[J].河北学刊,2022(6):159-166.
- [4] 王新松,付云翠,杨若辰.以培育社会资本为路径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基于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J].社会治理,2023(6):108-120.
- [5] 陈晓莉.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30-144.
- [6] 莫艳清.从保护人到企业家:乡村精英的角色演变及其内在逻辑[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23-30.
- [7] 吴妤,梅伟伟.协同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探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3):20-25.
- [8] 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上)[J].改革,1998(2):100-104.
- [9] 杨晓,高振岗.中国乡村多元主体协调共治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19-127.
- [10] 胡海,庄天慧.共生理论视域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共生机制、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J].农业经济问题,2020(8):68-76.
- [11] 王冲,曾君,司崑.乡村振兴共生系统构建及其稳定性治理机制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90-97.
- [12] 龙丽波,李梁.农村社区治理的模式创新:从“乡政村治”转向“乡村共治”[J].理论探索,2024(5):85-91.
- [13] 王东,王木森.依法自治视域下法治乡村构建的逻辑与路径[J].江汉论坛,2024(12):115-119.
- [14] 张兴祥,何昊翰.从项目制到共同体构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向路[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91-99,133,169-170.

责任编辑 夏继先

从封捕到共生：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现代化治理与生态文化传播

曾梓威

(湖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长江十年禁渔政策(2021—2031)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实践，标志着生态治理范式由资源规制向命运共同体的深层转型。立足“封捕—共生”的传播逻辑，构建“生态危机—人文关怀—成效展现”的媒介叙事框架，探析政策传播中公众认知、文化认同与舆论建构的动态演化过程。当前生态文化传播实践面临科层理性与文化实践、媒介赋权与记忆消解、生态公民与传统渔民认同重构的“三元悖论”。为破解上述困境，提出跨主体协同机制、技术与内容耦合路径及公众参与式传播策略，旨在为生态传播理论深化与实践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长江十年禁渔；现代化治理；生态文化传播；封捕与共生；传播逻辑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017(2025)08-0040-05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2021—2031)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实践，在全流域生产性捕捞禁令实施后，开启了从“资源掠夺型”到“命运共同体”重构的治理转型。可以说，这一政策不仅承载着修复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科学使命，更在实践层面触及文化记忆延续、社区生计转型与公众生态意识培育等重要议题。截至2025年，阶段性生态成效(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种类单位面积资源量同比上升16.7%)^[1]与制度性挑战(如渔民文化认同危机)的并存表明，政策目标的实现亟需超越技术治理的单一维度转向生态文化意义的社会化建构。在此过程中，媒介叙事作为

连接政策实践与公众认知的“意义中介”，其角色正经历从“规制工具”到“文化共建者”的深刻嬗变。与此同时，媒介在其中的实践已显现创新突破。从新华社出品的《江河的微笑》微纪录片对渔民转型的个体叙事，到南京科技馆“大江行地”科普展VR项目建构的沉浸式生态体验，传播实践正突破政策宣导的传统模式，转而通过情感动员与技术赋能激活公众参与^[2]，这种转变呼应着全球环境传播的“参与式转向”。

而生态文化传播的学术脉络为解读这一转型提供了关键视角，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将环境传播界定为“危机学科”，强调其通过话

收稿日期：2024-11-12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北大学当代文艺创作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湖北省屈原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23DDWY23)

作者简介：曾梓威(2000—)，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长江文化传播与区域文化认同。

语实践培育生态伦理的核心功能^[3]。这一理论在长江禁渔语境中显现出双重张力：一方面，政策初期通过危机叙事(如白鲟灭绝报道)建构治理合法性^[4]；另一方面，文化记忆理论^[5](阿斯曼，2011)提示我们，渔业传统的符号转化(如渔歌数字化保存)需嵌入地方性知识再生产。当前研究亟需回答媒介是如何通过叙事框架的动态调适来平衡生态治理的“制度刚性”与文化认同的“柔性渗透”的。但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性在于，政策驱动下的媒介创新如何实现生态理性与文化理性的融合。对此问题的探索，不仅关乎禁渔政策的可持续推进，更可为发展中国家平衡生态治理与文化遗产提供理论参照。

一、从“封捕”到“共生”的传播逻辑演进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传播实践，本质上是国家生态治理话语由“技术理性”向“文化理性”的范式转型。“封捕”与“共生”两者不仅是治理时序的阶段性目标，更是媒介叙事从刚性规制向柔性文化认同转型的表征。从“封捕”作为禁渔初级阶段的核心叙事，到“共生”这一更具系统和开放性的传播主题，长江流域的生态文化传播正由单一的政策执行叙事逐步转向更复杂的共存共生逻辑。从禁渔政策的制定到禁渔政策的实施，政策效果的持续性和社会认可度不仅关乎生态环境的恢复，还涉及流域内居民生计转型、文化认同重建，以及生态文化理念的传播与深化。可以说，传播逻辑的演进揭示了环境传播中“权力—知识—叙事”的动态博弈过程。

(一) 封捕：短期生态文明修复与行为规制

长江流域长期以来面临生态退化和水生生物资源枯竭的问题，在治理过程中，“封捕”政策被认为是“刹车式”生态治理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6]可以说，实现十年禁渔目标，退捕是前提，禁捕是保障，转产生计改善

是根本，长效可持续是关键。封捕作为政策实施的初期阶段，呈现出以“生态文明修复”和“行为规制”为双重目标的传播逻辑。各级政府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的政策意图是直接减轻长江生态系统的压力，阻断过度开发的恶性循环，为鱼类资源的自然繁衍创造条件。在这一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传播叙事主要突出禁渔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媒介更多通过生态危机报道、水生物种恢复情况追踪等方式，强化公众对生态保护施政方针的认知。

(二) 共生：长期生态文化理念塑造与传播

恩格斯指出，人能够“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7]。这一论述在揭示人与自然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承认自然对人类的制约性。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化解为协同共生，以制度设计和文化传播来推进生态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因此，尽管当前长江禁渔政策的实施仍主要处于“封捕”阶段，重点在于通过规制实现天然渔业资源的修复和生态环境的初步改善，但一些共生理念的传播已经显现。

“共生”阶段的传播逻辑旨在通过媒介手段推动生态文化理念从政策层面面向公众价值观的转化，形成可持续的生态共识。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传播技术为生态文化传播的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创新方向。目前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技术已被应用于长江流域的生态传播实践中，依托AI技术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政府与媒体机构可以精确捕捉公众对于长江禁渔政策的舆论反馈。例如，通过分析微博、抖音等平台关于“禁渔”的关键词搜索频率与相关话题热度，传播主体能够精准识别公众对生态保护的关注点(如水生生物恢复、渔民转型等)。这些创新手段的实施不仅增强了生态文化传播的参与感和可信度，也为十年禁渔政策的媒介叙事提供了更广阔的技术基础和叙事资源。

在长江禁渔政策的传播逻辑中，“封捕”阶段通过规制与高强度政策传播初步实现了环境治理成效。然而，这种规制逻辑更多聚焦于短期目标，对生态文化的深层塑造较为有限。“共生”阶段的传播逻辑需要进一步从单向规制转向多向互动，从短期环境修复的叙事转向长期生态文化理念的塑造与传播。

二、媒介叙事的动态分层：危机、转型与共生

在环境传播的实践场域中，媒介叙事并非静态的话语堆砌，而是通过框架的动态调适来实现政策合理性的持续再生产。正如塔克曼所指出的，“新闻框架不仅决定了事件的选择方式，还影响着叙事结构和意义建构”^[8]。这种叙事分层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呈现出“危机驱动—主体转型—共生认同”的螺旋演进特征——媒介既作为权力技术的操演平台强化治理效能，又作为文化中介者重构政策的社会意义网络。在此过程中，“禁渔”从单纯的生态保护指令，逐步升维为关乎文明存续的伦理命题，而媒介叙事的动态分层恰为这种意义转化提供了结构性支撑。

（一）生态危机框架：强化政策紧迫性与合理性

环境传播学者罗伯特·考克斯认为，环境传播既是“理解环境问题的实用性工具”，也是“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性媒介”，其目的在于通过话语实践协调多元主体的环境争议，并塑造社会认知的合法性边界^[9]。“封捕”政策的落地不仅依赖政策文本的强制性规制，更需通过媒介的符号权力完成从“制度约束”到“价值内化”的治理升级。在此过程中，媒介承担着政策解读、法律教育以及行为监督的多重功能。例如：主流媒体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禁渔令”“生态红线”等象征符号，通过高频重复强化政策的不可违逆性进行政策话语的权威编码；新闻报道以“湖南岳阳涉案渔获最多的长江非法捕捞案宣

判：十人获刑并承担生态赔偿”等典型案例，建构“违法必惩”的认知模板；社交媒体发起“我是长江守护者”话题挑战，通过用户生成内容(UGC)将个体行为纳入集体道德审查来实现道德共同体的情感动员。此外，地方政府和公益组织借助短视频、纪录片等媒介形式，推动禁渔理念的普及，让“封捕”不仅停留在行为层面，还渗透到公众的道德价值判断中。

（二）人文关怀框架：主体性重建与情感共同体的媒介实践

相较于报刊时期以文字叙事的方式传播情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则具备更强的“传情”能力^[10]。媒介人文关怀框架的构建，标志着长江禁渔政策传播“治理效能优先”的“文化正义转向”。这一框架以渔民主体性的重新发现为核心，通过情感劳动、记忆重构与参与式传播，将政策实践嵌入地方社会的关系网络，实现生态保护与社会公平的辩证统一。在人文关怀框架中，不仅通过舆论场塑造“生态保护”与“社会公平”并重的政策形象，也通过渔民个体故事强化公众的情感认同。

（三）成效展现框架：生态治理的媒介化展演与共识性建构

禁渔政策的合法性建构，本质上是通过科学话语的理性权威与情感叙事的道德感召的协同互构实现的。媒介成效展现框架旨在通过对政策实施效果的传播，向公众传递政策成效与愿景，标志着长江禁渔政策传播从“问题导向”向“成果导向”的叙事转型，促使公众形成对“共生”理念的深刻认同。这一框架强调以数据化、可视化和案例化的传播方式，将生态修复的抽象进程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媒介事件。以2023年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发布的《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与环境公报》为例，其量化数据显示：禁渔政策实施三年后，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59.8亿粒/尾，较禁渔前基准年(2020年)增长340%；长江下游刀鲚单位捕捞量提升至30.6千

克，为2020年的7.3倍^[1]。央广网将这一数据转化为可视化动态图表，更配以从“休养生息”到“生生不息”的标语，这种双重逻辑的耦合，既符合现代环境治理对“证据驱动”决策的规范性要求，又暗合公众认知中“情感优先”的传播规律。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还通过拟人化叙事完成了情感动员的符号转化。

三、生态文化传播的“三元悖论”与破局路径

（一）权力博弈：科层理性与文化实践的冲突

作为中国生态保护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长江禁捕政策的实施，可以说涉及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媒体和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然而，这些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同机制或多或少存在着“罅隙”和“噪声”的干扰，导致传播信息的割裂与不一致。例如，中央政府强调政策的整体生态目标，但地方媒体在报道时常聚焦于区域经济效益，忽视对生态文化理念的深层次解读。科研机构的专业研究结果与政策解读未能通过媒体有效传递，而社会组织的参与也显得形式单一，难以形成推动禁捕政策传播与落实的合力。这种信息割裂模糊了政策的核心目标，也使公众难以形成统一认知。为解决这一问题亟需建立跨主体协同机制，通过定期交流与信息共享，确保传播内容的全面性、整体性、连贯性与权威性。

（二）技术迷思：媒介赋权与记忆消解的悖论

所谓媒介赋权，是指借助媒介的力量使得相关主体“在话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领域有可能得到权力和能力的提升”^[11]。现代传播技术在长江禁捕政策的传播中虽提供了更多可能，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存在着内容与形式未能完全适配的局限。例如一些地方过于追求技术展示，在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呈现生态保护数据时却忽略了内容深度与文化内涵的表达。虽然利用短视频和直播等形式进行传播能够受到广泛关注，

但其内容常以娱乐化为导向，缺乏对政策背后生态文化价值的系统性阐释。

未来的传播应更加注重技术与内容的有机结合，例如通过VR技术展示长江生态恢复的动态过程，增强沉浸式体验，或以真实的生态保护故事为核心创作短视频，来传递政策背后的人文价值，进一步推动政策传播从信息告知向文化共鸣的转变。通过协同合作、分层传播和技术创新的整合实践，长江禁捕政策的传播效果将得到更大提升，进而推动生态文化理念的广泛认同与践行。

（三）身份重构：生态公民与传统渔民的认同代差

随着长江禁捕政策的系统性施行，长江流域的社会结构经历了深度的结构化变迁。这一变迁在数据层面有着直观体现。截至2020年底，农业农村部在沿长江10省(市)共核定退捕渔船11.1万艘、渔民23.1万人^[12]。基数如此庞大的转业群体规模，对长江流域社会结构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生态公民与传统渔民之间的认同分野成为政策推行与社会发展进程中亟待剖析与解决的核心议题。这种认同分野不仅具象化于对政策文本的诠释、接纳程度，更深层次地映射于两者在身份重塑进程中价值体系的矛盾与冲突。

正是由于生态公民与传统渔民之间存在如此显著的认同分野，长江禁捕政策在传播与执行过程中，亟需强化公众的主体性参与以及传播的下沉式拓展，以此消解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认知偏差。一方面，可通过社区传播、基层文化活动等多元化传播渠道，将生态文化传播深度嵌入地方生活情境，实现政策理念与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例如，在乡村场域举办生态保护主题活动，如长江禁捕的叙事分享会，或将禁捕政策有机融入地方文化节庆活动，以此激发基层民众尤其是传统渔民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使其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逐步理解并接纳禁捕政策的深层意义。另一方面，可设计并开展更多公众可参与

的生态保护实践活动，如招募志愿者参与沿江生态监测、河岸环境整治等项目，实现传播模式从单向度信息传输向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转变，逐步弥合认同分野，形成政策推行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长江禁捕政策的高效落实与长效发展。

四、余论

从“封捕”到“共生”，生态文化传播的路径呈现出由短期规制到长期文化塑造的深刻转型。从环境传播学的视角看，生态文化传播不仅关乎一时一地的环境问题，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长期承诺。在这一生态文化传播过程中，媒体不仅要为政策提供支持，更要在塑造生

态文明的过程中担负起引导舆论、激发参与的责任。禁渔政策的传播与实施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面临许多挑战。比如，如何在生态保护与渔民生计转型之间找到平衡点，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政策中强制性措施虽然取得了初步的环境改善效果，但渔民的生计问题的解决、文化认同的转型以及生态保护的公众参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仍需通过更为细致的媒介传播策略和社会支持来进一步推动。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均在回应着长江流域复杂的生态、社会与文化挑战，同时，也在为我们理解如何通过媒介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推动生态文化的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3年)[EB/OL].(2024-08-12)[2024-10-01].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8/content_6967878.htm.
- [2] 田浩.重估“情感公众”:用户行动与数字新闻研究的链路拓展[J].新闻界,2024(6):13-21.
- [3] COX R. Nature's "Crisis Disciplines": Do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ve an Ethical Duty? [J].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 2007, 1(1): 5-20.
- [4] 张玉林.“人类世”时代的长江:生命衰减的社会动力[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3):107-122.
- [5] Aleida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Functions, Media and Archiv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0.
- [6] 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奋力谱写长江大保护新篇章[J].宏观经济管理,2024(5):1-2.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
- [8] Tuchman G. Telling Storie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6: 93-97.
- [9] COX 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M]. London: Sage, 2006: 12.
- [10] 袁光锋.增值、转化与创造边界:论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流通[M].南京社会科学,2022(9):114.
- [11] 丁末,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78.
- [12] 农业农村部就介绍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阶段性成效和下一步工作安排举行发布会[EB/OL].(2024-09-26)[2024-10-01].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7010811.htm.

责任编辑 夏继先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李润源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尝试通过探寻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机制, 进而阐明新质生产力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潜力。最终, 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17(2025)08-0045-0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 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1]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新时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已经成为驱动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的核心议题。但当前我国正面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度不高、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产业体系大而不强等挑战, 亟需新质生产力深度赋能, 通过科技与文化融合的创新路径破解发展困境, 重塑文化创新体系, 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以应对全球格局的变化, 彰显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新质生产力作为契合高质

量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能够以创新性、优质性和先进性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因此, 深入探索其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学术任务。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新质生产力凭借其先进的理念和科学技术,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阶段, 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全新的认知框架与实践路径, 更在产业维

收稿日期: 2025-02-26

基金项目: 2024 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价值意蕴与推进路径研究”(项目号: 2024BKS028); 2024 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调研课题“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研究”(项目号: SKL-2024-45)

作者简介: 李润源(2001—), 男, 汉族, 河南平顶山人,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度激发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国际层面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支撑，是重塑文化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

（一）新质生产力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认知范式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形态，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体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认知范式实现了革命性重构。在传统认知框架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导致其现代化转型面临系统性困境，而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打破了这一认知壁垒，使学界得以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大数据技术实现了对文化典籍和民俗资料的系统性数字化处理与智能分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建模实现了传统技艺的数字化模拟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构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技术路径；虚拟现实技术则通过沉浸式体验重构了文化传播范式，在拓展受众范围的同时深化了文化认同。这种认知范式的转型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关联，更通过技术中介作用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潜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实践路径。

（二）促进文化产业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新质生产力作为驱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能，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的双重路径重构了文化经济生态。在内容生产维度，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了文化创作从经验导向向数据驱动的模式转换，通过用户画像分析与市场预测模型的精准构建，显著提升了文化产品的创新效能与市场适配度；在传播领域，基于5G网络与扩展现实技术构建的跨时空传播矩阵，不仅突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物理边界，更通过沉浸式交互

体验重构了文化消费场景，推动文化消费结构向高品质、个性化方向演进；在产业形态层面，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融合模式通过要素重组与价值链整合，培育出数字文创、文旅元宇宙等新兴业态，这种产业跨界融合不仅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多维增值，更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形成经济增长乘数，使文化产业逐步发展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这本质上体现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三）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新质生产力作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引擎，通过技术创新与传播范式重构的双重机制，显著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在资源整合层面，依托文化大数据平台的精准需求分析与市场预测模型，形成了动态适配的国际文化交流机制，这种数据驱动的精准传播模式大幅提升了文化认同建构的实效性；在价值转化方面，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数字文创产业通过与价值链整合，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集群，这种以技术创新为内核、产业输出为载体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路径，不仅重构了国际文化权力格局中的话语权分配机制，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实践范式。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2] 生产力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与社会财富创造的基石，是推动社会形态更迭与文化繁荣的决定性力量。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范式的革新与跃升，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产物，其重塑了当代社会生产架构与价值生成逻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源泉。

（一）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生产关系范式跃迁

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生产关系范式跃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文化领域的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革命性突破会引发生产关系历史性重构，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变革。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系统的范式跃迁，以技术形态颠覆性创新、生产要素创造性配置、生产过程系统性重构为核心，不仅实现工具理性升级，更冲击传统生产关系稳定性，倒逼社会关系适应性转型。在文化领域，原有生产关系受物质性、地域性、排他性局限，束缚文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凭借新技术、新效能，打破传统文化生产关系的时空壁垒，让文化传播突破地域限制，实现更广泛传播，同时，借助数据要素流动性，重构文化价值流通范式，使文化价值在不同主体间更高效流通与共享。这一过程推动文化形态从“传统固守”向“创新共生”转变，促使文化生产关系向开放性、流动性、共享性新型关系演进。新质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新动力源，促使社会为适应其需求调整重组生产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转型，充分彰显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有力证明了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社会形态更迭的核心力量。

（二）新质生产力倒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转型

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之后，原有的生产关系必须主动调整以适应新生产力的需求，否则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势必带来新的技术革命，这必将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在这种新质生产力推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也证明生产力进步的需求会带动生产关系随之改变，以匹配新质生产力水平。新质生产力作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驱动其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动能，实现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深度探索，充分体现了生产关

系需主动调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通过促使其实现质的飞跃，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进而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动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与经济基础的互动重构

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重要构成，受生产力发展制约。技术革新推动文化传播方式变革，作用于上层建筑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通过文化的创新拉动经济增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新质生产力凭借高科技创新、高效能运作与高质量产出的重要优势，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核心力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活力。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与推动力，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断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提升人民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球文化交流互鉴与文明对话，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内涵与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丰富了文化产业内涵外延，拉动文化消费与经济增长，生动体现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文化维度。从生产力的视角剖析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既是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拓展深化，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新方向的深刻洞察。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主要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3]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已成为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新质生产力作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步入前所未有的转型与革新阶段。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就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着力以数字技术重构文化叙事，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度，以数据驱动创新机制，突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瓶颈，以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生态，以高素质人才支撑创新体系，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的内生动力。

（一）以数字技术重构文化叙事，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4]新质生产力中的数字技术正成为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因素，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处于“文化传承稳定性与时代创新需求矛盾”的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面临认同度不足问题，亟需以数字技术重构文化叙事以提升认同度。数字技术重构文化叙事面临文化符号脱离原生环境的挑战，民俗活动、传统技艺等在数字化传播中其文化内涵常被剥离；缘于数字空间与传统场域信息承载方式差异，线下仪式构建的沉浸式认知体系在数字化传播中常常被压缩为单维度视听符号，且易受流量逻辑解构。为此，需以数字技术重构文化叙事：借助人工智能解析民间传说、节庆仪轨，挖掘深层价值，将表层行为转化为现代价值对话；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复现传统活动场景，使隐性知识可视化；针对不同受众开发差异化传播策略，为青少年设计互动游戏，面向国际观众开展对比展陈；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文化元数据档案，确保符号解释权回归文化持有者；在算法推送机制中注入文化自觉，优先推荐优质内容。唯有使数字技术兼具文化符号“翻译器”与精神价值“守护者”双重功能，方能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搭建理解桥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被观看”向“被认同”转变。

（二）以数据驱动创新机制，突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瓶颈

在新质生产力技术驱动下，以数据驱动创新机制破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动能不足之困局并构建全流程创新生态，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升级与影响力拓展的关键路径。当前制约其创新发展的核心因素在于文化生产体系数字化转型中创新范式滞后与意义生成机制受阻，传统工艺传承的地域局限、地方民俗内涵的展演单向性以及传统美学特质的形式简化等问题亟待通过技术赋能加以解决。故需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涵盖文化资源深度挖掘、市场需求精准洞察与价值转化高效赋能的完整链条，通过系统采集非遗传承人口述资料、历史文献图像数据及文物三维扫描信息构建跨媒介文化基因数据库，并借助深度学习算法解析传统艺术内在规律。如对年画色彩进行聚类分析以揭示其哲学逻辑，对戏曲身段动作建模以提炼情感语法，进而将口传心授的隐性知识转化为可复用的数字资产。又如在文旅融合、制造业升级及服务业创新等领域，依托用户画像、消费偏好、位置数据等多源信息，开发虚实联动的体验场景，转化传统工艺为现代设计语言，定制文化服务产品，并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文化创新评估模型与多元评价反馈机制，以实现文化资源数字化向创新应用智能化的跨越式发展，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形成市场需求与文化遗产的良性互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新路径。

（三）以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生态

以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生态，需立足数字技术与文化生产深度融合，系统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质生产力，打破传统文化产业孤立分散格局，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动态创新网络。通过

运用新技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建立文化资源智能分析系统实现精准提取、高效整合与深度挖掘，为创新提供素材与形式支撑。政府应搭建跨行业协作平台推动创新联盟形成，以政策促融合；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需紧密合作，加速成果转化并强化市场需求分析。同时，政府需统筹跨层级协同机制，依托智能分析平台推动文化资源动态开发；各方应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关键技术领域联合攻关，加速成果转化并回应市场需求，开发新型业态以推动传统文化消费体验升级。此外，应扩展全球化视野，以数字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构建跨境协作平台推动文化全球对话，提升文化软实力；完善市场化机制、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复合型人才，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最终形成技术驱动、生态共生、内外循环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实现传统文化从资源存量到创新增量、从本土传承到全球共享的全面跃升。

（四）以高素质人才支撑创新体系，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5]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在于人才培养，构建高素质人才支撑体系是破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核心命题的关键，需变革知识生产模式以重构传统文化现代转译能力。当前传统文化创新面临传统知识体系与数字技术逻辑的认知鸿沟及人才结构性断层，亟需培养兼具双重知识编码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此，交叉学科建设应推动文化遗产学与数据科学深度融合，构建涵盖文化计算等领域的课

程体系，培育跨学科研究力量；重构知识传递链，建立传承人、技术专家与市场运营者的协同创新网络，形成文化基因转译方法论；完善产学研协同机制，突破壁垒组建跨领域创新共同体，实现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标准化；注重技术伦理，平衡历史真实性与审美创新性，培养具有文化价值判断力的技术应用人才；强化基层在地化人才培养，依托数字技能实训体系培育技术型工作者，构建文化资源活化网络；革新人才评价体系，真正地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唯有构建覆盖人才培育、知识生产与实践应用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方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可持续智力动能，促进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

结语

新质生产力作为党领导的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既以科技革新与产业升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筑牢根基、开辟新域，又借数字技术推动文化的国际交流，拓展其创新发展的国际视野与合作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命脉与社会发展根基，其繁荣发展关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与民族凝聚力增强。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性支撑作用。展望未来，我们应持续探索新质生产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以实现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4-8.
- [2]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J].求是,2022(18):4-9.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6.

- [4]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N].人民日报,2022-06-01(1).

-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13.

责任编辑 刘 钊

河南省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与对策建议

何 水,高向波

(郑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推进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调整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必经之路。河南省研究生教育不断取得新发展、新突破,学位点持续增加、培养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全面提升,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不够契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学位点布局不均衡,学科优势特色不显著;研究生培养规模小,硕博生比例失调;高水平教学成果少,创新成果培育不够;研究生培养经费较少,重点科研平台不足。深入推进河南省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优化学科学位结构、稳步扩大培养规模、孵化教育创新成果、夯实经费平台保障等方面精准施策。

关键词: 河南省;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17(2025)08-0050-05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竞争力的关键标志,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力引擎和必经之路。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研究生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高端引领和战略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2]作为户籍人口总量排名全国第一、经济总量全国排名第六的省份,河南省研究生教育质量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总体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中,着力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结合部”^[3]优势,将为河南省凝聚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的独特优势和强劲动力,践行“两高四

收稿日期: 2025-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对县域治理能力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3AZZ008);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生课程体系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YJS2025ZM04)

作者简介: 何水(1980—),男,汉族,安徽宣城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府改革、公共服务、地方治理等;高向波(1994—),通信作者,男,汉族,陕西榆林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治理与改革。

着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人才中心提供有力支撑。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通过横向、纵向的数据对比分析，准确把握河南省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总体状况，诊清制约河南省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所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助推河南省研究生教育质量全面提升，进而为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镜鉴。

一、河南省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

自1978年研究生教育恢复招生以来，河南省持续完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研究生教育不断取得新发展、新突破，学位点持续增加，培养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全面提升。

（一）学位授权点数量持续增加

河南省不断推进学位点建设，扩大学位点规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河南省11所院校新增了3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1所院校新增了10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增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平顶山学院、河南城建学院新增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截至2024年底，河南省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27处，其中科研机构8处^[4]，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19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9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359个^①，涵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医、农、教育、艺术等多个学科门类，为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二）研究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

河南省合理把握研究生教育发展节奏，逐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基本建立了与国家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人口规模结构、高等教育自身规律等相适应的研究生教育体系，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显著增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水平人才支撑。《河南省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2019—2024年，河南省研究生招生人数由2.1万增至3.7万，增长76.19%；在学人数由5.54万增至10.64万，增长

92.06%；毕业人数由1.61万增至2.91万，增长80.75%。

（三）研究生教育质量全面提升

河南省启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提升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持续推进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多渠道全方位狠抓研究生教育质量。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2024》显示，河南省研究生整体发展水平得分74.60，位居全国第14位。其中，教育创新显示度68.35、条件支撑度82.66、社会贡献度67.45、发展匹配度79.94^[5]。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等发布的《中国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24—2025）》也显示，河南省研究生教育地区竞争力全国排名第15位，其中办学资源排名第15位、教研产出排名第14位、质量与影响排名第16位、学术声誉排名第15位^[6]。

二、河南省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尽管河南省研究生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不够契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学位点布局不均衡，学科优势特色不显著

学位点和学科专业是研究生培养的载体。从学位点来看，河南省初步形成了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人才培养格局，但硕、博士点比例为5.52:1，学术学位点与专业学位点比例为1.36:1，均高于全国（分别为3.01:1^②和1.26:1^[7]），博士点、专业学位点占比仍较小。此外，河南省还存在一些学位点空白，尚无社会学(0303)、遥感科学与技术(0816)、农业(0951)、音乐(1352)、美术与书法(1356)等博士点。从学科建设来看，河南省学科设置较为全面，但缺乏核心的顶尖学科。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显示，河南省高校目前没有一个学科达到A类，省内高校B+学科提档升级任务艰巨。与此同时，

在国家公布的两轮“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河南省仅有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4个一流建设学科(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临床医学;河南大学:生物学),不足全国一流建设学科总数的1%。

(二) 研究生培养规模小,硕博生比例失调

规模和结构是反映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8]。从研究生招生人数来看,2024年河南省招收研究生3.7万人,远低于湖北省(7.72万人)、安徽省(4.3万人)和湖南省(4.2万人)等省份,仅占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的2.73%,研究生招生培养规模与河南省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占全国6.95%)不相匹配,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人数亟需扩大。从千人注册研究生数来看,河南(1.09人)为中部六省最低(湖北4.15人,安徽2.06人,湖南2.00人,山西1.86人,江西1.69人),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1人)^③。从硕博生比例来看,河南省硕博生比例为14.24:1,而全国硕博生比例为5.06:1^④,“硕士生多、博士生少”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博士生数量明显不足。

(三) 高水平教学成果少,创新成果培育不够

研究生教学成果与研究生创新成果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反映研究生培养水平的重要指标。从教学成果奖数量来看,最近一次即2022年国家教学成果奖(研究生),河南省获4项二等奖[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牵头)、河南师范大学各1项],远低于湖北省(17)、湖

南省(20)和安徽省(10),与山西省(3)和江西省(5)大体持平^⑤。从在校研究生参加中国研究生创新系列竞赛情况来看,2022年河南省共有3616人1093支队伍参赛,参赛人数和团队数均少于湖北省(7746/2291)、湖南省(4883/1475),获得各类奖项157项,特等奖1项、一等奖10项、二等奖36项、三等奖110项,获奖总数和高层次奖项均少于湖北省(576:2/46/222/306)、湖南省(541:1/32/226/282)^[5]。

(四) 研究生培养经费较少,重点科研平台不足

科研经费和平台是研究生培养的基础支撑。从科研经费来看,河南省高校R&D经费收入和支出均少于湖北省、湖南省和安徽省,均多于江西省、山西省,其中人文社会科学R&D经费与中部其他五省差距相对较小,自然科学R&D经费与中部其他五省差距相对较大(详见表1)。同时,河南省高校研究生生均R&D经费^⑥为7.63万元/人,低于湖南省(10.97万元/人)和安徽省(10.79万元/人),研究生培养生均资源有待继续增加。从科研平台来看,目前由河南省高校依托、共建或参与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共有11个,低于湖北省(24个)、湖南省(14个)和安徽省(12个),且由河南省高校牵头(5个)或独立承建(2个)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少^⑦,高水平重点科研平台的短缺制约了河南省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表1 中部六省高等学校R&D经费收入支出情况(单位:万元)

省份	人文社会科学 R&D 收入	自然科学 R&D 收入	高等学校 R&D 经费内部支出	研究生生均高等学校 R&D 经费支出
河南省	153323.5622	733034.7	701309	7.63
湖北省	172778.8701	1733041.8	1177531	5.42
湖南省	203145.1326	1263547.9	1290449	10.97
山西省	51234.5178	325581.6	202591	3.64
安徽省	189940.6601	1268479	1198037	10.79
江西省	66494.8991	504212.8	384121	5.79

数据来源:《2023年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经费收入情况表》《2023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3》。

三、河南省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9]。针对前述问题，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加快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推动河南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取得新突破。

（一）加强系统谋划，优化学科学位结构

一是统筹学位授权布局，全力争取扩大学位授权点规模，着力培育与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学位点，积极发展河南急需紧缺和特色鲜明的学位授权点，努力填补空白学位授权点，精准布局研究生培养。二是优化学术学位、专业学位两类研究生规模结构，强化两类学位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要求，推进学术创新型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发展，重点加快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增加一批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三是瞄准第六轮学科评估，以学位点和学科评估涉及的指标为参考，对现有学位点建设情况和发展态势进行客观评价，考虑对部分学位点撤销合并或整改提升，提高高校学位点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适配度、与学生全面发展的契合度。四是瞄准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以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目标，持续优化高校学科专业体系，统筹整合地方、行业、企业资源，支持高校对接行业、企业人才需求，完善学科超常布局及动态调整机制，调整、改造、重组现有学科专业，做强优势特色学科、做精战略基础学科、超前布局交叉新兴学科、稳定支持濒危冷门学科，打造一批特色学科专业集群。

（二）坚持整体推进，稳步扩大培养规模

一是实施教育规模扩容行动，综合考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宏观战略需求、人口规模结构、高等教育自身规律等因素，持续扩大研究生

总体培养规模，稳步提高理、工、农、医类人才培养占比，实现研究生培养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总体适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二是合理把握河南省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节奏，多措并举增加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大幅提升博士研究生特别是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不断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三是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按照教育部2025年末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尤其是工程技术领域的高层次应用型领军人才培养，持续加强关键领域战略科技人才储备。

（三）注重项目带动，孵化教育创新成果

一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与质量提升，加强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 and 标准建设，深化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强化精品教学课程、案例和教材建设，分类建设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工作站，培育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成果。二是搭建高水平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重点依托科研项目和创新研究课题培养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指导和鼓励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大赛，通过开展高水平实践活动、培育高水平竞赛成果、奖励高水平科研成果等多种综合途径，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研究生创新实践竞赛品牌。三是强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加强校企产学研合作项目建设，鼓励各高校主动牵头或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深入推进卓越工程师、医教协同、“科技小院”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满足不同学科专业、不同类型、不同学习阶段研究生的实践需求，推动研究生在原始创新研究和高水平实践成果上取得突破。

（四）强化载体建设，夯实经费平台保障

一是建立健全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以科研项目申报为依托持续增加R&D

经费特别是自然科学R&D经费,在扩大培养规模的同时保证生均培养经费只增不减,加强和更新研究生教学科研技术装备和学习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研究生培养软硬件条件。二是按照《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财教〔2024〕181号),修订出台河南省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助学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鼓励培养单位使用科研项目资金支持研究生培养。三是以全国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为契机,分类别、分批次、分领域开展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整,以高校优势特色学科为支撑,支持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合作共建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河南特色实验室体系。

注释:

①根据2019—2024年河南省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河南省学位委员会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2022年经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

名单》等文件测算而来。

②不考虑因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导致的学位授权点数量变化,截至2024年9月,全国博士学位授权点共计528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5902个。据此测算,全国硕、博士点比例为3.01:1。

③根据2024年全国及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测算而来,其中,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在学研究生数/常住人口数[单位:千人]。

④根据《2024年河南省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有关数据测算而来。

⑤根据《教育部关于批准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获奖项目的决定》有关数据测算而来。

⑥研究生生均高等学校R&D经费支出=高等学校R&D经费内部支出/在校研究生人数。

⑦相关数据截至2025年1月15日,主要来源于青塔(CINGTA)、各大高校官网和公开新闻报道等,部分建设单位或统计不全。

参考文献

- [1] 洪大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3(9):1-7.
- [2] 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OL].(2020-07-29)[2025-02-23].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29/content_5531011.htm.
- [3] 吴刚.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N].中国教育报,2024-09-09(4).
- [4] 2024年河南省教育事业统计公报[EB/OL].(2025-03-10)[2025-03-23].<https://jyt.henan.gov.cn/2025/03-11/3135233.html>.
- [5] 王战军.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 2024[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2024:72-93.

- [6] 邱均平.中国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24—2025)[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4:207.
- [7] 王伟宜,温军英.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12-20(A05).
- [8] 王战军,张微.研究生教育强国:概念内涵、核心要素和建设方略[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4(7):50-57.
- [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责任编辑 谢建文

智媒时代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困境突围 与发展路径探析

李 娟¹, 赵欣然²

(1. 新乡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3; 2.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智媒时代对高校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需探索创新路径以适应信息传播变革。高校应利用智能媒体技术, 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教育体系, 通过新媒体渠道推送富有教育性的内容, 并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精准施教。同时, 探索互动式、体验式教育模式, 运用VR、AR等技术创设逼真教育情境, 鼓励学生发表观点、交流思想。此外,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和媒体运用能力, 培养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 智媒时代; 高校; 理想信念教育; 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 G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17(2025)08-0055-05

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于引导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及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具有重要意义^[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青年人要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中国青年才会有力量,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2]。因此,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面临着全球化、现代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以及智能媒体的迅猛发展, 作为移动媒体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 其理想信念的树立与发展伴随信息化进程而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单纯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深刻变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

虚拟现实以及ChatGPT、Deepseek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 媒体智能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 形成了以内嵌机器学习、算法推荐为核心的智能媒体时代^[3]。这一变革不仅为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培育带来了新的机遇, 同时也使这一实践过程充满了更多的变数与挑战。因此, 如何搞好高校理想信念教育, 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以及学术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智媒时代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 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高校学生的信息获取渠道更加多元, 思想也更加开放。这种变化对高校理想信念教育

收稿日期: 2025-01-15

基金项目: “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入脑入心策略与措施研究”(3A880023); 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类)“研究生国际联合培养模式实践与创新研究”(2023SJGLX095Y)

作者简介: 李娟(1980—), 女, 河南新乡人, 新乡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新闻学、高等教育; 赵欣然(2000—), 女, 新疆人,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新闻与传播。

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高校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高校需要适应时代变迁,利用智媒时代的优势,创新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方法,以满足新时代学生的教育需求。

首先,需要塑造正确价值观来引导人生方向。智媒时代的高校学生面临多元价值观冲击,易思想困惑、价值迷茫。理想信念是人生引路明灯,能指明方向,因此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可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明确目标追求,在复杂社会中保持清醒与坚定。智媒时代,高校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意义重大。融媒体发展为信息传播带来新机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开辟新路径。高校应创新教育手段,结合社会实际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融合,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然而,面对多元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传统理想信念教育模式的作用已显不足。因此,理论界需不断反思和重塑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框架,探索适应融媒体环境的新模式,整合多元教育资源,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体系^[4]。

其次,需要培养社会责任感来增强使命感。在智媒时代,高校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栋梁之材,其思想和行为将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融媒体时代,高校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意义尤为显著。理想信念教育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基石^[5]。面对信息传播迅速且多元的环境,大学生易受各种思想观念冲击,因而需要加强系统化的教育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年中的传播与认同,形成强大的思想凝聚力。同时,融媒体技术的普及使学生信息获取途径多样化。高校需要通过创新教育内容和形式,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激发

其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此外,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可以培育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对其独立思考的获得至关重要。

二、智媒时代下高校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是主流价值引领力弱化。在智媒时代,高校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主流价值引领力弱化的挑战,本质上是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博弈的缩影。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如同无形的认知牢笼,将个体困在偏好构建的舒适圈中。当短视频平台根据点赞记录无限推送娱乐段子时,当社交媒体利用关键词屏蔽严肃理论讨论时,青年学生的认知边界便在无形中被算法框定,他们的视野逐渐被窄化为“量身定做”的井口天空。

娱乐化浪潮加剧价值解构。在流量逻辑下,智媒体优先推送高点击率内容,党史故事被解构成猎奇野史,英雄人物遭人设崩塌揣测。某高校调查显示,76%学生每日接触信息中娱乐内容占比超40%,时政新闻不足15%。

技术异化风险同样不容忽视。部分高校将“智慧思政”简化为APP签到和学分统计,将复杂的思想引导异化为数据考核。当教育者依赖算法生成“完美”教案时,当课堂互动沦为弹幕刷屏时,教育过程便失去了应有的温度与深度。这种工具化倾向不仅削弱教育的人文属性,更在代际认知差异中放大传播隔阂——习惯5分钟短视频获取知识的“网生代”对45分钟理论课堂的抵触情绪愈发强烈。

权威消解的危机同样严峻。传统媒体时代“自上而下”的榜样宣传模式,在自媒体时代遭遇解构式围观。当官方推出的“最美大学生”被恶意剪辑成“摆拍作秀”时,当学术讲座弹幕中充斥“鸡汤文学”的嘲讽时,传统话语体系的权威性便逐渐流失。这种信任危机导致主流叙事陷入“塔西佗陷阱”,教育者的理论阐释在谣言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总之，高校面对挑战需构建“技术赋能+人文守护”体系，利用算法优化内容分发、建主流价值内容池，强化教育者数字素养并创新叙事，借智慧教室等重构教育仪式感以守住价值锚点。如此，方能在智媒时代重塑理想信念“教育磁场”。

二是教育方式方法创新不足。传统的单向灌输模式难适应智媒时代的认知革命。算法推送造就“5秒注意力经济”，短视频平台以15秒高潮改变叙事，若高校课堂仍守45分钟线性讲授，就如同用算盘对抗量子计算机。某高校调研表明，传统讲授班级学生课堂抬头率不足60%，引入AI实时互动系统的班级参与度达92%，这种参与度差异凸显出传统教育节奏与数字原生代神经回路存在深层矛盾。

智能技术整合的表层化困境同样值得关注。多数高校虽配备了智慧教室设备，但使用率不足30%，VR/AR教学系统沦为参观展示的“科技盆景”。技术赋能的潜能远未释放，大数据停留在统计考勤的初级阶段，未能被用于构建学生思想动态的数字画像。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技术应用，折射出教育者数字思维转型的滞后。

教育内容形式的代际适配危机更为严峻。当B站“红色剧本杀”实现百万点击量时，当《觉醒年代》影视片段成为青年自传播爆款时，高校教材却仍固守“章节体”理论叙述。某高校对比实验表明，采用影视化案例教学的班级，理论认同度比传统班级高47%。这种传播效能的差异，本质上是话语体系与媒介生态的错位。

教育场景时空局限正削弱教育影响力。青年日均触媒超8小时，教育若仍局限于课堂，如刻舟求剑。元宇宙党建馆等创新虽在部分高校试点，但未规模化应用。教育场景碎片化，使价值引导难深入青年数字生活。

三是师生主体能动性降低。智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获取变得异常便捷，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过载和碎片化的问题。师生们在海量的

信息面前，往往感到无所适从，他们难以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这种信息的泛滥和碎片化，导致师生的注意力和精力被分散，主体能动性逐渐降低。

对于学生而言，教师不再是他们信息的唯一来源，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到丰富的知识和信息。这使得教师在课堂上的权威性和引导力受到了一定的挑战。部分教师可能因此产生挫败感，丧失主动创新和改革教学的动力。智媒时代的信息多样性也让学生感到迷茫。他们难以分辨信息的真伪和价值，容易被一些表面光鲜但缺乏深度的内容所吸引。这种浅尝辄止的学习方式，不仅无法培养他们的深度思考能力，还可能影响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因此，智媒时代下高校理想信念教育需要面对师生主体能动性降低的挑战。高校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引导师生正确应对信息过载和碎片化的问题，激发他们的主体能动性，培养他们的深度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以确保理想信念教育有效进行。

四是网络信息环境复杂化。在智媒时代，高校理想信念教育正遭遇到网络信息环境复杂化的严峻挑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这也使得网络信息环境变得日益复杂。一方面，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思想观点、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其中不乏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内容。这些多元化的信息源让学生们在选择时感到困惑，容易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冲击，影响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难以保证，虚假信息、谣言和误导性言论在网络上肆虐，使得学生们在获取信息时难以分辨真伪。这种信息环境的混乱，不仅增加了学生们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也对他们的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这种挑战，高校理想信念教育需积极应对，加强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提高其信息筛选鉴

别能力，同时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确保学生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总之，高校理想信念教育要适应网络信息环境的变化，加强教育引导与信息素养培养，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三、创新探索：构建“技术—内容—主体”三位一体的教育新范式

首先，要重塑主流价值传播链，构建青年话语体系。在智媒时代，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创新需以“重塑主流价值传播链”和“构建青年话语体系”为双引擎，通过技术赋能与文化共鸣实现教育范式的重构。

传统单向灌输模式已难以适应青年认知习惯，高校需利用算法技术精准捕捉青年兴趣点，将主流价值融入青年文化场景。例如：开发交互式党史学习应用，将长征历史转化为沉浸式游戏关卡；运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革命场景，让青年感知文化自信。这种传播链的重塑，使严肃理论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媒介体验。

构建青年话语体系，教育者需主动“破圈”融入“Z世代”文化。可建动态话语库，用青年熟悉话语解读主流概念；可设“青年金句奖”，激励学生重构主流叙事，可引入“数字原住民导师计划”，邀“00后”学生参与高校思政课教案设计，将前沿议题纳入课堂讨论。

技术赋能与文化共鸣要形成闭环。开发智能思政平台，借AI分析学习数据推送个性化学习包；建立“理论—实践”转化机制，如组织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参与舆情引导以实现线上影响力线下转化。此外，高校可与自媒体合作开展“国潮文创大赛”，助力青年在创作中完成价值内化。

智媒时代，高校需在创新中坚守底线。建立“主流价值负面清单”红线，以“守正创新”平衡尊重青年主体性与确保正确教育方向。智媒时代的高校理想信念教育，正在技术理性与价值温度的结合中探索新路径。当青年能用自己的话语讲述红色故事、用数字技术传播中国声音时，就

可以说主流价值的种子真正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了。

其次，创新理想信念教育方法，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为了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教师需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时空界限，构建多维立体的创新教学体系。这种体系以学习中心的范式转型为核心，通过教学结构的重构与学习场景的再造，实现知识传递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

可推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课前自主研习—课堂协作探究”的双向互动机制。教师依托新媒体平台推送定制化学习资源包，引导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理论框架搭建，将课堂转化为问题工坊与思维实验室。这种角色翻转不仅有助于实现知识获取路径革新，更有助于推动学生从“信息容器”向认知主体蜕变。课堂摆脱知识灌输的线性束缚后，深度研讨、项目实践与创新实验成教学常态，知识习得升华为思维训练与价值塑造。

在此基础上，应开发“微课程”生态体系，将理想信念教育精髓解构成系列知识组件。依认知心理学组块化原理，制作5~8分钟高密度微视频，用动画、情景剧等沉浸式表达转化抽象理论。此“数字拼图”学习模式适应“Z世代”信息获取习惯，形成智能循环，知识体系碎片化渗透生活场景，实现理论教育从课堂说教到生活浸润的范式转换。

更要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实践育人模式，打造虚实相生的教育场域。通过设计网络文明传播大赛、云端志愿服务等主题项目，构建“理论认知—情境体验—行为强化”的教育闭环。在元宇宙展馆中重现红色记忆，在数字孪生社区开展公益实践，使理想信念教育突破物理空间的局限。当学生以数字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实践时，价值认同便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完成了具象化建构，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创新实践能力便获得双重提升。

这种教学策略革新是教育本质的回归，它要

求教师转型为善于创新重组教学要素、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生态成长的学习设计师。教育应当兼顾认知规律与人文关怀,实现个性化学习需求与价值引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人才培养提供范式创新。

再次,加强新媒体素养教育,提升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新媒体素养。智媒时代,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给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有效应对这一变化,加强新媒体素养教育,提升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新媒体素养,成为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对策。

对于教育者而言,他们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新媒体素养,以适应智媒时代下的教育需求。这包括熟悉新媒体技术的运用,掌握信息传播的新规律,以及具备在网络环境中进行有效沟通和引导的能力。教育者应主动学习和掌握新媒体技术,如利用社交媒体、教育APP等平台,创新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方法,使教育内容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高校可通过组织新媒体素养讲座、研讨会、实践活动等促进师生交流合作以提升素养,还可利用校园智能媒体平台,例如校园APP、微信公众号等,定期发布相关知识,营造氛围,助力提升新媒体素养。

对于被教育者而言,加强新媒体素养教育同样至关重要。学生需要具备对新媒体信息的识别、筛选、批判性思考和有效运用的能力。高校应开设新媒体素养相关课程,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日常教学体系中,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媒体观念,培养他们在复杂网络信息环境中的独立思考

和判断能力。

最后,拓展理想信念教育新平台,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平台。智媒时代为理想信念教育构筑起了跨越时空的数字桥梁,它有效推动了教育场域从封闭校园向开放生态转型。高校应构建“云端+终端”的全域互动空间,通过集成化教育平台打破传统育人壁垒:教师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创设沉浸式理论课堂,借助AI算法实现学习资源的智能推送,为每位学生配备专属成长导师,通过线上工作室开展个性化思想引导,将理想信念教育转化为精准滴灌的心灵对话。

家校共育更需突破物理界限。高校通过虚拟教研室组织家长研修营,以数字沙盘推演教育场景,研发家校协同的素养提升方案。依托区块链的成长档案系统,可实时记录学生思想动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方数字画像,让教育网络全程浸润支持青年成长,培育有家国情怀的新人。

五、结语

智媒时代奔涌的数字浪潮,正重塑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时空维度。高校及教师应敏锐把握技术赋能的育人机遇,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新场域中构建立体化育人空间。努力打造集理论、实践、互动于一体的智慧化教育场景,将红色基因融入数字世界,让信仰力量在指尖传递中焕然一新。同时要构筑起数字安全防线,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与网络免疫力,通过师生智慧碰撞及家校协同,锻造兼具家国情怀与创新品格的新时代青年,使其在民族复兴中勇当先锋。

参考文献

- [1] 陈云云,许川川.“六体”联动:智媒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精准培育探索[J].现代教育科学,2023(5):91-97.
- [2] 杨世剑.数字化时代图书编辑素养提升的必要性与路径探析[J].新闻研究导刊,2023(10):240-242.
- [3] 费倩倩.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现路径[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S2):8-11.
- [4] 卢忠萍,王欣.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12):119-123.
- [5] 邹新.网络社会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境遇与路径选择[J].理论界,2013(10):151-153.

责任编辑 董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创新路径研究

李鹏鸽

(河南开放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在育人目标上高度契合。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底蕴,剖析二者深度耦合凸显的现实问题,进而从增强教师教育能力、培育大学生文化素养、实现教学体系有效对接、完善制度保障四个维度探索优化落实的实践路径,以期更好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育人作用。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高校思政课; 教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 D630;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17(2025)08-0060-0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因此,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教学体系相融合,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增强当代青年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底蕴

(一) 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道德观念。这些文化元素不仅包含了儒、道、墨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也涵盖了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儒家文化强调仁爱、礼义、诚信等道德观念,道家文化注重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这些思想观念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书画乐舞等也是重要的审美资源,它们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经史典籍、文学艺术、礼仪制度等为形式载体,蕴含了仁爱忠孝、以民为先、恪守诚信、崇尚正义、讲求和谐、天下大同等思想理念,鲜活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度与独特优势,这些

收稿日期: 2025-01-15

基金项目: 河南开放大学(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基金项目社科专项课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创新研究”(SZZX-2024-02)

作者简介: 李鹏鸽(1979—),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理念的一代代传承不仅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更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道德教育与人格培养

当下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问题时见报端,使得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道德观念尤为迫切。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有助于引导学生形成以和为贵、礼貌待人、诚信友善的待人接物之道。道家文化中的“无为而治”思想,有助于学生关注社会问题,正确看待和理解社会问题,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国学经典中蕴含的积极的人生哲理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传统文化中优秀的诗词歌赋书画艺术作品等是美的象征,通过学习和欣赏这些传统文化艺术作品,可以培养学生对美的追求和创造,提升其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三）文化认同与立德树人

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提供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应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系列课程和活动,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能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此外,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还能培养学生的协作意识,使其能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融入社会、保护自然,进而在思想意识方面形成良好价值观念,在行为处事上养成有益社会的规范和习惯,在道德品质上培育出良好的人文情操。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的现实问题

（一）思政课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运用不够

部分思政课教师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程度不够、创新转化力不足。一方面,部分教师

传统文化素养欠缺,在课堂实践中不能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并有效运用;另一方面,部分教师虽对优秀传统文化有较深的认知与研究,但难以将其创新转化成思政课教学所需要的资源素材,用于解决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困境。此外,思政课教师创新教学能力不足,固化的教学模式无法使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内容,无法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畅衔接,二者融合程度不够充分,育人价值难以全面体现^[3]。

（二）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知程度不足

首先,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学习较少。优秀传统文化外延极广,可当下的大学生对中华古代典籍研读不多,多数人仅停留在表层认知,没有系统性阅读和深入研究,对我国的古代智慧蕴含的哲理和蕴藏的机理无法做到通晓与消化。其次,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度不高。传统文化年代久远,且传统文化讲仁爱、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思想理念逐渐弱化,部分大学生鲜能在艺术、文化等方面与之共情。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锋之下,少数大学生价值观念摇摆不定,易受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影响。最后,大学生对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践行不够。中华传统美德具有人伦日用的化育功能,大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应能将传统美德中蕴含的伦理精神点点滴滴地融入生活中,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现阶段,部分大学生受精致利己主义的影响,重个人轻集体,重权利轻责任,这与我们应坚守的传统美德相悖。

（三）校本教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度不高

教育部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校本教材贯彻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就目前高校

校本教材的情况来看,思政课教材未能完整地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之处,两者融合程度不高。由于没有找准两者融入的合理契合点,教材不能将两者融合的最大效能发挥出来。高校教材编制者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筛选与提炼,将有益于大学生成长发展的资源编入校本教材。

(四)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阵地不牢

被称为互联网时代原住民的“00后”青年群体,已成为当前大学生群体的主体。因此,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新生代的特定需求。一方面,部分高校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采取的方式单一,未能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平台来传播国学文化,导致优秀传统文化难以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结合,从而影响其实际教育效果。另一方面,部分高校在运用网络新媒体进行国学文化宣传时,仅限于片面和浅层次的传播,缺乏对大学生对宣传内容的反馈以及认知程度的深入了解。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创新途径

(一) 增强教师传统文化教育能力

组织定期的传统文化素养培训。定期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训,增强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其文化素养,促进交流与分享,有助于帮助教师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髓,从而在教学中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训内容应涵盖传统文化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注重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应用,从而使教师能够更好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组织传统文化与教学的专题研讨。研讨主题应紧密结合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际需求,关注传

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未来走向,促进教师之间的思想碰撞和观点交流。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等问题,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和价值,揭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通过交流分享教学实践经验和案例,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教学能力,增强其教学自信心和创新能力。

建立有效的激励与考核机制。制定、完善奖励机制,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与研究基金,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成果奖,激发教师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力,增强教师的职业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将传统文化素养纳入教师考核体系,倒逼教师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从多个维度对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进行考核,结合学生的反馈和评价,对教师的传统文化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二) 培育大学生传统文化底蕴与人文素养

增设传统文化素养课程。增设传统文化必修课程,涵盖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形成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知和深刻理解,为学生后续传统文化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开设多样化的传统文化选修课程,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引导学生深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和人文价值。同时,积极改革现有课程,在各类专业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的内容和视角,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更多传统文化元素,通过讲解经典文献、分析文化现象、讨论社会问题等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应用。

组织实践活动。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实践教学资源,组织诗词创作和书法比赛、民间艺术体验、传统文化社团、志愿者活动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使其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增强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注重学生参与传统文化的保护

和传承工作，以锻炼其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和提升社会责任感。此外，还可以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和指导，帮助学生提高传统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

（三）实现教学体系有效对接

教学目标对接。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着天然的融合点，二者的对接不仅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优秀道德品质，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而传统文化教育则注重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历史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两者的结合可实现教育目标的互补，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学内容对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诸多思想智慧，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理念、“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以及“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等^[4]，若将其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将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领悟中华文化的精髓与内涵，进而强化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教学资源对接。在共享传统文化教学资源的过程中应注重资源的筛选和整理，要选择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实用性的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资源，以确保资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还需要对资源进行分类和整理，以方便教师查找和使用。此外，还需要建立资源更新机制，及时补充和更新教学资源，以保持资源的时效性和新鲜感。

教学评价对接。应充分考虑传统文化教育的

内容和要求，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教学评价体系，这必然要求在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时充分考虑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和要求，以确保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能够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进而更加精准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四）完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保障

明确制度框架与规范。确立清晰、全面的制度框架，涵盖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以及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明确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目标，精选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经典，注重内容的系统性和深度，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新性解读。鼓励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教师的教学质量。

强化制度执行与监督。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通过定期检查和依据评估教育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执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问责和惩处；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制度的执行情况。同时，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公布教育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接受社会监督；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教育工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为改进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优化资源配置与保障。加大经费投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金支持教育事业。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同时，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为教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完善教学设施和设备，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C].北京: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09-24.
- [2]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6(6).
- [3] 赵元.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南充:西华师范大学,2023.

- [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5] 刘戈,贺静云.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究[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24(8):107-112.

责任编辑 刘 钊

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新模式探究

——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为例

杨帅鹏,尹真杰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当前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具有特殊性,也面临着学风建设缺乏连续性、学风建设体系落后等问题。解决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面临的问题,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明确办学定位,二是构建特色学风体系,三是强化实践教学管理,四是建立质量监控机制。未来的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专业大类学风建设的差异化策略,以及数字化背景下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的创新模式。

关键词: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产教融合;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D63;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017(2025)08-0064-03

高等职业本科学校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精神,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以及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而新设的一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处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交叉地带,是两个领域共同的集合圈,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便是一所这样的学校。2019年,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顺利通过教育部复核认定,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A档前十建设单位;2022年,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被河南省纳入“十四五”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规划;2025年3月,教育部决定,同意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战略的推进,

职业本科院校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阵地迅速发展。新建职业本科院校既面临普通本科院校共性的学风问题,又面临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这类院校大多由高职院校升格或新建而成,在办学定位、管理模式等方面处于转型期,学风建设也面临独特挑战。研究新建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问题,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学风建设具有特殊性。职业本科院校的学风建设具有鲜明的类型教育特征,与学术型本科院校相比,其学风建设更强调“职业性”与“应用性”的融合。因此,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求学风建设必须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充

收稿日期:2025-02-12

作者简介:杨帅鹏(1989—),男,河南禹州人,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机械传动与控制。

分体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特色。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要培养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这种双重目标使得学风建设的内容和方式都具有特殊性。

其次，学风建设缺乏连续性。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由高职院校升格而来，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一是办学基础薄弱，尤其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生管理制度完善、校园文化传播等方面都处于转型过渡期；二是原有的高职教育管理模式与本科教育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三是社会认可度不高，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认知存在偏差。总之，学风建设缺乏连续性给学风建设带来了特殊挑战。

再次，学风建设体系落后。一是明确办学定位成为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等新建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的首要难题。部分院校对“职业本科”的内涵理解不深刻，在办学实践中存在“简单复制普通本科”或“延续高职专科模式”两种倾向。这种定位不清导致学风建设方向不明，难以形成特色^[1]。笔者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所作的内部问卷调查显示：约60%的院系尚未建立与职业本科教育相匹配的学风建设体系，管理制度滞后问题突出。二是同其他新建职业本科院校一样，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普遍存在本科教学管理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从而影响到学风建设。问卷调查数据显示：65%的新建职业本科院校仍在使用调整后的高职管理制度管理本科教学，导致管理效能低下；实践教学环节缺乏有效的质量监控机制，对学生的实践学习效果产生了不良影响。三是师生都存在适应困难，这也影响到学风建设。教师方面，原有高职教师面临教学理念和方法的转型压力，新引进教师又缺乏职业教育的经验；学生方面，调查发现超过70%的学生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认识存在偏差，部分学生存在“学历升级”的功利心态，甚至有学生认为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毕业就应该直接发

放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这也导致学生学习动力不足。

二、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问题优化方案

一是明确办学定位。职业本科院校应深入理解“职业本科”教育的内涵，确立“职业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的办学理念。具体而言就是，要制定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学风建设方案，突出技术技能培养特色，比如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将“工匠精神”融入学风建设，通过校企共建“大师工作室”等方式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2]。

二是构建特色学风体系。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根据专业特点建立了分类指导的学风建设机制：在理论教学方面强化学术规范教育；在实践教学方面突出职业素养培养；实施“双导师制”，由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指导学生，促进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结合；打造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校园文化，定期举办技能竞赛、创新创业活动等，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是强化实践教学管理。职业本科院校应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制定实践教学标准和考核办法。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确保实践教学质量。建立实践教学督导制度，对实习实训环节进行全过程监控。例如，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开发了“实践教学管理平台”，加强对大学生实习情况的实时跟踪和指导。

四是建立质量监控机制。构建包含教学质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评估、毕业生跟踪调查等环节的闭环质量监控体系。定期开展学风建设成效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客观评估学风建设效果。同时，对表现突出的师生给予表彰，形成良性循环^[3]。

三、结语

专科职业院校学风建设模式以理论与实践结

合为核心,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职业能力培养。普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完善制度建设、优化教学方法和促进师生互动等多方面措施,改善当前学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高校学风建设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普通本科院校应重视和加强学风建设,以便更好地履行人才培养的使命,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人才。相较而言,职业本科院校的学风建设工作既不能照搬专科职业院校学风建设模式,也不能模仿普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模式。职业本科院校需要立足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构建

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律的学风建设体系。要以本科教育为契机,通过优化路径来强调办学定位的明确性、学风体系的特色性、实践教学的规范性和质量监控的持续性^[4]。总之,良好的学风有助于职业本科院校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加强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对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专业大类的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的差异化策略,以及数字化背景下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的创新模式。

参考文献

- [1] 李红梅.职业本科院校学风建设现状调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5):45-52.
- [2] 方正.应用型本科院校学风问题分析及解决路径[J].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68-71.
- [3] 时正杰.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加强学风建设的思考[J].淮阴工学

院学报,2023(12):90-94.

- [4] 邓颜蕙.“五育并举”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学风建设探究[J].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24(11):69-73.

责任编辑 董颖

(上接第34页)

理效能,而且对于确保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至关重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紧密结合各地区的独特优势和实际需求,制定出个性化的发展路径。通过推动数字资源向农村地区延伸,确保广大农民能

够分享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断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加大农村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并推动农村数字产业的创新与发展,从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21-10-20(1).
- [2] 张立.百年变局:中国的数字化使命[J].数字经,2021(Z1):7.
- [3] 何玉长,刘泉林.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价值本质与价值构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57-66.
- [4] 陈一明.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2021(12):81-91.

- [5] 李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政策创新[J].经济体制改革,2022(3):77-83.
- [6] 李季刚,马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关系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1(10):138-141.
- [7] 张蕴萍,栾菁.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理论机制、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J].改革,2022(5):79-89.

责任编辑 董颖

纸数智融： AI 赋能大学英语教材设计研发与应用 路径初探

韦 玮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100029)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大学英语教材已难以满足数字时代学习者个性化、交互化的学习需求。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与对当前教学实践的深入分析,结合大学英语教材内容与形态的现状,探讨AI赋能大学英语教材设计研发与应用路径。大学英语教材内容重构应遵循“价值引领、守正创新、数智赋能”三大原则,实现从静态知识呈现到动态知识生态构建、从线性封闭结构到模块化网状结构、从单向学习到人机协同交互的三重转变,从而实现AI赋能大学英语教材的内容创新与教学生态重构。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材;人工智能;AI;教学生态;教材编写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17(2025)08-0067-06

一、引言

教材作为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依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置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位置,体现了党中央对教材工作的战略定位。《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3—2035年)》进一步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和“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明确以“数字基座+智能中枢+制度创新”三维架构为核心,推动教育现代化进入以深度智能化为特征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发展,大语言模型已经颠覆了传统知识获取方式,向以静态知识呈现和线性学习序列为

特征的传统教材提出严峻挑战。同时, AI技术为教材内容的生成、组织和更新带来革命性变革可能,为构建个性化、交互化的智能教材提供了技术支持。文秋芳指出,“国家与社会要求”是外语教材编写的首要原则,教材编写团队必须将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内化于教材建设全过程^[1]。在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国家战略背景下, AI技术的教育应用已成为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新方向。吕欧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数字技术赋能大学英语教学能够实现教学内容精细化、教学手段智能化和教学评价精准化的三重提升^[2]。常畅和杨鲁新分析指出, AI时代的教材研究正呈现内容系统化、视角立体化和研究范式智能化的发展趋势^[3]。

收稿日期: 2025-02-12

作者简介: 韦玮(1983—),女,河南新乡人,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级编辑,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教材开发。

然而，通过对国内主流大学英语教材的系统分析发现，教材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内容形态以静态文本为主，数字资源仅作为辅助性补充；组织结构呈现线性封闭特征，教—学—评闭环断裂，不同单元间缺乏有机关联；价值引领不足，中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融入有待加强，且专业相关度低，无法满足“四新”人才培养需求；更新周期长，难以及时响应学习者需求和学科前沿变化^[4]。这些问题共同指向教材设计与教学实践之间的结构性断裂，亟需通过系统性变革予以解决。

因此，本文以AI时代大学英语教材内容重构及其生态影响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数智时代大学英语教材的发展现状及其遭遇的挑战，以及AI赋能大学英语教材形态创新与研发范式构建，从而探索顺应AI时代特征、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大学英语教材研发路径，构建具有理论创新性和实践适用性的教材设计新范式，助力新时代大学英语教育的创新发展。

二、数智时代下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现状及挑战

当前大学英语教材的发展呈现出思政融合、数字赋能、专业适配、应用导向的鲜明特征。首先，课程思政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的重要导向。新出版及新修订的教材通过增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建设等专题模块，将语言学习与价值观教育相结合，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家国情怀。其次，内容结构与教学理念不断优化，显著提升了教材的实用性。任务型、情境化学习活动增多，同时，传统机械性语法训练的比重降低，转而强调听说读写的综合技能培养，契合“语境化教学”的现代外语教育理念。此外，选文时代性增强，新增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等社会热点话题，确保教材内容的时代性。再次，数字化成为教材标配，智能化技术成为

教材发展的关键驱动。新一代教材普遍配备数字化学习资源及平台，并在AI技术融合方面不断探索，不仅提升了教学互动性，也为自主学习提供了更灵活的支持。最后，为适应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需求，针对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领域的专业英语教材层出不穷。此类教材紧密结合学科特点，如聚焦智慧农业、医学英语交际等场景，旨在培养既精通专业领域知识又具备国际交流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然而，在蓬勃发展的表象下，大学英语教材建设也面临着若干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与困境。

首先，虽然大部分大学英语教材已将立德树人作为核心理念，但其内容价值导向不够突出。当前大学英语教材的价值导向与内容设计亟需重构，如：在立足本国、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编排上略显不足；对中华文化的呈现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层面，对当代中国发展成就和价值观念的展示不足^[5]。此外，实证研究也表明，当前大学英语教材内容对新工科建设中需要的科技伦理、创新思维和全球治理等主题覆盖不足，学科交叉内容以及中国科技发展成就的呈现比例过低，难以支撑新时代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

其次，大部分大学英语教材内容组织仍呈现明显的线性封闭结构特征，基于传统结构主义语言教学理论的“阅读→词汇→语法→听力→口语→写作”的固定模式或其变体形式的线性组织方式虽有利于系统化呈现语言学习内容，但在实际应用中却限制了教学的灵活性和个性化，也较少考虑实际教学流程的动态特性和学习效果的持续评估，难以适应不同学习情境和多样化学习需求，尤其无法充分支持以综合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新时代教学理念。

再次，由于技术发展的局限和教学实际相对于技术发展的滞后，大多数主流大学英语教材呈现模式仍以静态文本为主导，多以纸质形式的课文、图片和练习为基本单元，辅以有限的多媒体配套资源，这种呈现模式实质上仍停留在“纸质

教材+数字资源”的简单叠加阶段。尽管部分教材已依托在线平台将教学活动从课堂扩展到数字生态环境,但数字技术应用模式多为纸质教材的多媒体化,多媒体资源仅能单向补充和扩展纸质教材,未能实现与教材内容的深度融合和互动协同,亦未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大学英语教材的赋能效应。

最后,大学英语教材普遍存在内容更新周期长与时效性差的问题。大学英语教材一般为3~5年才完成一次大规模修订,而同期英语语言使用环境和学习者需求已发生显著变化。相关研究表明,超过七成学生认为教材内容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热点和科技发展,八成以上教师需要自行寻找或制作补充材料^[6]。这种内容更新的滞后性与数字时代信息快速迭代的特征形成鲜明对比,它制约了教材内容的时代性和适用性,与数字时代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和学习需求形成了明显脱节。

从技术变革与教育变革的互动视角分析,AI时代大学英语教材面临以下四个核心挑战:第一, AI技术已经深刻改变了学生获取语言知识和进行语言学习的方式与路径,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团队需要重新思考大学英语教材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的定位与价值,使大学英语教材完成从传统的“知识提供者”转向“学习引导者”和“能力培养平台”的角色转换。根据笔者2024年开展的大规模问卷调查($n=1704$,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结果,在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群体中,已有78.4%的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使用AI工具,其中23.5%为高频(每天3~10次)使用者。AI应用场景已从单一的翻译辅助扩展至写作辅助(83.2%)、词汇学习(76.5%)、口语练习(65.3%)和阅读理解(58.7%)等多个维度。第二,规模化教学模式与个性化学习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的“一刀切”式教材内容组织模式已难以满足数字原住民学习者的多元化学习需求。当前我国大学英语课堂规模偏大,教师难以满足所有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如对学习内容的差异化需求(希望能够根据自己

的专业背景选择相关内容)、学习难度的自适应需求(希望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学习适合的内容)和学习方式的多样化需求(希望能够自主选择学习路径和方法)^[6]。第三,教—学—评闭环体系的断裂制约教学效能。评价体系断裂严重制约了“以评促学、以评促教”教学理念的实现,无法形成数据驱动的持续改进机制。内容分析研究表明,当前大学英语教材中,教学内容占比92.7%,而评价内容仅占7.3%^[4]。在现有评价内容中,88.5%为终结性评价工具,形成性评价工具仅占11.5%^[2]。第四,当前教育领域AI应用标准体系仍处于初步构建阶段,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内容把关,确保教材的政治方向性、学术规范性和教育适用性的合规合理,已成为教育出版领域的紧迫课题。此外,如何解决AI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学习数据的隐私保护、AI系统的算法偏见和自动生成内容的价值取向等问题尚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导。

基于上述现状分析和挑战识别不难发现,传统大学英语教材亟需进行内容重构和形态创新,需要在教学理念、内容组织、功能定位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变革,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特征的教材新范式。

三、AI赋能大学英语教材形态创新与研发范式构建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明确提出,新时代高等教育应“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并强调要“推动新工科建设”和“促进专业交叉融合”,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吴岩从“四新”建设统筹视角指出,跨学科融合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应坚持“四个服务”,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科专业建设、服务学生全面发展^[7]。基于此,本研究尝试构建“价值引领、守正创新、数智赋能”三维一体的指导原则体系,分别从价值导向、方法路径和技术支撑三个维度

为教材重构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一）价值引领：价值塑造与技能培养并重

价值引领原则体现了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与育人导向，它是AI时代教材建设的首要原则。在AI技术深度融入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教材内容的价值引领需要从传统的“显性呈现”转向“智能融入”。AI赋能的教材可以基于学习者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采用个性化、情境化的方式精准融入，实现价值观的有效内化。同时，教材内容应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技术伦理观念，培养其在AI时代的信息辨别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孙有中的课程思政研究表明，通过典型案例和情境创设，可以实现知识教学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8]，这一方法在AI驱动教材中同样适用。

（二）守正创新：语言规律与时代需求协调

守正创新原则体现了教材建设的方法论导向。这一原则在AI时代尤为重要，既要防止盲目技术崇拜，又要避免传统路径依赖，要求教材设计既要遵循外语学科的特点与规律，又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4]。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视角来看，语言学习遵循一定的认知规律和习得顺序，而从教育创新理论出发，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需要打破传统教学范式，构建新型学习环境和教学模式。AI赋能教材可通过智能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规律，创造性地突破传统教材的时空限制和呈现方式，为语言学习者提供更符合认知规律且更具时代特征的学习体验。

（三）数智赋能：技术驱动与人文关怀融合

数智赋能原则体现了教材建设的技术支撑与实现路径，它是AI时代教材内容重构的核心原则。吕欧将数字技术赋能定义为“数字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教育创新和课堂教学改革赋能加力的过程”^[2]。AI技术在教材重构中的作用不仅是工具性的，更具有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数智赋能强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教育目标和人的发展需求。文秋芳提出“以技术为辅助，以人为中心”的

原则，要求在技术应用中保持人文关怀和教育本位^[9]。这一观点与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主流立场一致，即技术应作为教育改进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四）内容重构的三维框架与实现路径

基于上述理论原则，本研究尝试从内容形态、组织结构和使用方式三个维度对大学英语教材进行内容重构，描述AI赋能大学英语教材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内容生态化、知识图谱化、学习个性化、评价多元化”四个维度的实施框架设计转型路径。

在内容形态上，实现从静态知识呈现到动态知识生态构建，包括但不限于：（1）实现增强型多模态融合与深度交互，能够根据学习情境自动生成适配性内容。（2）实现内容的动态演进，可支持更灵活的内容更新策略，自动识别和筛选与课程主题相关话题，生成标准化的补充学习资源，实现内容更新的精准性与教育性的统一。（3）提供基于学习分析的个性化推荐服务，建立学习行为分析引擎，提供不仅包括内容选择，还包括呈现方式、难度梯度和练习形式的个性化适配，实现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的教育范式转变。（4）支持双向互动和反馈闭环，构建完整的学习生态系统。AI技术通过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实现内容与学习者的深度互动，这种互动不仅限于学生与系统之间的单通道交流，还可以汇聚多个学习者的反馈数据，形成集体智慧，构建自我进化的知识生态系统。

内容生态化的构建路径重点在于建立核心内容与扩展内容的层级结构，并实现内容的动态生成与更新机制，为教材在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建立平衡。首先，核心内容层作为教材的稳定部分，需要通过科学规划和设计确保系统性和权威性。教材建设团队应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构建能力导向的核心知识地图，明确每个单元需要覆盖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等维度，形成系统的内容框架^[10]。在微观设计层

面,将核心内容拆分为微单元,每个微单元聚焦特定的语言点或技能点,便于灵活组合和精准调用。在价值引领方面,应注重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通过典型案例和情境设计,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价值引领与能力培养的统一。其次,扩展内容层则围绕核心内容构建,教材建设团队可在配套平台上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相关的可更新的动态资源库,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核心内容层与扩展内容层通过二维码等形式链接,并通过设计清晰的内容导航系统和可视化学习路径,实现核心内容层与扩展内容层的有机连接。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AI技术为内容的动态生成与更新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持。教材建设团队可采用专业领域模型微调策略,使用大学英语教材语料库对通用大语言模型进行定向训练,以提高生成内容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开发标准化的内容模板,为不同类型的内容设计专用生成模板,规范生成流程,确保质量一致性。同时,应严格把控内容质量管理,建立多层级人机结合审核机制,确保教材内容的准确性和教育价值。此外,还应借助AI技术建立教材更新机制,保持教材的生命活力和知识时效性,为教材内容的长期演进提供依据。

在组织结构上,AI赋能大学英语教材内容组织结构应突破传统线性封闭模式的局限,向模块化网状结构转变。首先,打破线性结构,构建微单元,即由特定语言点或能力目标构成的小型、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学习单元,并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和学习需求进行动态组合。其次,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知识图谱技术自动识别和建立内容之间的语义关联、概念层级和能力依赖关系,形成立体化知识网络,使教材内容形成相互支撑、有机连接的知识体系。最后,与外部资源进行智能连接和整合,建立智能资源筛选系统,从开放网络环境中动态筛选、评估并整合高质量学习资源,形成开放的学习生态系统。

实现教材组织重构的重要路径是通过建立知

识图谱打造多维关联的内容网络,支持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和知识探索。知识图谱的构建应首先建立理论依据框架,结合技术自动化与专家审核,通过设计核心本体模型,明确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基本概念类型及其关系类型,而后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对教材内容进行智能分析,提取关键概念和关系,构建初步的知识图谱,并由大学英语教学专家对自动抽取的知识点和关系进行验证和完善,形成高质量的知识网络。知识图谱的建立可实现教材内容的多维索引与灵活检索,显著提高教材内容的可访问性和使用灵活性,使教材摆脱线性结构的束缚。知识图谱化的教材内容亦可支持多种创新应用场景,系统生成的个性化学习路径可实现目标导向的自主学习。利用知识图谱技术还可实现跨教材内容的智能映射,打通不同教材、不同层级之间的内容边界,如单元内容可被拆分为概念层(如基本概念)、语言层(如相关词汇、句型、语法)、技能层(如描述问题、分析数据、提出解决方案等能力)和文化层(如不同国家理念与实践)等,并在其间建立多维关联,形成个性化的学习和教学路径。

在使用方式上,可借助AI技术实现从单向学习到人机协同交互,(1)建立智能学习伙伴生态,通过深度定制与教材内容集成,整合专业化的智能学习伙伴,与教材内容深度融合,从而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2)设计AI增强的情境学习活动,创造沉浸式学习体验,为学习者提供近似真实语境的语言使用机会,从而显著提高语言学习的真实性和有效性。(3)支持更复杂的人机协作学习模式,结合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和AI的信息处理能力,成为深度思考和创新的平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4)整合智能评估系统,全面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表现和进展,生成多维度的学习报告,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使教学评价同时具有诊断性功能与发展性功能。

学习个性化是AI驱动教材重构的服务路径,

评价多元化则是AI驱动教材重构的闭环路径。首先,在AI赋能教材中建立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框架,覆盖学生的基本信息(如专业、年级)和学习行为(如学习时间、内容选择、错误类型)和学习表现(如测试成绩、完成质量)数据,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发展路径和需求,实现精准教学服务。其次,基于学习者画像,个性化推荐系统可通过多种算法为学生提供最适合的学习内容,并以多种形式呈现,以满足不同学习场景的需求。再次,基于学习表现和反馈,AI系统可采用基于知识图谱的路径规划方法,根据知识点之间的依赖关系和关联强度,为学生规划最优的学习序列,确保学习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实现学习过程的真正个性化。此外,在AI技术辅助下,教材评价系统能够依据层次化的反馈结构生成详细的学习分析报告,记录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轨迹,全面衡量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情况,提供个人历史数据比较和群体参照比较功能,为学习者提供全面、客观的学习状况评估。最后,基于学习分析结果,AI赋能教材可根据教学系统或平台反馈动态更新内容,促进学习问题的及时解决和学生能力的持续提升,真正落实“以评促学”的教育理念。

四、结论与建议

从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AI技术对

教材的影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新,其核心特征在于它使教材从静态知识的载体转变为动态知识生态的构建者,从单向内容传递工具转变为交互能力培养平台。这种本质性变革代表了教材发展的新范式,为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本研究从内容重构的视角,系统探讨了AI赋能大学英语教材的理论框架、实现路径与应用价值,构建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教材创新体系。

面向未来,大学英语教材的创新发展需要政策引导、理论支撑、技术驱动和实践检验的多方协同。在管理层面,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AI时代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明确内容标准、技术规范 and 评价体系,并建立AI教材质量标准体系,同时加强AI教育伦理和数据安全方面的规范建设,为教材内容重构提供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持。教材研发和出版单位应建立跨学科团队,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开发模式,构建协同创新的教材开发生态系统。还应建立多层次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重点培养教师的AI工具应用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智能教学设计能力和技术伦理意识,提升其在AI环境下的教学胜任力,并通过虚拟教研室等平台手段,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和实践社区,促进教师间的经验分享和协作,形成持续发展的支持环境。

参考文献

- [1] 文秋芳.构建大学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J].外国语,2023(6), 2-11.
- [2] 吕欧.数字技术赋能大学英语教学的路径探究[J].辽宁开放大学学报,2024(4),100-103.
- [3] 常畅,杨鲁新.我国英语教材研究60年述评: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外语界,2023(1),76-83.
- [4] 陈彦婕,戴朝晖.思政引领、数智赋能、守正创新:新形态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研究[J].外语教材研究,2024(4),104-119.
- [5] 张虹,于睿.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研究[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2(3),42-48.
- [6] 杨莉芳.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内涵、开发原则与核心特征[J].外语界,2023(1),57-64.
- [7] 吴岩:深化“四新”建设 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EB/OL].(2022-01-20)[2025-02-11].https://news.eol.cn/yaowen/202201/t20220120_2204466.shtml.
- [8] 孙有中.课程思政视角下的高校外语教材设计[J].外语电化教学, 2020(6),55-57.
- [9] 文秋芳.新中国外语教学理论70年发展历程[J].中国外语,2019(5),14-22.
- [10]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 谢建文

修武县：修兵练武处 七贤隐居地

河南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课题组

殷商时期，修武县称作宁邑。周武王伐纣，路过这里时大雨下了三天三夜，一片汪洋，泥泞不堪，行军艰难，于是就在此处驻扎下来修兵练武，并改宁邑为修武。自此，修武之名历代传承，至今已有3000余年。修武县以历史事件而得名，2006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授予“千年古县”称号。

修武县地处太行山南麓向华北平原过渡地带，地势由北向南渐低，地形从北部山区向南部平原呈阶梯式下降，层次分明。境内最高峰位于云台山茱萸峰，海拔1308米；最低点位于修武县城大沙河两岸，海拔80米。

修武在唐、虞、夏三代，属于冀州区域。殷商时期，这里开始筑城，为畿内地，叫作宁邑。周武王元年(前1046年)，改称修武，同时因是三监之一蔡叔度的驻地，又称为雍国。周桓王八年(前712年)，修武被封给郑国。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修武连同温、原、攢茅等地方的田地，被赏赐给晋文公改名为南阳，属于晋国。战国时，属于魏国，仍称作南阳。周赧王四十二年(前273年)，为求和割南阳给秦国。秦统一之后，改南阳为修武县，由三川郡管辖。西汉高帝二年(前205年)，修武分为修武、山阳两个县，属于河内郡管辖。三国黄初三年(222年)，改属冀州朝歌郡。晋泰始二年(266年)，朝歌郡改汲郡，属于汲郡。前燕时改属中州。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分置南修武县、北修武县。东魏天平年间(534—537年)，设西修武县。北齐天保七

年(556年)，修武县治所移至西修武城址，南修武、北修武及山阳县并入，统一为修武县。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析置修武县；大业元年(605年)，废武陟县并入修武县，属于河内郡。唐武德二年(619年)，在洹鹿城(今李固)成立陟州，辖修武县；四年(621年)，废陟州，属于殷州，析修武县置武陟县。唐贞观元年(627年)，改属怀州管辖。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废修武县改为镇，并入武陟县；元祐元年(1086年)，废修武镇，恢复修武县，属于河北西路怀州管辖。金天会六年(1128年)，属于河东南路下设的怀州沁南军管辖；兴定四年(1220年)，修武县析置山阳县，属于辉州管辖。元延祐二年(1315年)，属于怀州庆路管辖；至元三年(1337年)，废山阳县改为镇，并入辉州。明代，属于河南布政使司怀庆府。清代因袭。1912年1月，属于河南省河北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属于新乡专区，后属于焦作市。

修武县文化遗存丰富，文物古迹众多。黄帝时期主管制陶业的陶正宁封子即安葬于北山。宋代，当阳峪一带瓷业兴盛，所产绞胎瓷为天下一绝。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曾在这里采药炼丹，至今药王洞犹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当阳峪瓷窑遗址、胜果寺和胜果寺塔、百家岩寺塔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汉献帝禅陵、李固龙山文化遗址、洹鹿城遗址、海蟾宫大殿4处，其他文物保护单位150多处。唐代文学家韩愈幼年时即生活在这里，而“竹林七贤”所形成的七贤文化也

给这里增添了无穷的文化魅力。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9岁的刘协被扶上了皇位，是为汉献帝。董卓被杀后，日益强盛的曹操将刘协带到许昌，开启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争霸天下的大业。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19年)，曹操死后，曹丕承袭魏王。不久，献帝禅位，曹丕称帝，是为魏文帝。曹丕奉刘协为山阳公，将他迁至山阳浊鹿城(今修武县李固村)。刘协当了31年傀儡皇帝，被废之后在修武生活了14年，以自己精湛的医术，为当地老百姓治病。死后葬在此地，至今汉献帝禅陵犹在。

西晋时的荀晞，修武人。在做兖州太守时，执法十分严厉。他的姨母找到他，希望荀晞能为她儿子谋个差使。荀晞不答应，告诉姨母，主要是害怕如果表弟坏了规矩，他将按律治罪，这并非不是帮表弟，反而是害了表弟。但在姨母的一再坚持下，荀晞还是让表弟在兖州当了差。果不出荀晞所料，表弟还是犯了事，按律当斩。荀晞不顾姨母苦苦哀求，坚持把表弟杀了。随后，荀晞在平定汲桑之乱中立下大功，被封为东平侯。这时候，他发现都城洛阳朝政混乱，他便到处搜罗奇珍异宝，送往洛阳结交权贵。后来，他登上了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的高位，早把清廉扔到一边，变得骄奢恣纵，家中仆妇近千人，侍妾数十人。在这期间，他对别人的奉劝心怀不满，甚至还杀了劝他的人。腐化堕落致使人心离散，荀晞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荀晞始正终乱，晚节不保，发人深思。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有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他们在修武百家岩曾隐居多年，孕育形成了“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七贤文化，至今百家岩还有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等大量遗迹。他们为了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冲破世俗的纷扰，选择了反叛和逃离当时的政治

环境，隐居山林，吟诗弹琴，纵酒歌啸，以超乎众人的行为与时代对抗，追求个性和精神自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群体，成为魏晋时期士人文化精神风貌的代表。“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思想倾向却又有差异。有的主张老庄之学，如嵇康、阮籍、刘伶、阮咸；有的把老庄与儒家相结合，如山涛、王戎；还有的倡导名教与自然合一。在文学创作方面“竹林七贤”各有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名篇佳作至今流传。如，嵇康的《琴赋》《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达庄论》《为郑冲劝晋王笺》，等等。阮咸没有留下文学作品，他精通音律，制作的乐器“阮咸”传用至今。

韩愈，字退之，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一说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中唐时期，韩愈做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高级官员，任上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在文学方面。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三

秦汉时期，修武为上县，人口在万户以上。后魏时，县境内设山阳、广宁二郡，不久就废弃了，没有传下来官属。唐武德二年，设刺史，又设总管府，管辖怀西、济北、义、陟四州，治所在今修武县东北的浊鹿城。唐武德四年，陟州省减并入怀州，又在获嘉县设殷州管辖修武县。唐代，州县等级一般按其所在地位的轻重、辖境大小和经济发展程度划分，等级之差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修武为紧县，县令为从六品上，县丞为从八品下，主簿为正九品下，县尉为正九品上。宋代修武为上县，此后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历代因袭。元、明时，又设教谕、训导，清因之。自修武设置县令以来，任职

者大多能够循分供职，史上良吏名宦不乏其人，杨楠、刘建吉、华廷献等人，都多有政声。但也有一些人在其他方面表现特别，比如石崇，20多岁时就做修武县令，后入朝为郎，官运亨通，史上因修金谷园与人斗富名噪一时。司马光评价他说：“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

杨楠，字念斋，又字志田，贡生出身，明万历三十八年任修武知县。上任之时，恰逢修武县遭遇大旱不雨，快要到手的麦子全都干枯而死，可是官府催征赋役仍急于星火，并未见丝毫减少。连年灾荒，民生凋敝，百姓们实在活不下去了，打算把大门一锁逃离家乡，外出谋生。杨楠面见长官，恳请免除当地赋役，并请求尽快设法赈济百姓。长官不答应，杨楠情愿自己解职罢官，长时间跪在地上不起。长官见他为民请命决心这么大，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后来还是拿出切实措施帮修武渡过了难关。又过了一年，修武突然遭受冰雹袭击，满地庄稼如刀割一般，全被折断茎秆，狼藉不堪，百姓欲哭无泪。真是祸不单行，又一年，修武境内的沁河在桃村口决堤，洪水泛滥，冲毁了村庄，冲没了田畴，到处汪洋一片，草屋顶在洪水中翻滚，如浮舟一般入城而来。三四年间，修武县灾情如此频繁严重，百姓的生命悬于一丝，作为知县的杨楠痛心疾首。为了使修武百姓不至于因灾毙命，他削减府衙棚殿车辇等开支，却又尽力不失朝廷法典。与此同时，还想方设法让百姓们少纳赋役。他的这种做法显然于法不符，因而被扣罚俸禄。但是，杨楠却无怨无悔。杨楠在修武任知县5年，清廉自守，未尝有过鲜衣美食。他体贴百姓，庇护修武，常存恻隐之念，仁心为质，在救灾荒、恤孤贫、劝稼穡、兴学校等多方面都有政绩。后来，杨楠调到霍州任职，修武百姓为他建生祠，并立《去思碑》以纪念他在修武的功绩。

刘建吉，字慎修，贵州南笼人，贡生出身，乾隆年间莅任修武知县。他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大雨之后，太行山的水势凶猛，往往奔流而下，

一霎间，洪水突涨，弥望汪洋。特别是县西南的田畴多被淹没。为了解除水患，刘建吉决定动员民众修筑河道，于是就从西南寨里村至东北平政桥修建了一条长45里的河道，名叫消河，直达新河，不仅解决了水害问题，还把县西南变成了肥沃良田。他又修建东关石桥以方便行人等，惠民工程多多。百姓立祠以祀。

四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华廷献就属于敢于为民请命的那种人。他是江南无锡人，举人出身，明天启十四年任修武知县。当时，修武饥荒遍地，竟到了人相食的地步。然而，上级官府却全然不顾实际情况，催征漕粮急迫甚于往常。华廷献先后4次痛切为民请命，力陈灾荒伤农情况，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身家性命。这4次陈请分别是《灾邑陈情启》《再请缓漕启》《续报灾伤启》《力疾控灾书》。

在《灾邑陈情启》一文中，华廷献写道：中州灾荒没有比修武更严重的了，而修武的灾荒也没有比今天更为严重的了，这是全省各地人们所耳闻目睹的情况。我到这里任职，不得不为地方请命呼吁于仁人志士和长者之前。修武十室九空，大都是百姓死亡或逃亡造成的。而死亡或逃亡的原因有三：饥饿必然死亡，相互残杀相互为贼又死，疫病染身又要死！困顿不堪的人必然要逃，躲避粮役的人要逃，触犯法规的也要逃啊！修武有多少百姓，还能有比这三逃三死更悲惨的吗？先贤曾对“靡有孑遗”这句古诗有所怀疑，不料今天却应验了。到任3个月来，我竭尽犬马之力勤勉地任受驱驰，可是急于公事有心，却回天乏术啊！况且天时、人事不受左右且极为困难：春天只下了一点小雨，可独有修武连这点微雨也没下；入夏蝗灾来临，独有修武最为严重，这是老天以极灾极荒处罚修武呀！仓库没有谷物，漕运没有粒米，驿站没有马匹，这是修武人极灾

极荒的真实处境。然而，上级政令纷繁如故，催征文书要求如故，这是国家没有把修武当作修武看待，而是以过去的修武看今日的修武。我官小职卑怎么能承担得起这样的事情呢？当前的形势“不可为”有三方面原因：其一，如果硬顶着办漕米，供应马夫，必然从土地上取得收益，可是虽然下点雨，已经死了的人却不能复生，逃走的人也不能回来，连地亩也没有人认领，又如何可为无米之炊？其二，如果要加强守城防御，必须有兵源才行，而现在剩下的少数老弱之人饭都吃不饱，如果招募他们，显然无济于事，又怎能作徒手之搏呢？其三，如果要清理积案，招抚流离失所的百姓，必须有办事的衙役，可是这些衙役已经无家无室，昨日来，今日去，个个形如枯槁，朝三暮四，怎么能够做到“空中摄影、纸上吹尘”？以上列举的种种，字字真情，句句泪血，如一言虚假，神人共鉴。当前，法令一天严于一天，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唯恐一身功名事小，地方关系事大，真诚希望各位大人鼎力相助，给予特殊政策早作处置。或者选用贤能，开悟蒙昧，也许在这块地方的人们能够有一个良好持久的解决方案，如此才真是一方幸事，也是卑职的幸事。

在《再请缓漕启》中，他对朝廷提前截解漕粮而修武早已民不堪命，实在难以措置的情况进行陈述，请求上级在漕粮一事上，修武与邻县能够一视同仁，宽缓有度。文中说：“一郡六邑惟修武极荒，且接壤河内，今兹敲骨伐髓之穷民……见之裂肤，闻之酸鼻……”

《续报灾伤启》则更为感伤，一开头就说因为修武所处的环境而造成上面很难得知这里的疾

苦。过去总以为合门饿死的是特例，殊不知现在不仅有全家饿死的，而且还有全村全镇饿死的情况；过去以为私自吃人肉是特例，而今天竟有公然拉着道路上行动不便的人当作口粮的；过去以把小孩子抛弃在路旁为怪事，今天的父母却有人说“我生的，我就自己把他吃掉算了”。华廷献写到这里时，他说“肠寸寸断，生不如速朽，忍向民间问粒粟？”但是，漕务紧急，决不敢以身试法，在“残黎皮骨已竭”的情况下，唯有直言上书，恳请有司“破格蠲缓，收拾人心，保全残邑”。在兵戈满地，又遭受连年旱灾蝗灾之后，修武仅存十分之一的人口，急需蠲除各种赋役漕务，在天天盼望能够得到赈济的情况下，华廷献的《力疾控灾书》才“以万不得已之情哀鸣于君父之前”。

作为一县之长，面对如此凶险的惨状，在毫无应对之策的情况下，连续多次陈请上级救助，也许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从字里行间，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华廷献的一片体察民情的赤诚，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实事求是勇于反映问题的朴实作风。

五

新时期以来，修武县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发挥较好的交通区位优势，经济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修武县是个只有20多万人的小县，但是，这里环境优美，特别是云台山以雄奇险秀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修武县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课题组长：王付林，成员：赵晓红 罗文）

参考书目

[1] 修武县志(清道光校注),修武县档案史志局.

[2] 修武县志(1985—2000),中州古籍出版社.

[3] 中国官制史,柏华著,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公司万卷出版公司.

[4] 中国县域治理史,吴城国主编,长江出版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河南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总主编:黄树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华 夏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编委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优的高素质专业化机构编制干部队伍，去年9月，河南省委编办以“讲政治、强本领、勇担当、争一流”为主题，在全省机构编制系统开展征文活动。经对125篇征文作品进行评审，共评出特等奖3篇，一等奖7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20篇，优秀奖80篇，评出优秀组织奖3个。自本期起，本刊将陆续刊载部分获奖作品。

理想绽放 点亮五彩斑斓的光

麻伟娜

机构编制部门始终致力于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体制机制的牢固根基。在这蓬勃兴盛的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者们正满怀热忱、斗志昂扬，奋楫笃行，勇毅迈进。不管是服务中心工作、牵头改革事宜、投身一线驻村，还是开展党建工作、常规业务，他们深知自己肩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责任，坚定地秉持讲政治、守规矩、敢担当、争一流的原则，心怀推动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远大理想，用担当、拼搏、信仰、执着与奉献点亮璀璨绚烂的五彩光辉，竭力照亮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的辉煌征程。

一条绿色的南水北调城区景观带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焦作城区形成了壮美的水城融合景观。一渠清水穿城而过，川流不息。一泓碧波与青青堤岸为城市展开了生态蝶变的绿色画卷……

那一年，在南水北调征迁的战场上，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她每天起早贪黑、走街串户，讲政策、说道理，用韧劲、钻劲、巧劲，更用真情感

染、感动着征迁户，让他们发自内心理解和支持征迁工作，实现了和谐征迁、高效征迁。回到机构编制工作岗位后，她在监督监察工作中也竭尽全力，挺膺担当。为了做好违规违纪预防教育，她翻阅了各类法规条例和政策文件，做了厚厚的几本笔记。为了处理好投诉举报问题，她对前来咨询政策的每个人总不厌其烦，耐心讲解，尽量保证每个投诉举报都有结果。

勇敢担当为理想之梦插上翅膀，振翅高飞，拥抱太阳。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执着、顽强和耐性，勇挑大梁、敢担大任。军人出身的她常说“初心使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这铿锵的话语一直贯穿在她雷厉风行的工作状态中。

一盏蓝色的救护车灯

还记得吗？单位楼下那迅速驶离的救护车，车灯闪烁，笛声急促。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眼睛也都湿润了……

那一年，为了完成机构改革任务，他夜以继

日地忙碌着，连续几天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直到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在机构编制工作的岗位上，他已经奋斗了十余年，打赢了一个接一个的改革硬仗。党政机构改革、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乡镇街道改革，以及文化、卫生、交通等一系列的行业体制改革……一轮又一轮，他都迎难而上，冲锋在前。无数个日日夜夜，他都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文件资料之中，为每一项改革任务的落地悉心筹谋。在复杂多变的改革形势之下，他总能凭借自身丰厚的经验、敏锐至极的洞察力和果敢坚决的判断力，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在领导和同事的心中，他是坚守机构编制工作岗位的“改革先锋”，是机构编制政策的“知识宝库”，是勇扛重责、奋进拼搏的“攻坚勇士”。

顽强拼搏是理想之旅奔跑的引擎，鼓足干劲，行将致远。他就是这样一位不懈拼搏的勇士，在艰巨的改革事业和繁重的改革任务面前，尽己所能，倾力而为，延续着“热血沸腾”的激情，保持着“奋斗不息”的拼劲。

一件粉色的病号服

记得那天，当我轻轻地推开病房的门时，看到刚做完手术的她，穿着粉色的病号服，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十分憔悴……

那一年，她被抽调参与全市主题教育工作。这项工作政治性强、任务重、标准高，要求每位工作人员都要全身心投入，不能有丝毫懈怠。她负责的党建工作同样责任重大，她必须同时兼顾做好两项工作。在一个寒冷的雪夜，城市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办公室里只剩她敲击键盘和翻动文件的声音。当最后一项工作处理完毕，她长舒一口气，靠在椅背上，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回家的路上，她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脚下的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诉说着孤独和坚持，也见证了她坚定的信念。那段时间，她经常加班加点连轴转，时间长了，身体吃不消了。可是为

了不影响工作，她坚持轻伤从不下火线，就连做手术也选择在周末。她就像一位无畏的战士，即便受伤也绝不退缩。手术三天后，她又迅速回到了工作岗位，仍旧充满活力，积极向上。

坚定信仰是理想之船前进的灯塔，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让人放心”便是她的人生信条。这四个字看似简单，想要做到可真的不容易。工作中的她时刻满怀热情、斗志昂扬。她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全力以赴，是单位里当之无愧的“卷王”。她用实际行动彰显信仰之力，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一墙泛黄的档案

打开他身后的那排档案柜，满满的一墙档案像是被他训练过一样，排列整齐，规范有序……

那一年，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让全市事业单位实现了改头换面、脱胎换骨，涉及的单位之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也随之大量增加。在我们看来，也许这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任务单一，流程固定。但在他的眼里却不这样，他认为登记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看似简单，实则重任在肩。他坚持对各单位手把手指导，对申报材料反复审核，简环节、优流程、压时限，把工作做扎实，把档案做规范。有人劝他不要那么较真，差不多就行了。可他却说，只有坚持把小事做精细，才能将简单变精彩。

不懈的执着为理想之路铺就基石，踮起脚尖，梦就不远。工作中的他，目光坚定，执着非常，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磨，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控，每一项数据都仔细核对，如同一位严谨的工匠遵循标准，确保工作的准确高效。他以恒心为刃，斩断前路荆棘，用执着作笔，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一枚红色的党徽

他在驻村的第一天，就给自己立下了“军令

状”，要做老百姓的主心骨。从那之后，村民们每次见到他，看到他胸前闪亮的党徽就感到格外亲切……

那一年，一场百年难遇的水灾肆虐，令他所帮扶的修武县孔村深陷危难之境。洪水漫过大堤，村民受困，家园危在旦夕。遭遇险情之际，他没有顾及自身安危，毅然深入救援第一线。他无畏地蹚过湍急的流水，奋力解救被困群众。待险情解除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全身心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当中。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带领群众完成灾后重建，他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在那段日子里，因过度劳累与奔波，他愈发消瘦，头上的白发也增添了许多。但他深知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是驻村第一书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无私奉献是培育

理想之果的肥沃土壤，昨日埋下种子，如今已果满枝头。他用实践和担当、无私与奉献，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风好正扬帆，敢向潮头立。回首望，机构编制工作者们在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步伐坚定，步履铿锵。他们心怀责任与使命，以无比的热情和毅力，为了共同的理想奋勇前行。他们把担当凝为蓬勃的绿，把拼搏汇成深沉的蓝，把信仰扮成靓丽的粉，把执着铸成温暖的黄，把奉献化作炽热的红，这五彩斑斓的光芒汇聚一处，绚烂夺目。向前看，他们依然信心满怀，目光炯炯，在未来的奋进征程中，也必将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作者单位：焦作市委编办）

责任编辑 华 夏

“镜头”里的她和他

谷志昊

偶然间翻看老家的旧相册，依稀记得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光影诗人”，身挎相机、手握金笔，渡江跨海，走遍天南海北。毕业参加工作后才明白，小事当从大处观，梦想仗剑江湖自然古意盎然，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青年担当的责任感已使实现梦想的途径悄然变为实干兴邦。此时此刻，我想“以笔为媒、以语为镜”，定格她和他“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追梦之旅。

他，政治坚定、履职尽责，各项改革事项取得新成效

“一个人一直做好一件事”是大家对陈玉坤

的第一评价。自2015年通过公务员招录到尉氏县委编办工作以来，他就一直从事各项改革工作，先后圆满完成10余个改革任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乡镇体制机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街道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一项项改革任务的到来，他都自告奋勇、主动作为，坚决按照要求推进改革事项；一个个加班的夜晚，他都“舍小家、为大家”，伏案疾书，笔耕不辍，从没有任何怨言；一页页“三定”规定的起草印发，他都主动到涉改单位收集意见建议，坚持政策先行、字斟句酌，确保职责明晰、设置合理……正是有了他的辛勤付出，“优化协同高效”原则得到了有效落实，全县机构设置和编制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和完善。

她，严谨务实、精益求精，探索重点课题研究新路子

“年轻”实干的张晨晖，于2024年1月调任到尉氏县委编办工作。作为机构编制工作的“新人”，为了迅速转变角色、融入岗位，她主动承担了2024年重点课题研究工作，抽调6名业务骨干，以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到各部门、各乡镇(街道)一线岗位找经验、学方法。为了充分了解机构实际运行状况，她冒风雪、斗严寒，驱车走遍了13个乡镇、街道，拿到第一手资料；为了全面掌握编制资源分配情况，她顶骄阳、战酷暑，先后到30余个行政事业单位“面对面”征求意见建议，亲身感受机构编制事业发展成果；为了撰写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她与调研组的同志们反复论证、打磨稿件，有时候谈论结束已经是更深夜静……办公桌上那近40厘米厚的参考书籍、调研材料，映射出了她奋战一百多个日夜的成果，在实践中探索调查研究的新方法。

他，不畏艰苦、扎根基层，服务身边群众展现新风貌

“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党员干部特别是机构编制工作干部，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作为一名“古冀州”河北人的郑庆鹏，从事全县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工作已有6年时光，背井离乡、租住他所，一年归家天数寥寥可数，就连孩子病魔缠身他仍在坚持工作，虽河南人热情好客时常暖心，但一家人长期两地分居实属不易。面对周边朋友那句“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调侃，他摒弃功利思想、克服浮躁情绪，总是用“干好工作乃立身之本”予以有力“回击”。如此“特殊”的他，本应受到“特殊”照顾，但他却主动要求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自那时起做到了入乡随俗、服务群众，全身心致力于推动尉氏县庄头村乡村振兴事业

蓬勃发展。在机构编制工作岗位上，因业务精通、热情服务深受管理对象好评，他所主管的工作成效斐然，事业单位登记率也是“屡创新高”。就像机关流传的那句话：有他在，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和驻村帮扶工作“手拿把攥”。

她，一丝不苟、严把关口，机构编制管理释放新动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好机构编制管理工作要有硬功夫。十二年如一日的陆萌哲，练就了机构编制管理的“绣花功夫”。从参加工作开始，她的工作就是核编、入编、销编、更新数据库，虽内容单一却也繁琐。她深刻知道，机构编制工作业务性极强，没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知识，编制资源的使用肯定无法做到精准规范、分配合理。所以，她严格按照“先核编、后用编”流程，明确了用编补员所必需的前置程序，统一制作了用编申请的重要事项信息模板、人员调动程序，规范公开招聘、引进人才、人员调动等使用编制流程，工作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机构编制数据的完整性、精准性得到了保障。当她为实现机构编制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而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奋斗12年后，回眸望去，收获的也是一幅精益求精的完美画卷。

如今，旧照片已定格画面，过往的憧憬恍惚间已无法追寻，但时钟又拨动了一圈，又一次来到新的开始。开封市尉氏县委编办的她和他，将在时光洪流的“镜头”下，坚定选择远方，只顾风雨兼程，继续初心不改、践新不辍、奋斗不悔、理想不黯，在“创新体制机制、服务地方发展”的路径中探索前进，立足职责、大胆干事，奋力谱写机构编制工作新篇章。

(作者单位：尉氏县委编办)

责任编辑 华 夏

修武县：修兵练武处 七贤隐居地



当阳峪生产的绞胎瓷器



当阳峪瓷窑遗址



学生们在柴家窑研学绞胎瓷制作工艺



当阳峪陶瓷博物馆



汉献帝禅陵



汉献帝禅陵碑



修武城隍庙内的大殿



修武城建风光 摄影/文明

ISSN 2095-7017



CN 41-1428/D ISSN 2095-7017 定价: 15.00元